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蔣中正對印尼內戰的另一個構想——「南海計劃」

Chiang Kai-Shek's Perspective on Civil War in Indonesia and
"South China Sea Plan"

指導教授：陳鴻瑜 博士

研究生：連承晞 撰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蔣中正對印尼內戰的另一個構想——「南海計劃」

連承晞

摘要

「南海計劃」是1958年6月初中華民國國防部在蔣中正指示下提出的計劃，內容為一系列針對「印尼革命軍」的援助計劃，目標在於協助「革命軍」持續對印尼蘇卡諾政府作戰，進而推翻其統治，建立反共的印尼政府。裡頭包含了對「革命軍」的軍火援助、對假想敵中共的攔截作戰、以及對印尼登陸作戰三大部分。此一大膽的計劃早在五月下旬的發想階段即遭美國勸阻，日後發展也證明在缺乏美國幫助下，「南海計劃」僅能得到有限度之執行。然而我們依舊可以追問，究竟是什麼考量，讓蔣中正在完成反攻大陸前，還願意耗費如此心神，給予印尼內戰如此高的關注、甚至在美國反應冷淡時仍堅持不懈？本研究將從蔣中正的角度，解析其對印尼內戰和東亞局勢的理解，進而解釋支持印尼內戰在蔣中正心中與反攻大陸的潛在連結，以及冷戰下蔣中正和美國之間想法的分歧。

關鍵字：蔣中正、南海計劃、印尼革命軍、反攻大陸、冷戰

Chiang Kai-Shek's Perspective on Civil War in Indonesia and "South China Sea Plan"

Lian, Cheng-Si

Abstract

“South China Sea Plan” was drew by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OC in the beginning of June of 1958 under Chiang’s instruction. The plan was designed for assisting the “revolutionaries” in Indonesia, who called themselve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PRRI)”, in order to keep fighting against Sukarno administration till building a new anti-communist government in Indonesia. To achieve the goal, arms assistance, blocking operation against Communist China in South China Sea and sending forces to Indonesia were all included in this plan. Even though the ideas of this adventurous plan of Taipei had been dissuaded by Washington since the end of May, Chiang was still decidedly to carry on it. While it proved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was beyond the capacity of ROC without assistance from US, Chiang’s unusual enthusiasm for helping PRRI rased some questions for us. Why did Chiang pay attention to Indonesia before he struck back to Mainland China, and insisted on intervention whatever discouraged by US? This thesis will try to analyze Chiang’s perceptions on civil war in Indonesia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of Far East which arose the plan, to expla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ang’s support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and his “Strike Back” Policy, and what made his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US policy towards Indonesia during the Cold War.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South China Sea Plan, PRRI, Strike Back Policy, Cold War

謝辭

在政大歷史所的時光，晃晃悠悠一下就過了四年。即便是以曠日廢時著稱的歷史學門，這似乎都略嫌悠長，但我卻不後悔。這四年開拓了我的眼界，使我對自己、對研究、對這個世界都有了不一樣的體悟。猶記得一開始進入碩士班時，只覺得每位老師學術涵養都深不可測，在他們面前自己所見如同滄海一粟，不值一哂。這種巨大落差一度使我感到挫折，懷疑自己是否真有能力寫出什麼有建樹的研究。然而在各位老師的鼓勵支持下，這條一度以為沒有終點的路竟也到了尾聲。路途中值得感謝的人事物實在太多，我將盡我所能地表達我對這些人的感謝，礙於篇幅我無法將所有人一一列在這方寸之間，但我希望你們明白這絲毫不減我對你們的感謝之情。

首先這篇感謝我的指導陳鴻瑜老師。陳老師作為本系名譽教授，著作量等身，特別在東南亞領域國內大概罕有人能出其右。大學時因撰寫學期報告的經驗，我對二十世紀東南亞華人在當地、或對中國的影響萌生研究興趣。就讀政大歷史所後，身邊知道此事的師長和同學，幾乎都一致推薦我去請陳老師指導，必能有所收穫，而事實也確是如此。此次研究主題嚴格來說是發源於陳老師過去在《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一書中曾處理過的課題。當時因檔案限制較多，還留有許多尚待挖掘的問題。此次經陳老師建議，我有幸「接棒」，在老師指導下完成此一論文。作為碩士生，只是初入行道的實習研究者，在觀點和史料運用上還有諸多不足之處，一路上老師的提醒使我獲益良多。也是在老師要求和鼓勵下，我才克服對英文文獻的恐懼，嘗試加入美國檔案的觀點。結果證明這麼做不但拓展了我的視野，也因各方文獻的交叉運用，使我的論文得以脫離「閱讀筆記」的範疇，讓我體會到學術研究的趣味。

我也要感謝我的另外兩名口委，劉維開老師和孫采薇老師。自己以前修過劉老師的課，對老師史料掌握之淵博大為嘆服。劉老師在口試的短短數十分鐘內，給了許多研究材料和政府組織架構上的補充，都是極為寶貴且關鍵的，讓這篇研究有了更清晰的輪廓。同時劉老師作為中國現代史領域的大前輩，對這篇不成熟之作的肯定也使我備受鼓舞。孫老師則在口試時提供我許多細心的提醒，讓我得以避免一些粗心的錯誤。提出的一些問題，也激發了我對這篇論文中其他潛在問題的思考。

再者，我也要感謝本系的藍適齊老師，記得大學時老師開授的「戰爭與記憶」，給了我莫大刺激，是我對學術萌生興趣、最終踏入研究所的重要開端。除卻課堂教導，我從藍老師得到的更多是來自私下的交談。藍老師在學術上雖然活躍，與學生互動卻沒什麼架子，總能讓大家在他面前暢所欲言。我研究上的許多想法，都是在與老師交談過程中激盪出來的。在政大幾年，藍老師從旁給予的許多建議和資源，讓我有機會接觸不同的學術前輩，對這篇學位論文功的完成不可沒。

我也要謝謝唐啟華老師，當年曾修習唐老師在政大開授的外交史課程，正是由於那堂課，我頭次學會了如何運用外交檔案從事研究。我這篇學位論文很大程度就是以政府檔案為基礎的外交史路數，這不得不說是受唐老師那門課的影響所致。再者也要感謝東京大學的川島真老師，2019年10月，當我在東大發表此論文的研究計劃時，作為評論人，川島老師「蔣真正在意的是反攻」一席話，讓仍在摸索的我有了解確的思考方向。

我也要謝謝教會中各位夥伴和家人，在台北這幾年是你們陪著我一起成長，使我即便離家卻依舊感受到家的溫暖、並在各樣事上看見同心努力的美好。特別是在TALK雜誌這幾年，使我對於如何用文字影響世界，有了更多不一樣的看見。也是有你們幫助，我的文字較之以往洗練不少。想來自己文筆在論文口試時能得到老師們分外的稱讚，其中肯定少不了你們的功勞。

最後，這篇論文的完成，得感謝我的父母，在我唸碩士期間，給予了我諸多經濟和精神上的支持，使我能無後顧之憂地在這段期間內探索各樣的研究主題。與一般父母不同，你們並沒有因為我的曠日費時，而對我露出絲毫不耐，你們給我的是無盡的支持。因為有你們，我才能在畢業前，完成一篇不只是交差的論文。

連承晞

謹識於臺北

2021年1月25日下午

章節目錄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前言..... | 1 |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5 |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 7 |
| 第四節 研究視角..... | 8 |
| 第二章 「南海計劃」的背景..... | 10 |
| 第一節 冷戰下的印尼與 1958 年內戰的爆發..... | 10 |
| 第二節 中華民國政府對印尼內戰的初期參與..... | 13 |
| 第三節 蔣中正與國務卿杜勒斯的春季會談..... | 19 |
| 第四節 印尼對蔣美合助叛軍的指控..... | 23 |
| 第三章 蔣中正推動「南海計劃」與美方的反應..... | 32 |
| 第一節 蔣中正推動「南海計劃」前與美方的交涉..... | 32 |
| 第二節 「南海計劃」背後蔣中正的考量..... | 40 |
| 第三節 「南海計劃」出爐前蔣中正對華盛頓態度的再次試探..... | 50 |
| 第四章 「南海計劃」內容與其影響..... | 59 |
| 第一節 有限度的計劃..... | 59 |
| 第二節 台北 B-26 轟炸機在印尼之行動與其影響..... | 67 |
| 第五章 結論..... | 78 |
| 參考文獻..... | 82 |
| 附錄一..... | 85 |
| 附錄二..... | 89 |
| 附錄三..... | 107 |
| 附錄四..... | 109 |

表目次

| | |
|---|----|
| 表 1：1958 年 2 月臺灣軍援印尼革命軍武器數量..... | 18 |
| 表 2：計劃運交印尼革命軍「三個營」裝備數量統計表..... | 61 |
| 表 3：擬援助印尼革命軍裝備數量統計表..... | 62 |
| 表 4：蘇拉威西島登陸作戰所需艦艇之估計..... | 64 |
| 表 5：6 月 15 日至 7 月 13 日 B-26 先後協助作戰次數..... | 68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二戰結束後，受到抗戰時期史迪威事件¹影響，蔣中正和中國國民黨在美國政界的形象並不甚佳，中國共產黨則以一個改革者的開明姿態，博得部分美方人士的好感。在維護中國統一的前提下，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曾數度嘗試調停國共兩黨，直到最終結果證明雙方矛盾無可化解，心灰意冷的杜魯門政府遂在 1949 年 8 月以《中美關係白皮書》對外界總結了美國過往的中國政策，該白皮書除強調國民黨腐敗導致自身的失敗，也申明美國不再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的立場。同年底國民黨政府遷台，隔年 1 月 5 日杜魯門總統發布新聞稿，表明台灣為中國一部分，美國無意介入中國內戰、也不會提供軍事援助或顧問給台北的國民政府，再次向那些要求美國介入的輿論重申華府中立的立場，也形同宣判了蔣中正和國民黨在政治上的死刑。²直到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隨著大批中國人民志願軍如潮水般出現在韓戰戰場，美國態度才逐漸改變。

1952 年美國總統大選時，乘著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反共浪潮，共和黨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所領導的競選團隊以中國政策的全面失敗總結了杜魯門政府和其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的遠東政策，大肆抨擊政府態度不堅，最終導致美國對中國政策之失敗、和「丟失中國」的慘劇。然而就在共和黨贏得大選後，他們很快發現自己也面臨了相同挑戰與輿論壓力。如何確保戰後亞洲各國免於赤化，成為他們當家後立即的挑戰。其中一個最令他們戒慎戰兢的就是戰後亞洲最早獨立的國家——印尼的發展。1953 年康明(Hugh Cumming)行將赴任美國駐印尼大使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在信中提到戰後美國對中國因為過於堅持維持統一的重要性，終致中國赤化的悲劇，要他以此為殷鑑。³

¹ 史迪威 (Joseph Warren Stilwell) 為二戰期間美方作為盟國派駐中國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方聯合參謀長」(Joint 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他與蔣中正的嚴重不合以及對蔣的惡評，影響了中、美之間的關係和戰後蔣在美國的形象。

²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 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台北：遠足文化，2017)，頁 188-189。

³ Gardner, Paul F.,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s: Fifty Years of U.S.-Indonesian Relations*, Paul F. Gardn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p.133.

印尼作為戰後方才脫離荷蘭殖民而獨立的新興國家，由於曾受西方長期殖民，獨立後秉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堅持不與特定陣營結盟，希望避免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子。然而作為戰後第一個獨立的東南亞國家，擁有全世界最多穆斯林人口、身處西南太平洋戰略要道、又生產石油、橡膠等重要戰略物資，不凡的指標性意義和戰略地位使它注定要成為冷戰兩大陣營爭相拉攏的對象。這種潛在陣營之爭成了長期影響印尼和美國關係的不安因素。1955年4月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後，印尼儼然已成為亞洲「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的領頭羊、「第三世界」(Third World)的外交寵兒。對此美國表面上雖予尊重，私下卻對於印尼總統蘇卡諾(Sukarno)在內之高層官員縱容共產黨等左派團體、對外每每與共產國家過從甚密的行徑感到惴惴不安。當1955年9月印尼首次大選時，印尼共產黨(PKI)竟在多黨林立的印尼國會中一舉成為第四大黨，一股難以遏制的危機感開始在美國和其盟友間醞釀。

平心而論，蘇卡諾絕對稱不上一名共產主義者。1948年茉莉芬事件(Peristiwa Madiun)⁴中他曾下令鐵腕鎮壓意圖參與政變的共產黨和左派團體，對印尼共產黨造成了近乎致命的打擊，間接促成美國承認印尼獨立地位的態度。但反過來說，蘇卡諾也非堅定的反共份子。他獨特的混合主義思維，使他認為自己可以在民族主義、伊斯蘭、共產主義等各家思想中截長補短，以適應印尼的獨特需要。蘇卡諾認為所謂「民主」應盡可能容納不同群體的聲音，故茉莉芬事件後他不但允許印共作為合法政黨繼續存在，且以其動員人民的極佳效率，每每對之大加讚揚。外交上其「中立」主張，也讓他對於和共產國家「友善互動」毫不避諱。如果說上述行徑和1955年的大選結果已足夠讓美國和其盟友膽顫心驚，那麼1957年2月他所提出的「指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在美國和其盟友眼中看來，儼然就是共產國家「無產階級專制」(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在印尼的借殼上市。蘇卡諾以國民會議之「共識」取代議會內民主表決的構想，不但無視各黨在國會既有的席次比，讓原先被各大黨排除在內閣外的印共有了直接影響決策的機會、壓縮國內反共勢力對共產

⁴ 1948年印尼獨立戰爭期間，面對荷蘭一次次單方面破壞聯合國調停下之停火協議，蘇卡諾始終要求軍隊竭力克制，等待國際輿論轉向對其有利之局面。然而而印尼共和國內部包含印尼共產黨在內等主戰之左派團體，卻對此大為不滿，抨擊蘇卡諾儼然已成為帝國主義之幫凶，並在9月18日武裝佔領茉莉芬。蘇卡諾聞之大怒，下令軍方強力鎮壓。經此次掃蕩，印共幾近覆滅，也使過去荷蘭政府聲稱印尼共和國為共產革命的「紅帽子」不攻自破，極大程度消除了美國對印尼獨立運動的顧慮，間接促成日後美國強力支持印尼獨立的立場。

黨的遏阻力；也使原先內閣制的印尼總統職權急速膨脹。在蘇卡諾更形集權的發展下，美國憂心一旦印共成功控制蘇卡諾，一切都將無法挽回。

眼見共產黨在印尼正循「民主」管道不斷成長，最具政治影響力的蘇卡諾又難以信任，華府遂開始在外交途徑之外尋求他法、力圖阻止印共在印尼的發展。1958年初一場由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和其胞弟中情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所支持的秘密行動在印尼蘇門答臘(Sumatra)和蘇拉威西(Sulawesi)等外圍島嶼如火如荼地展開。透過增強外圍島嶼反共的地方勢力，華府期待對雅加達發揮政治槓桿的影響作用，或使其改變「親共」行徑，或假以時日印共不幸控制爪哇，美國也不至失去「全部的印尼」。無論如何，此刻艾森豪政府決心要避免重蹈杜魯門政府在中國失敗的覆轍。

1958年初一場新的冷戰角力正在東亞蠢動。在美國中情局(CIA)秘密資助下，印尼蘇門答臘中部的地方勢力於胡辛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Ahmad Hussein)帶領下，挾自身武力於2月10日向雅加達發表了一份限期5日的「最後通牒」，要求除非雅加達政府排除內閣中的共產份子，並邀請前副總統哈達(Mohammad Hatta)重組內閣，否則他們將暫時不再受雅加達指揮。2月15日未獲答覆的地方勢力，宣布在武吉丁宜(Bukittinggi)成立「印尼革命政府」(PRRI)，正式拉開印尼地方與中央戰爭的序幕。他們對外宣稱這些訴求的主旨在於反共和避免爪哇對其他島嶼的經濟剝削。這番言論不但在國內得到蘇拉威西島反對勢力「全面鬥爭憲章」(Permesta)的響應，也在國際間獲得來自美國等「自由世界」的同情。

此次戰爭為期雖短，國際間卻是暗影浮動。除美國外，亦有不少美國盟國參與其中，身處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亦在其列。從內戰打響之初，台北即秘密給予「革命軍」⁵大量軍火支持。蔣中正甚至在3月14日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會談時提議由美方提供裝備、讓他出兵印尼援助「革命軍」，不過杜勒斯以此舉恐傷害印尼「獨立尊嚴」及美國對印尼戰略而予以婉拒。到4月下旬，中華民國與美國聯手秘密援助叛軍的指控已在印尼滿天飛，儘管台北方面政府和媒體不斷否認相關指控，仍無助緩解印尼社會的憤怒，最終演變為大規模排華風潮。⁶1958年5月，印尼「親中國

⁵ 「印尼革命政府」彼時在台灣又稱為「印尼革命軍」或「革命軍」。

⁶ 〈印度尼西亞軍發動另一攻勢 討伐北蘇拉威西叛亂集團 蔣機從菲律賓運武器到萬鴉老〉，《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4月22日，第七版。

國民黨」的華人團體、報社、學校遭到關閉，雅加達一帶五十餘名僑領也在 5 月 5 日遭軍方「逮捕」。此後印尼政府更陸續祭出法令嚴格限制華人居住遷徙、經濟活動、言論出版的自由。上自官方下自民間，印尼社會對華人的懷疑與差別對待接踵而至。

讓事情雪上加霜的，是 5 月 18 日一架由美國人所駕駛的 B-26 轟炸機遭到印尼政府軍擊落，當駕駛波普(Allen Pope)生還被捕時，他身上證件除證明他美國軍人身份外、也證明他是台北一家航空公司「民航空運隊」(Civil Air Transport, CAT)的飛行員，種種鐵證迫使華府向雅加達承諾停止對叛軍的援助。儘管印尼政府並未對外大肆宣傳此架 B-26 和波普的事情，但此事無疑加深了雅加達對於華府和台北合謀援助叛軍的印象。

然而在印尼華人受害與台北外交部極力滅火、否認指控的同時，蔣中正卻為著「革命軍」陷入頹勢而心急如焚。5 月 22 日他找來美國大使莊萊德(Everett Francis Drumright)再度表明出兵援助「革命軍」的意願。對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23 日來函再度予以勸阻，蔣收到回覆後表面稱諾，5 月 24 日軍事會議卻指示國防部秘密擬定一項大規模援助「印尼革命軍」的軍事計劃、稱為「南海計劃」。6 月 7 日計劃上呈時，內容包含對潛在敵人中共在南海的攔擊作戰、對「印尼革命軍」的軍事物資援助、甚至是對印尼的登陸作戰計劃。是一項以維持「印尼革命軍」存續為始、助其建立反共印尼政權為終的大膽計劃。

儘管過去早已有不少國內外研究指出中華民國政府曾在 1958 年的印尼內戰中秘密扮演了一定角色，卻鮮少有人提及這份計劃的存在和蔣中正為此與美方交涉的過程。台灣中文學界，過去受限於此事的高度機密，對於這段蔣中正嘗試介入印尼的歷史關注本來就甚少、除了陳鴻瑜教授 2020 年 11、12 月在《傳記文學》所發表〈一九五八年臺灣軍援印尼革命軍始末〉一文外，學界至今未有以此專題討論的文章。國外雖有些許研究談及台北的參與，卻大多缺乏中文檔案的運用，難以在決策層面給予有力說明。

究竟為何方才在台灣站穩腳跟的蔣中正此刻會給予遙遠的印尼如此高的關注、甚至打算興師動眾出兵印尼？蔣是認真的嗎、抑或在此一計劃背後有其不為人知的考量？蔣中正真有能力執行如此龐大的計劃嗎？如此重大的計劃，美國在該項計畫

出爐前後是否曾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它與美國在亞洲對共產黨的圍堵戰略有何異同之處？此計劃對於蔣中正的反攻或兩岸局勢有什麼可能的潛在影響嗎？由事後觀之，這份計劃的內容大多未獲實現，這份未能貫徹的計劃在歷史上的意義究竟為何、有無留下任何影響？蔣中正如何在冷戰時代，趁美國在亞洲打造防共圍堵網、構築防禦條約體系的同時，摸索合於自身目標的戰略，從而導致 1958 年蔣對印尼內戰的高度關注，將是筆者在本篇論文所嘗試回答的問題。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對於 1958 年印尼的指控以及印尼華人的受害，早年台灣媒體、學界多持台北官方說法，指責這是共產黨的陰謀陷害、與印尼蘇卡諾政府的偏信謠言。抱此立場的學者包含當年曾在事件中遭到印尼「逮捕」的馬樹禮和丘正歐教授。馬樹禮在印尼被捕時本身除具備中華民國立法委員身份，同時身兼中國國民黨印尼地區總負責人。歷劫歸來後他於 1965 年出版了一本小文集《印尼的變與亂》，書中文章多著眼於印尼政局動盪背後的內部歷史因素，並將自身蒙難經歷歸因於共產黨的煽惑。⁷丘正歐返國後曾歷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代主任和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華僑研究所所長，為華僑研究的著名學者。其《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一書，於 1995 年時由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書中認為 1958 年印尼排華除反映印尼社會對華人既有矛盾外，基本為「共匪」在海外華人社群中所發動的鬥爭和蘇卡諾政府部分人士與共產黨之同路所致，所謂華人或中華民國政府暗中協助叛軍的指控自然也是純屬污蔑，並緣此角度探討華人社群與台灣方面的因應之道。⁸上述兩部著作偏信台北官方觀點的立場日後雖證明與事實有所出入，但這畢竟是時代的限制，並不能埋沒兩者對於我們理解該時代背景、華人受害之事實與受害華人觀點的貢獻。

1990 年代隨著美國解密 1958 年部份相關的國務院檔案，台北秘密援助「革命軍」的行為基本獲得了官方檔案證實。1995 年時任教於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 George McTurnan Kahin 和 Audrey Kahin 兩人合著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 一書，對美國 1958 年在印尼透過「秘密行動」(covert operation)協助叛軍的政策始末有了極為詳盡的描寫，

⁷ 馬樹禮，《印尼的變與亂》，(台北：海外出版社，1965)，頁 85。

⁸ 丘正歐，《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頁 64。

之中亦有少部分提及台北對此事的積極態度。至此，台北對叛軍的援助基本已被外國學界證實，但受到史料限制和學術關懷的不同，該書並未再針對中華民國的角色做更多深入的探討。直到 1999 年時 Conboy、Kenneth 和 James Morrison 合著的 *Feet to the Fire: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Indonesia, 1957-1958* 一書不但對美國情報單位的一線運作有了更詳細的描述，也透過對台北和「革命軍」相關人員的口述訪談，大量還原了台北參與援助「革命軍」的過程。書中受訪的台北情報人員雖未具名，但這是學術研究中首次出現台北參與者的視野。只不過這部書雖補充了許多一線參與者的視角，但因為並未使用中文檔案，其描寫不免有所不足、對於這些行動背後的決策考量難有更全面的描述。

2000 年時中華民國的退役空軍中將衣復恩出版了《我的回憶》一書，提及 1958 年他擔任空軍情報署長時，曾奉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之命參與支援「印尼革命軍」。⁹隨著越來越多人現身說法，2001 年時馬樹禮也在《僑協雜誌》的訪問中一改過去說法，承認當年政府對於「革命軍」的援助是導致他和其他僑領蒙難的主要原因。¹⁰只不過馬樹禮究竟是事後從他人人口中得知此事「真相」，抑或一開始著書時基於某些考量而選擇隱瞞真相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2004 年時台灣長年投身東南亞和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陳鴻瑜教授在《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一書中利用偶然間看到的部分台北國防部檔案，配合國史館彙編之相關史料，為學界首次以中文檔案對此事的初探，並對台北該時某些援助軍火的具體數量有較為清楚的描述。¹¹但受限該時檔案尚未正式開放，書中仍對中華民國參與的始末缺乏清楚描述。2014 年曾與衣復恩一同參與支援「印尼革命軍」任務的陳文寬，經王立楨訪談整理出版了兩冊回憶錄。第二冊《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對於復興航空參與援助「革命軍」、及過程中復航與中華民國政府之微妙關係有相當鉅細靡遺之描述，大大彌補了檔案缺乏下的空白。¹²此後 2015 年林孝庭在《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一書中認為蔣中正 1958 年時受到美國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Charles M. Cooke Jr.)之備忘錄的影響，而出現了確保東南亞之「自由」以維繫自身反攻希望的戰略認知，

⁹ 衣復恩，《我的回憶》，(台北：立青文教基金會，2000)，頁 324-328。

¹⁰ 陳三井 訪問、張國裕 紀錄，〈訪馬樹禮資政——談丘正歐博士〉，《僑協雜誌》，第 73 期(2001 年 6 月)頁 49-51。

¹¹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台北：鼎文，2004)，頁 448。

¹² 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台北：三友，2014)，頁 133-141、154-183。

從而導致該時台北向東南亞積極「輸出革命」的風潮，並以此視角看待 1958 年台北對於印尼內戰的介入。¹³不過書中對於中華民國介入 1958 年印尼內戰的始末、以及此過程中和美國的互動未做太多詳細的探討。直到 2020 年，陳鴻瑜教授在《傳記文學》上刊載〈一九五八年臺灣軍援印尼革命軍始末〉一文，對於此事經過有了更深入探討。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使用材料除中華民國國防部檔案、外交部檔案、總統文物、美國外交史料彙編 *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等官方檔案外，亦將輔以國史館呂芳上所主編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中的蔣中正日記史料、已故空軍中將衣復恩之回憶錄，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與前人研究對話，解釋蔣中正推動「南海計劃」的時代脈絡與其意義。另外須註明的是，2020 年 2 月份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已開放到館查閱《蔣經國日記》，按現有各項史料觀之，彼時為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在此次台北援助「革命軍」執行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其日記或當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可惜限於時間和疫情，此次研究未能使用，殊為可憾。現階段我們僅可由參謀總長王叔銘之日記，和衣復恩、陳文寬等人之回憶錄，從旁推敲蔣經國之態度。

另外本研究探討著重者為蔣中正和部分中華民國政府高層對於援助「印尼革命軍」一事的認知和決策過程，以及蔣中正在此過程中和美方的互動。情報單位詳細的執行過程或執行方法則僅以扣合上述主題、於必要時提及，並非本文所著重討論的主題。事實上，由於各國相關檔案的封閉，至今學界對於這些秘密行動細節的探究仍多仰賴口述研究。以國防部現今已然公布的「南海計劃」案為例，該檔案雖然對於援助內容、武器數量均有清楚描述，但對於和「印尼革命軍」的接觸僅註記由情報局負責，其具體方式、管道、是否有與他國合作等這些研究者亟欲了解的內容則基本隻字未提。依據 2020 年 1 月修訂公布的中華民國「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8 條規定：「涉及情報來源、管道或組織及有關情報人員與情報協助人員身分、行動或通訊安全管制之資訊，不得洩漏、交付、刺探、收集、毀棄、損壞或隱匿。但經權

¹³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台北，聯經：2015)，頁 276。

責人員書面同意者，得予交付。人民申請前項規定資訊之閱覽、複製、抄錄、錄音、錄影或攝影者，情報機關得拒絕之。」故依規定，關於跨國情報行動之細節應當還有不少資訊由情報局所管制而未對外公布。事實上對於情報人員、管道的保密，一直是各國情報工作所重視之基本原則，這也是為何多數相關研究需大量仰仗口述回憶錄史料。在官方檔案限制尚未解除前，筆者對於情報活動之細節亦只能以學界現有研究為主要參考依據，那些學界所未能定論的環節筆者亦無意於本研究中深入探討。唯本文所主要聚焦探討的決策面和外交互動，檔案或蔣日記大多已提供足夠之資訊，可供分析。這也是本研究於各項材料限制中的立足之處。

名詞使用上，所謂「印尼革命政府」(PRRI)，印尼政府稱之為叛軍，在美國官方文獻中多以「叛軍」(rebellion)或「異議份子」(dissidents)稱之。台灣官方與媒體出於鮮明同情立場早年多採「印尼革命政府」或「印尼革命軍」、「革命軍」稱呼之。為忠實呈現此種觀點的差異，筆者平時行文雖以叛軍稱之，但如涉及特定立場之描寫，將以引號或引文斟酌沿用史料文獻中之稱呼描述該團體，並不另做說明。另外彼時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相互競逐中國之法統，為避免混淆，一般行文時筆者皆以「中華民國」或「台北」指稱中華民國，以「中共」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文中如有「中國」字眼，為忠於史料作者之觀點，僅在第一次出現時補充附註，爾後不另做修改。

第四節 研究視角

過去涉及此主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為否認中華民國政府對此事的參與，其二則為認為確有其事者。固然在今日我們都已經知道中華民國政府的參與確有其事，但即便是在此一共同認知上，台北和華盛頓間的關係卻依舊撲朔迷離。在印尼或中國大陸地區的媒體標題大都將「蔣美」對叛軍的援助視為合謀關係，印尼官方在向美國提出指控時雖然未直接將台北行為歸咎於華盛頓，卻也饒富暗示地稱「眾所周知，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有強烈的影響力」(Everyone knew US Government had great influence with GRC)。¹⁴

¹⁴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April 30,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4.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4> (2020年4月30日瀏覽)

整體而言，過去研究在缺乏中文檔案視角的情況下，大都強調華府在此事對台北強烈的影響力，較少探討台北自身的意志與決策考量。然此處筆者對照現有中英文檔案史料和《蔣中正日記》後，認為蔣中正在參與此事時不但有著極強烈的自身考量，且其觀點還與美國存在許多歧異。其中關鍵與蔣中正在 1950 年代末期以促進亞洲反共為始，進而維持反攻希望、甚至在共同防禦條約限制下主動創造反攻機會的戰略思維有著高度關聯。尤其本文探討的「南海計劃」更是蔣中正對內力排眾議、對外不顧美國反對所強行推動，可說是蔣個人意志鮮明的一項計劃，清楚凸顯了在援助「革命軍」一事上，他與美國考量的差異。也說明身為冷戰時期的盟友，兩者仍存在戰略目標的本質分歧，這也是「南海計劃」的研究價值之所在。



第二章 「南海計劃」的背景

第一節 冷戰下的印尼與 1958 年內戰的爆發

如同冷戰時期的諸多區域衝突，1958 年的印尼內戰也並非單純的「內政」問題，而是印尼內在政治衝突與美國共產圍堵政策交織下的產物。儘管自獨立以來，蘇卡諾總統便不斷標榜「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主張不與美蘇任一陣營結盟的中立政策。但在蘇卡諾政府的放任下，1950 年代的印尼共產黨以合法政黨身份不斷蓬勃發展，在 1955 年大選後不但成為國會第四大黨，更是共產國家境外最大的共產黨。加之蘇卡諾言行不斷左傾，外交上對於和共產國家之「友善往來」毫不避諱，再再讓印尼在冷戰當中的「站隊問題」成了美國亞太戰略中最大的隱患。¹

1956 年 11 月，有感於自己和蘇卡諾想法日漸分歧，印尼副總統哈達(Mohammad Hatta)選擇以辭職表達無聲的抗議。由於蘇卡諾是爪哇出身、哈達是蘇門答臘出身，過去兩人合作被認為是印尼諸島共治的合一象徵。同時哈達也是極少數政治聲望、資歷尚可與蘇卡諾並駕齊驅的人物，他身為虔誠穆斯林的堅定反共形象，讓他成為蘇卡諾政府中重要的穩定力量。擔憂共產崛起的政治勢力即或對蘇卡諾的作風有所不滿，因哈達的存在還能在異中求同。²如今他一離開，過去潛伏的矛盾一一浮上檯面。哈達辭職後一個多月，蘇門答臘各軍區相繼宣布接管當地行政權、脫離中央、停止上繳稅收。³

印尼地方宣布「脫離中央」，中央指控地方行徑為「叛亂」，印尼卻未就此陷入內戰。地方首腦強調他們希冀的是中央改革，而非另立政府、中央也並未採取嚴格的武力措施。地方官員不但如常到雅加達出席各項會議，與蘇卡諾握手言歡，蘇卡諾和中央要員有時也會到「叛亂地區」會見這些「地方領袖」。⁴直到 1958 年 2 月中，中蘇門答臘島軍人宣布成立革命政府前，這種「叛而不變、討而不伐」的詭異

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anuary 2,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2> (2020 年 5 月 27 日瀏覽)

² 馬樹禮，《印尼的變與亂》，頁 25-27。

³ 合眾社，〈印尼蘇門答臘 陸軍部隊叛變 當地司令官辛鮑隆 宣布不承認現內閣〉，《中央日報》(台北)，1956 年 12 月 23 日，第二版。

⁴ 蘇尚，〈轉變中的印尼政局(上)〉，《中央日報》(台北)，1957 年 10 月 1 日，第二版。

局面持續了一年有餘。按馬樹禮解釋，這令外人難解的現象正是印尼人性格的最佳體現。⁵

為解決政治僵局，1957年2月蘇卡諾提出著名的「救時方案」。過去蘇卡諾曾指出，政黨政治是造成印尼政治亂象的根源，唯有「埋葬政黨」才是終結亂象的出路。如今他更提出「指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和國民會議(National Council)的構想，為「埋葬政黨」提供了具體手段。按蘇卡諾解釋，過去印尼學習西方議會民主，卻使國家陷入政黨間的相互掣肘。⁶為解決此一困境，他主張應比照過去印尼村莊會議的模式，由他所指派的各功能團體(functional groups)和各黨派代表組成國民會議取代既有國會，以協商凝聚共識取代投票表決。⁷

儘管蘇卡諾強調「指導式民主」有其印尼傳統可循，但這種仿似「集中式民主」的制度，實在很難不令華府聯想到共產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⁸同時無視既有議會、內閣的設計，也被質疑是在為印共參政鋪路。另外哈達辭去副總統職務後，議會政治的消亡勢必將排擠到哈達、和外圍島嶼的參政空間。反對勢力的政治權力萎縮、有左傾嫌疑的蘇卡諾權力膨脹，國際間擔憂印尼突然左轉、地方擔憂爪哇獨佔國家權力的憂慮日益加劇。

1957年3月2日，東印尼軍區司令蘇穆爾上校(Colonel Herman Nicolas Ventje Sumual)在其轄下區域宣布戒嚴，通過「全面鬥爭憲章」，以表達對「指導式民主」的不滿。繼蘇門答臘之後，蘇拉威西島也脫離了雅加達控制，然而正如蘇門答臘軍人一樣，「全面鬥爭憲章」運動亦是「叛而不變」，強調目的是敦促中央改革，無意脫離國家，中央也就維持著「討而不伐」的回應方式。⁹雖然地方的反對行動未即刻導致內戰，不過地方和中央的長期對立，卻提供了美國和其他反共國家介入的空間，埋下日後地方反對勢力與雅加達決裂的種子。

⁵ 馬樹禮，《印尼的變與亂》，頁69。

⁶ Robert Cribb and Colin Brown，蔡百銓譯，《印尼當代史》，頁90-91。

⁷ 「功能團體」(functional groups)按蘇卡諾說法，指的是像工農、青年、學生、軍人等這些不同的社會族群。馬樹禮，《印尼的變與亂》，頁55。

⁸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May 23,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09.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09> (2020年6月3日)

⁹ Robert Cribb and Colin Brown，蔡百銓譯，《印尼當代史》，頁94-95。

在艾森豪政府時代，美國對過去杜魯門政府的中國政策有了諸多檢討。其中最重要一點，就在於艾森豪政府認為過去杜魯門時代太過強調中國「統一」的重要性，以至於最終雖然維持了中國的完整，得到的卻是「赤色的中國」。這一背景導致此時期以國務卿杜勒斯為首的華府高層，普遍抱有寧缺勿失的心理，深深影響艾森豪政府的印尼政策。¹⁰作為東南亞面積最大、扼守戰略要道、擁有豐富天然資源、與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國家，印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美國眼裡印尼問題儼然就是 1945 年中國問題的重演，而這次美國絕不願再重蹈歷史的覆轍。隨著印尼下一屆大選逐漸逼近，1958 年初，華府確立了透過秘密行動(covert operation)加強地方反對勢力，來向雅加達施壓，迫使其限制共產黨發展的方針，希望遏止共產黨在爪哇的擴張，並透過強化外圍島嶼的政治勢力，確保當爪哇不幸落入共產黨控制時，「自由世界」至少還會保有部分的印尼。¹¹

1958 年 2 月中，自恃得到美國中情局秘密支持的中蘇門答臘地方軍人胡辛中校趁著蘇卡諾在日本度假修養的時刻，於 10 日發表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雅加達改組政府、宣布共產黨為非法，限期五日答覆，否則他們將不再受其指揮。¹²15 日，未獲答覆的他們在武吉丁宜宣布成立「印尼革命政府」(PRRI)，表示在雅加達答應他們一系列條件前，他們將不再受其指揮。¹³不久後，蘇拉威西島的反對勢力「全面鬥爭憲章」亦宣布加入「革命政府」，形成對爪哇的東西包夾。¹⁴同時關於印尼陸軍內部反共人士、向與蘇卡諾不合的印尼第二大黨馬斯友美黨(Masyumi)以及前副總

¹⁰ Gardner, Paul F.,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s: Fifty Years of U.S.-Indonesian Relations*, Paul F. Gardn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p.133.

¹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Washington, January 2,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 (2020 年 6 月 3 日)

¹² Conboy, Kenneth and James Morrison. *Feet to the Fire: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Indonesia, 1957-1958*.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p. 37.

¹³ 這些條件包含重組內閣，去除其中有親共嫌疑的成員，與前副總統哈達重啟合作。同時取消蘇卡諾的「指導式民主制」(Guided Democracy)，加強非爪哇地方政府的自治權和財政權等。

¹⁴ 關於蘇拉威西島一帶，蘇穆爾上校(Colonel Ventje Sumual)所領導的「全面鬥爭憲章」加入「革命政府」一事，日後有口述訪談顯示蘇穆爾似乎事先對蘇門答臘要成立「革命政府」一事並不知情，甚至宣布加入也並非他的決定。事實上上述過程中，他人都在國外。當他在菲律賓得知「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時，還傳電報回去，命令屬下 Somba 在他回國前不得做出任何決定。孰料就在他去電後數日，便在海外收到蘇拉威西宣布加入「革命政府」的消息。他只得接受現實，在返回萬鴉老(Menado)後派遣潘道前往台北。在此之前，Somba 還行宣布「全面鬥爭憲章」加入中蘇門答臘島之革命政府，是否有中情局的人員在中間引導？頗耐人尋味。

Conboy, Kenneth and James Morrison. *Feet to the Fire: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Indonesia, 1957-1958*.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pp. 38-40.

統哈達，是否會因為同情地方立場而倒向支持「革命政府」的風聲亦開始瀰漫，一時間「革命政府」聲勢浩大、爪哇政局改換一新似非遙不可及之事。

然而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過於樂觀了。國家統一大義當前，除蘇拉威西島北方的「全面鬥爭憲章」在第一時間宣布加入行動外，其餘反對勢力所寄望的潛在盟友均未表態支持。儘管自 1956 年底以來，外圍島嶼在事實上就已經「脫離中央」，但與此前不同的是，這次反對勢力「另立政府」的做法直接僭越了過去雅加達與地方的默契，中央除決心武力鎮壓外，也開始懷疑背後有外國力量的介入，因為在他們看來，「最後通牒」這種毫無商討餘地的手法，實在「不像是印尼人的做事方式」(not the Indonesian way of doing things)¹⁵。就這樣，「叛而不變、討而不伐」的時代結束了，地方與中央的矛盾，終究在國際冷戰的對抗氛圍中，演變為短兵相接的內戰。¹⁶

第二節 中華民國政府對印尼內戰的初期參與

關於美國對此次叛亂的參與，過去英文學界已透過口述研究、和部分英文解密檔案產生不少極為出色的研究。但中華民國政府的角色、以及其與美國行動之間的關係，則在語言和檔案限制下，始終維持濃厚的神秘色彩。據筆者目前整理，此階段由中華民國政府之情報單位秘密接洽叛軍、並轉介由復興航空以民間名義代為打理。已開放中文檔案對此階段的描述極其有限。這方面國外現有學術成果多是透過美國國務院檔案，或相關參與者的口述訪談史料、回憶錄，從側面重建而成。特別是 Conboy、Kenneth 和 James Morrisony 在 1999 年出版的 *Feet to the Fire: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Indonesia, 1957-1958* 當中關於中華民國政府參與的部分可說是現今英文學界中描述最為詳盡。國防部「南海計劃」檔案開放後，我們對於此時期台北提

¹⁵ 這句話出自印尼外長蘇班德里約(Subandrio)。3 月中他對美國大使鍾華德(Howard P. Jones)表達印尼政府認為叛軍背後有外部力量介入。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March 15,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40.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40> (2020 年 6 月 3 日)

¹⁶ 在支持鎮壓的雅加達高層中，至為關鍵的是陸軍領袖納蘇遜，儘管納蘇遜自身是蘇門答臘人，並且他和他所領導的陸軍一向秉持強烈反共的態度，但納蘇遜個人有軍隊國家化的理想，故此刻叛軍的做法，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March 8,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8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86> (2020 年 6 月 5 日)

供之援助內容有了更進一步認識。中文學界的學者陳鴻瑜教授和林孝庭曾先後在 2004 年的《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和 2015 年的《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中運用相關檔案，對此事做了初步整理。2020 年 11、12 月，陳鴻瑜教授在《傳記文學》分上下兩篇刊載其研究〈一九五八年臺灣軍援印尼革命軍始末〉。

以下將在前人研究成果之基礎上，與《蔣中正日記》、中研院近史所藏之《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之《蔣經國總統文物》、美國國務院歷史文獻辦公室(Office of the Historian)整理之《美國對外關係史料(FRUS)》等文獻參照，說明中華民國政府在初期對內戰的回應，以及其行動與美國之間可能的關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最近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開放了《蔣經國日記》供到館查閱，過去許多口述研究和回憶錄都指出，身為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在此次援助「印尼革命軍」一事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¹⁷相信將來若能與《蔣經國日記》做進一步參照，或可使我們對中華民國政府此時期的行動有更全面的認識。

美國無疑是此次印尼外圍島嶼叛亂背後的主要支持力量，但這不代表它是唯一對印尼局勢給予高度關注的國家。包括韓國、中華民國、菲律賓在內等第一島鏈的國家，身為與圍堵共產主義的前沿，無不深深關切印尼的未來走向。這之中，中華民國政府在蔣中正領導下，更是成為對叛軍支持最力的亞洲國家。其參與又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內戰爆發前到 5 月下旬透過情報單位和民間名義秘密參與的「初期階段」，第二階段則是 5 月下旬美國放棄叛軍後，台北與華盛頓、或者更精確地來說，是蔣中正與華盛頓出現嚴重分歧的「南海計劃」階段。

本節所探討之第一階段，據陳文寬回憶錄所載，遠在內戰爆發前，中華民國政府便在美國主導下，以民間名義暗中運送軍火給印尼反對勢力，足見中華民國政府軍方與之接觸甚早。¹⁸更有甚者，1958 年 1 月份「革命軍」還尚未成立，台北國防

¹⁷ Conboy, Kenneth and James Morrison. *Feet to the Fire: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Indonesia, 1957-1958*.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p.42.

¹⁸ 回憶錄所講的時間為 1954 年 7 月，但因為 1957 年 3 月以後地方勢力與中央矛盾才開始激化。因此 1957 年開始接濟叛軍，似乎較為合理。此處回憶錄時間可能有誤。但無論如何，中華民國開始援助的時間顯然遠在「革命政府」成立以前。參考 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頁 141-142。

部即指示復興航空與印尼地方反對勢力接觸。¹⁹依據此時間點，此次中華民國對印尼的介入極可能也與美國的情報單位有關。故 1958 年早在「印尼革命政府」成立前夕，台北外交單位即透過派駐各國使節、當地僑領、中央社記者、國安局，對印尼發展有相當之掌握。²⁰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多數外交單位基層雖對軍方的秘密參與並不知情，但就在「印尼革命政府」2 月 15 日宣告成立後數天，雅加達中華總會總幹事朱恕即以明碼發電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籲請政府勿干涉蘇門答臘事件，頗有表態自保意味，中華民國政府在印尼華人社會之形象也由此可以想見。²¹

中華民國政府對印尼別有用心的傳言雖非空穴來風，但在評估「革命軍」究竟是否具備潛力、以及該以何種態度應對時，外交單位仍是謹慎的。固然有人認為與印尼既無邦交、基本無大顧慮，應善加把握聲援「革命軍」；亦有人提議藉由私人關係予「革命軍」私下之聲援。但身在紐約的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 2 月 20 日亦電告葉公超，指出其印尼友人認為此次地方叛變成功機會不大，整理原因有四點：²²(一)叛徒僅要價還價，缺乏作戰決心。(二)哈達不支持叛變，馬斯友美黨黨魁納齊爾(Natsir)雖公開支持叛變，但該黨已重選黨魁，料多數黨員亦不願參加叛變。(三)蘇卡諾可能試圖分化叛徒，並有武力足以制服。(四)叛徒未聯絡其他反對勢力。且據稱哈達並非反共，僅主張民主。他與蘇卡諾的衝突更多是由於私人因素。由日後發展觀之，蔣廷黻此時所聽聞之消息可謂切中要害、極其精準。

評估過程雖不難看出外交單位部分人員私下對「革命軍」的同情，不過除一再宣言中立外，外交部基本再無公開大動作。究其原因，除上述各國態度未明、「革命軍」潛力有待評估外，也與保僑和對行動之掩護有極大關係。外交部畢竟是代表一國立場之官方機構，一旦外交單位公開表態就難有婉轉餘地了。毋寧說在台北軍方給予「革命軍」援助之際，作為檯面的外交單位十足擔當了掩飾行動和打點關係的門面角色。外交部對於軍方和「革命軍」的接觸究竟掌握到何種程度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日後其與美方互動、乃至於給予台北相關行動人員、物資出入境方便等情況來看，外交單位高層對援助行動雖非「無所不知」，但也絕非如其所試圖表現得那般「一無所知」。甚至當日後蔣中正試圖推動「南海計劃」時，外交部長葉公超

¹⁹ 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頁 155。

²⁰ 《外交部》，〈印尼排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11-01-21-09-03-001，頁 1-50。

²¹ 〈印尼排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11-01-21-09-03-001，頁 25-26。

²² 〈印尼排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11-01-21-09-03-001，頁 21。

更以其自身外交專業之判斷，在與華府交涉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協調角色。本論文將以軍事、情報單位之動作和外交上之交涉，此雙股螺旋架構描述此行動「盡在不言中」的微妙之處。

按陳文寬回憶錄所載，中華民國與印尼反對勢力接觸之時間甚早。待 1958 年 2 月「印尼革命政府」成立時，台北更與北蘇拉威西島的「全面鬥爭憲章」展開密切合作。此次接觸時間點同樣晦莫如深，唯一線索是 2 月下旬時一名叛軍軍官潘道(Jan Maximillian John Pantouw)的神秘訪台，並在《中央日報》得到極簡短的報導：「權威人士證實：印尼革命領袖之一的潘道少校已於 21 日抵達自由中國。據說潘道少校原擬由馬尼拉飛往日本，臨時突然改變計劃，飛來台灣。」²³由以上描述觀之，此消息極可能是官方刻意釋出，展現台北熱切態度同時，或者也是希欲以此聲援「革命軍」、壯大其聲勢。

日後口述資料證實，潘道此行目的正是向台北採買武器，這已非他首次來台。內戰爆發不久，蘇拉威西島領袖蘇穆爾轄下的潘道少校便在美國中情局情報員西賽爾·卡特賴特(Cecil Cartwright)引薦下，於菲律賓取得一批美國提供的軍火。同時蘇穆爾又派他來台，希望解決軍火短缺的燃眉之急。²⁴此刻台北對於援助「印尼革命軍」展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興趣，潘道不但見到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國安局局長鄭介民和情報局高層等重要人物，且被告知台北將提供一批大數量的軍售給「革命軍」。對此潘道表示他需要與蘇穆爾商量，並詢問台北能否先提供一些「信心的憑據」，好讓他回去報告，於是隔日他被安排見到了陳文寬。

陳文寬既是美國中情局所支持的民航空運隊草創時期的成員、也是復興航空的創立者之一。事實上這並非復興航空頭一次接手類似任務。早年在美國中情局資助下，該公司便透過加掛油箱的水上飛機 PBY 運送武器給緬北的國民黨軍隊，證明自身具備秘密長程運輸的能力。早在「印尼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陳文寬便曾在國防部「介紹」下，親自駕駛 PBY 飛機運載步槍到中蘇門答臘北方的一個小島杜邁

²³中央社，〈潘道少校由菲抵台〉，《中央日報》(台北)，1958 年 2 月 24 日，第一版。

²⁴中情局對蘇穆爾的接觸與潘道對台北的接觸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這不禁令人聯想，兩者接觸或是得力於美國情報單位引薦，只不過現有公開檔案尚不足以證實此一論點。

Conboy, Kenneth and James Morrison. *Feet to the Fire: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Indonesia, 1957-1958*.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pp. 42-44.

(Dumai)。²⁵如今在國防部情報局指示下，1958年1月份，復興航空接手了此次援助「印尼革命軍」的行動，免去了政府直接介入的困擾。並由一名叫陶瑞安 (Jan Walandouw)²⁶的印尼華僑以海聯公司名義，代表「革命軍」與復興航空接洽。²⁷

在復興航空打點下，潘道於倉庫內見到了「上百箱」步槍。儘管這些武器大多是二戰時期日軍遺留的舊式軍火，其堪用程度令人擔憂，但至少能解決「革命軍」軍火供應的燃眉之急。在展現台北銷售意願與能力後，陳文寬以水上飛機PBY載著潘道經菲律賓一路南飛，透過低空飛行躲避沿途美軍雷達的視線，最終於蘇拉威西北端萬鴉老(Manado)附近海域降落。確定「革命軍」購買意願後，潘道得到一份印有中文化名的中華民國護照，前往歐洲將叛軍銷售椰乾所積存的資金從倫敦、蘇黎世匯到國民黨政府在香港的帳戶。²⁸

收到貨款後，中華民國政府即迅速開啟了對「革命軍」的武器銷售航線，自2月23日起至4月21日止以貨輪和空運方式，先後運送多達七個營的武器給「革命軍」(見表1)。²⁹除台北情報局提供的武器外，日後美國飛行員波普被印尼軍方擊落時，身上持有的飛行證也證實，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台北對「革命軍」的同情，以

²⁵ 據陳文寬說法，當時是一位王先生打電話到公司，稱自己得到國防部友人介紹，希望向復興航空租用飛機。見面時，王先生表示自己是印尼做生意的華僑，有批貨希望復興航空能幫他運到當地。當問及貨物內容，他左顧右盼一番後壓低聲音說道：「步槍。」震驚之餘，腦筋飛快的陳文寬立刻想起對方稱自己是國防部友人介紹，隨即意會此事應是國防部的意思。為求確認，接下「生意」前他還向國防部友人電話詢問，對方說這本是美國政府專案下的計劃，目的是避免共產黨控制印尼，只是[中華民國]空軍不便出面，也不便直接指示復興航空，所以就請對方自行來向復興航空接洽了。

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頁133-141。

²⁶ 陶瑞安，中文名又譯 Dao Swee-ann，印尼名 Jan Walandouw。某些文獻亦於名字前加上校 (Colonel) 軍銜。此人有多國護照且能言善道，且似乎與天主教會以及于斌樞機頗有關係，極為神秘。此次援助「印尼革命軍」，由他代表「革命軍」與復興航空簽約。由多年後他寫給蔣經國的書信來看，顯示直到「革命軍」失勢後，他仍長年與蔣經國保持聯繫。信裡他對印尼極深厚之感情也顯示，他很可能是一名蘇拉威西島土生的華人。另外某些英文學界的研究則猜測，此人可能曾為美國中情局工作，在1958年時負責與日本還有台灣支持「革命軍」的團體接觸。甚至傳言在1965年九三〇政變數月前，他曾代表蘇哈托(Suharto)至華府與美國接觸。日後他在東南亞從事林木和礦業的開採，與台南林業大亨林自西也有往來。

參考「陶瑞安函蔣經國為其在印尼之森林開發事業現獲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宜蘭木器廠需圓木供作業之用擬派市場調查員赴臺進行瞭解等」(1973年4月18日)，《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502-00699-001。和 Scott, Peter Da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58, no. 2 (1985): 239-64. Accessed January 13, 2021. doi:10.2307/2758262.

²⁷ 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頁155、181。

²⁸ Conboy, Kenneth and James Morrison. *Feet to the Fire: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Indonesia, 1957-1958*. pp. 42-44.

²⁹ 《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年6月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501.3_4022_1_2_00042132_031。

其在台組織民航空運隊持續給予「印尼革命軍」接濟，這也成為日後「蔣美合謀」說法的根據之一。

表 1：1958 年 2 月臺灣軍援印尼革命軍武器數量

| 武器 | 數量 | 彈藥 |
|------------|--------|---------------|
| 75 無後座力砲 | 14 門 | 890 發 |
| 87 迫砲 | 28 門 | 1,680 發 |
| 60 迫砲 | 63 門 | 3,780 發 |
| 79 重機槍 | 20 挺 | 140,000 發 |
| 88 式 75 高砲 | 2 門 | 4,000 發 |
| 25 機砲 | 12 門 | 40,000 發 |
| 30 重機槍 | 56 挺 | 152,050 發 |
| 30 輕機槍 | 260 挺 | 304,800 發 |
| 45 衝鋒槍 | 1204 支 | 240,500 發 |
| 卡柄(賓)槍 | 2480 支 | 423,960 發 |
| 英造 303 步槍 | 500 支 | 60,000 發 |
| 手槍 | 61 支 | 8,600 發 |
| 79 步槍彈 | | 200,000 發 |
| 手榴彈 | | 10,100 枚 |
| 炸彈 | | 100 枚(100 磅重) |
| 照明彈 | | 10 枚 |

中華民國政府對印尼內戰的前期參與，是直接導致日後印尼排華風潮的導火索，蔣中正和美國合謀幫助叛軍的論調也在印尼社會喧囂塵上。不過考量到菲律賓自內戰爆發之前，即承諾蘇拉威西反對勢力使用其境內基地。若菲律賓願意提供支援，參照陳文寬口述其透過低空飛行躲避沿途美軍雷達的辦法，台北要跳過美方私下援助叛軍，似非不可能之事。³⁰美國在台北大使館給予國務院的政情報告也顯示，中華民國對「革命軍」的援助可能並不全是美國授意、而有部分是台北私意所為。³¹

但至少在此一階段，台北對於「革命軍」的援助，確實與美國在印尼之戰略有若合符節之處。美國中情局也確實透過其在台「私人企業」——民航空運隊給予叛軍大量援助，這部分中華民國與美國至少存在有間接的合作。綜上所述，台北和華盛頓極可能在情報單位間私下達成了某種事實合作、或互不干涉的默契，不過在公開場合這就是只能做不能說的秘密。畢竟美國與印尼仍存在正式外交關係，而美國情報單位的行徑顯然已是針對印尼的敵對行為，一旦曝光將成為國際政治上的一大醜聞。此一國際關係的顧慮與美國行動方針間的矛盾，或者也可以由3月份蔣中正與杜勒斯在台北的會談、與4月底時印尼政府對美國的抗議事件得到側面說明。

第三節 蔣中正與國務卿杜勒斯的春季會談

為何台北會如此積極援助「革命軍」？儘管目前無充分資料確定美國中情局對台北有何種影響，不過從日後發展來看，無論是馬尼拉或台北，對印尼內戰的介入顯然都包含了強烈的自身考量。對菲律賓來說，印尼在南方與其毗鄰，能否避免其赤化攸關自身安危。而對中華民國而言，介入動機或可用《蔣中正日記》中若干記載，和3月份蔣中正與杜勒斯在台北的一場會談來做部分說明。

3月14日起，美國國務院預計在台北舉辦為期四天的遠東會議，由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勞勃森(Walter S. Robertson)主持，除有美國派駐遠東各地使節出席

³⁰ 菲國介入，請參見 Baskara T Wardaya, SJ, *Indonesia Melawan Amerika: Konflik Perang Dingin, 1953-1963*, Galangpress Publisher, Yogyakarta, 2008., pp.187-188; Audrey R. Kahin and George McT. Kahin, *op.cit.*, pp.188-189.

³¹ 「美國駐華大使館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三月之政情觀察及每日大事紀」(1958年4月28日)，〈中美關係(八)〉，《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62-003。此處中文為台北所藏檔案與英文隨附的譯文，若干涉及立場的用詞(如印尼革命軍、自由中國)與英文原文有些許出入，但並不影響整體文意。為求保留史料本身脈絡，筆者並未另做修改。

參加外，國務卿杜勒斯也預定於首日自馬尼拉親臨台北主持開幕。³²得知杜勒斯將在台灣作單日短暫停留後，蔣即開始思考與杜勒斯談話的要點。

日記中，蔣原先擬定的重點為反攻大陸、美國在日內瓦與中共之會談、東南亞公約加盟與美國是否承認中共。³³隨著革命軍基地被印尼空軍轟炸消息頻傳，蔣中正3月8日時在日記中稱：「此必俄共、積極掌握印尼政府之最好機會。」³⁴隔日又將「印尼革命軍協助問題」增列為談話要點第一項、改第二項為「共匪六月侵台情報與準備工作」。³⁵

14日中午國務卿杜勒斯與勞勃森抵台，下午宴會上蔣與杜勒斯談到印尼問題時，國務卿說明「其在蘇門答臘反共革命軍，已有武器與金錢充分之接濟」，蔣在日記中對此表示「甚為安慰」。但對於蔣所提派遣志願軍援助革命軍一點，杜勒斯則表示恐有損無益。³⁶

當夜九點半，杜勒斯臨行前與蔣在士林官邸會談，蔣再度表明假使蘇門答臘革命軍失敗，「整個印尼勢將淪於共黨控制之下」，因此他認為「對於印尼革命軍應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否則革命軍一旦失敗，將成為「共產黨與蘇卡諾之聯合勝利」、並稱當今情勢「如果印尼赤化，則整個亞洲的安全都將受其影響。」此論點獲杜勒斯同意後，蔣又繼續說：³⁷

假使由於某些原因，美國對於蘇門答臘的革命軍礙難逕予協助，則中[華民]國政府甚願就美國所能進行之任何計劃予以協助。如此辦理，美國即不致正式介入印尼糾紛，而中國政府亦庶能藉此對於吾人之共同目的，有所貢獻。其次，本人以為中共匪幫決定自北韓撤退其所謂『志願軍』一事，值得予以較目前更進一層的注意。本人認為此乃共匪陰謀之一部

³²中央社，〈美盼遠東使節會議勞勃森將來華主持 杜勒斯定十四日蒞會致詞史敦普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中央日報》(台北)，1958年3月10日，第一版。中央社，〈杜勒斯今蒞華將謁 總統晤談 美駐遠東各國使節紛抵臺北史敦普亦將於今午到達〉，《中央日報》(台北)，1958年3月14日，第一版。

³³《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47年3月4日)，頁22。

³⁴《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47年3月8日)，頁23-24。

³⁵《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47年3月9日)，頁24。

³⁶《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47年3月15日)，頁25。

³⁷「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對中共策略談話紀錄中英文稿」(1958年3月14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3-001。

分，如假以時日，必致原形畢露，雖則無人能料此一詭謀將導致何種結果，但本人確以為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撤退之舉。

儘管杜勒斯對印尼內戰問題，以「任何干涉其內政的明顯企圖，將導致其國家團結於蘇卡諾之下，而不能擴大其內部的分歧」為由回拒了蔣的盛情，仍詢問中共撤退與共黨「陰謀」所指究竟為何？

蔣中正答稱據手上情報指出，去年 11 月毛澤東前往莫斯科時已和俄共達成今夏攻台協議。自己初時對此情報雖「未予以過分重視」，但如今中共自北韓撤退，讓我不禁開始懷疑此間或有關聯，雖「不能確言共匪是否將對台灣從事此一進攻，但總以為中共匪偽或將於今夏之間，在某處做某種軍事上的冒險」。並猜測此地點可能為「台灣海峽」、「越南或亞洲其他地區」。³⁸

由五個多月後爆發的「八二三砲戰」觀之，蔣的判斷倒也非空穴來風，不過此刻杜勒斯則持相反意見，認為中共不致為攻台而減少朝鮮半島駐兵，理由是中共當知道撤軍後，台海戰事將招來韓國對朝鮮的反攻，而這並非中共所樂見。對此蔣仍堅持應嚴防注意，並進一步稱日本企業已然踏上中立主義的道路(按：就在 3 月 5 日中共與日本簽訂新的《中日貿易協定》)，東南亞各地又是紛爭迭起，亞洲在共產威脅面前充滿弱點，卻看不出美國有何積極作為，激問難道美國亞洲政策「已有所變動？」對此遠東助卿勞勃森趕緊插話，表示美國已與亞洲各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同時與東南亞七國簽訂東南亞公約，要言之，美國亞洲戰略就是堅定的「反共」。

對於勞勃森將防禦條約體系與「反共」劃上等號的說法，蔣中正顯然並不滿意。重申「亞洲所有的共黨威脅」來源就是中共，眼前「自由世界」只靠「防守」是不夠的。他雖未主張「非使用武力不可」，但應把握每個機會支持中國大陸反共力量，唯有消滅中共，才可能真正根除亞洲共產擴張的隱患。反過來說，他認為正因「自由中國」是中共征服亞洲的最大阻礙，所以他們首要目標必是攻取台灣，暗示如果不斷姑息，中共引發大戰將是遲早之事。並一再重申，應予其更多反共活動的自由空間，這樣非但不會引發大戰，還可以透過局部戰爭避免全面大戰。³⁹

³⁸「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對中共策略談話紀錄中英文稿」(1958 年 3 月 14 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3-001。

³⁹「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對中共策略談話紀錄中英文稿」(1958 年 3 月 14 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3-001。

對此言論，杜勒斯強調美國一向支持蔣「待機」反攻，但美國關心的是行動之先，「機會」是否真的存在。再度強調就大陸形勢，美、台雙方應有共同認知，但也未直接否定蔣中正所提支持中國大陸反共力量的說法。當日蔣在其日記中記曰：「擬定對杜勒斯談話要旨及對杜談話實際結果，大致無誤。其效果如何，未可斷言……印尼革命軍形勢尚佳，美已事實協助矣。」⁴⁰

由蔣以上發言，足見在援助革命軍一事上，台北並非單純從屬於美國意志而行動，而是相當程度基於自身戰略考量而主動介入。蔣在談話中將印尼反共問題與中共在朝鮮半島撤退並陳，似乎在暗示著中共活動與印尼共產威脅合流的危險，將印尼的反共擴大解釋為一種對東亞共產活動的圍堵。對話顯示蔣這麼做，除迎合美國圍堵共產的戰略，也與「共匪六月侵台情報」有關。由日後發展來看，蔣對印尼的積極態度，實則包含了亞洲反共，和台海防患未然、甚至後發制人數種面向的戰略推想。

會談除展現蔣中正對於印尼內戰的高度關注，也顯示此刻台北與華盛頓之間，對於援助「革命軍」一事未有官方的合作協議。作為密秘行動，此事雖明顯出於各自政府授意，卻自一開始就有著微妙的「非官方」性質。不過蔣顯然不滿足於此，對杜勒斯的連番詢問試探，一方面表明他進一步擴大行動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蔣此刻對於美方政策並無絕對把握。最後國務卿杜勒斯雖婉拒了蔣的熱心，不過綜合杜勒斯下午所說「革命軍」已獲得充分接濟、及臨行前對於應盡可能幫助「革命軍」觀點的肯定，也讓蔣確認了美國將繼續支持「印尼革命軍」，從而感到安心。

然而此一讓台北尚能樂觀的狀況顯然並不持久，就在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談話結束後不久，「革命軍」在戰場上接連失利的消息陸續傳回台北。3月15日，參謀總長王叔銘在日記中寫道：「印尼內戰已繼續展開，政府軍較為得勢。革命軍可能遭遇圍殲卻不及支援即失敗，我援助革命軍之政策迄未得上層之指示。」⁴¹

⁴⁰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3月15日），第十一冊，頁25。

⁴¹ 《王叔銘日記》，（民國47年3月1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17，頁45。

第四節 印尼對蔣美合助叛軍的指控

美國對於中華民國內戰初期的這些行動究竟有多少參與、多少掌握？這似乎是歷來學者們所難定論的謎題。因為依據目前可見的官方文件與現存的口述研究，似乎都無法對此給予更細部的說明。但另一方面，美國中情局利用其所支持的民航空運隊在台灣大肆從事援助叛軍的活動、台北在內戰初期即大力接濟叛軍也都是事實。反映了台北和華盛頓情報單位透過私人名義經手行動、以與政府單位脫鉤。

隨著 4 月下旬叛軍在蘇門答臘的潰敗，印尼內戰的結束似乎指日可待。然而隨著政府軍進駐叛軍據點，印尼政府發現越來越多證據指向外力的介入。正當此刻，北蘇拉威西島的叛軍在附近海域展開頻繁空襲，讓原先認為已削弱叛軍力量的印尼政府陷入極深的焦慮，同時印尼社會關於「外部介入」的懷疑與不滿開始喧囂塵上。

4 月 30 日蘇班德里約(Subandrio)召見美國大使鍾華德(Howard P. Jones)，向他發出照會、請求美國協助阻止台灣對叛軍的援助。見面時他先詢問鍾華德美國政府是否認為哈達是一個反共的政治人物，而對他抱有好感？提問得到證實後，蘇班德里約開始說服鍾華德，印尼政府絕非如美國所想的左傾，雅加達許多高層都已警覺到共產主義的威脅，願設法遏止共產黨在當地的擴張。現在他懇求美國做些什麼，讓他們得以反駁這些宣稱美國已背叛印尼合法政府、支持叛軍的指控。⁴²

對於蘇班德里約所提的反共意願，鍾華德深表欣慰同時，也拋出兩個問題：「一、蘇卡諾是否同意剛剛他所說的[關於他對共產黨的顧慮]？二、印尼打算採取什麼樣的步驟來對付共產黨？」對此蘇班德里約承認蘇卡諾還尚未有這樣的思維，但印尼政府內其他人正在設法引導他，希望當前軍事衝突告一段落後，能讓他對此事[共產黨的威脅]有更直接清楚的認識。針對第二個問題，蘇班德里約說現在還無法明確地回答，但將來如果民主手段不可行，必要時印尼會動用堅持反共的陸軍來對付共產黨。儘管沒有證據，但印尼政府斷定印共應是得到蘇聯或中共政府的金援。蘇班德

⁴²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April 30,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5.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5> (2020 年 4 月 30 日)

里約表示，歷史證明一個國家一旦走向共產，就無法回頭了。如果印尼要在民主框架下阻止共產黨，蘇卡諾對群眾的影響力將是他們所需要的。⁴³

強調完印尼反共意願後，蘇班德里約旋即針對叛軍得自台灣的軍火提出照會，請求美國代為向中華民國政府抗議。他表示有文件顯示當地叛軍至少從外部獲得了一萬件輕武器、外加火箭筒和飛機。另外印尼情報人員早前也報告，萬鴉老的叛軍在最近收到三千件輕武器，且當地叛軍所持有的三架轟炸機和兩架野馬式戰鬥機，每次出動耗油約需七萬五千美元，印尼政府認為他們有證據相信這些武裝事實上得自外國政府支持，希望美國設法解決此一狀況。⁴⁴

儘管蘇班德里約未直接指控美國或中華民國政府幫助叛軍，卻也相去不遠。他向鍾華德強調，印尼政府認為他們已建立明確的事實，就是這些飛機來自台灣，並由美國人和中國人所駕駛。他強烈要求美國若無其他顧慮，務必採取行動回應此要求。又說此刻舉國上下瀰漫著一股對親國民黨政府的華人的不滿，若繼續有證據顯示來自台灣的參與，情況恐將一發不可收拾。⁴⁵雖然我們無法確定蘇班德里約手中「文件」所載之武器是否全數來自台灣，但依據《國防部檔案》和衣復恩、陳文寬等人回憶錄記載，台北秘密銷運武器給「革命軍」絕對是鐵錚錚的事實。4月28日一份美國駐華大使館遞交給國務院的政情報告也顯示在同情「革命軍」同時，台北部分官員對於雅加達可能的報復深感憂慮：

印尼革命發生以來，中[華民]國報紙深表關切，並公開同情革命軍，在公開立場中國政府一直維持其不介入態度，但私底下中國官員莫不一致希望印尼革命成功。印尼政府攻擊自由中國以武器裝備援助叛軍，自由中國已加否認。但若干跡象顯示，自由中國某些機構確與印尼革命軍有秘密聯繫，中國深恐印尼政府將對印尼中國國民黨方面採取報復行動，

⁴³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April 30,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5.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5> (2020年4月30日)

⁴⁴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April 30,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4.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4> (2020年4月30日瀏覽)

⁴⁵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April 30,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4.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4> (2020年4月30日瀏覽)

因而對忠貞華僑發生不良影響，當印尼革命軍情況每況愈下時，中國有關方面對印尼可能報復之憂慮與時俱增。⁴⁶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人員可能大都並非美國秘密行動的參與者，對內情所知也有限。但台北對「革命軍」強烈同情的態度，顯然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蘇班德里約在照會當日就富於暗示地向鍾華德表示：「眾所周知，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有強烈的影響力」(Everyone knew US Government had great influence with GRC)。並在印尼政府未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情況下，希望美國政府代為轉達印尼立場。

鍾華德回報國務院時稱蘇班德里約急切非常、近乎絕望地希望美國明白，印尼領袖們有對抗共產主義的決心。同時也觀察到印尼內部相信美國政府對此事有直接涉入的信念正在滋長，擔心一旦美國被界定為叛軍同路人，將使共產黨從中獲得機會。他建議國務院應在避免指控中華民國參與的前提下，透露華府將與台北討論此問題，並依照此前聲明，重申當前衝突為印尼事務，「任何對其內部紛爭的介入都有悖於美國政策」。⁴⁷

同日，印尼總理鍾安達(Djuanda Kartawidjaja)公開發表了一篇措詞強烈而謹慎的談話，呼籲外界停止一切「不友善」行為。⁴⁸雖然英國和澳洲駐印尼大使都認為，鍾安達已盡力避免將矛頭指向華府或台北，不過在鍾華德看來，談話在廣大印尼人民眼中仍無異於政府相信美國涉入其中的宣言，擔憂衝突焦點將變為印尼民族與外國勢力的對抗。他也判斷美國利用叛軍給雅加達決策者施壓的做法，在這種民族情緒

⁴⁶ 此處中文為台北所藏檔案與英文隨附的譯文，若干涉及立場的用詞(如印尼革命軍、自由中國)與英文原文有些許出入，但並不影響整體文意。為求保留史料本身脈絡，筆者並未另做修改。以下為英文原文：The revolt in Indonesia aroused much interest in the Chinese press, which showed undisguised sympathy for the rebels. Publicly, the GRC maintained a correctly noncommittal stand, but privately GRC officials left no doub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the rebels succeed. The charges made by the Indonesia Government that arms and equipment were being supplied to the rebels from Taiwan were denied as unfounded. But there were indications that certain GRC agencies were covertly in touch with rebel group. A major element on the GRC concern was that the Djakarta Government might take retaliatory measures against KMT groups in Indonesia which would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loyal overseas Chinese in general. This possible repercussion received more and more official attention on the part of the GRC agencies involved, as rebel prospects worsened.「美國駐華大使館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三月之政情觀察及每日大事紀(1958年4月28日)，〈中美關係(八)〉，《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062-003。

⁴⁷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April 30,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4.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4> (2020年4月30日瀏覽)

⁴⁸ 中央社，〈印尼總理朱安達竟誣我與美國援助印尼革命〉，《中央日報》(台北)1958年5月1日，第二版。

下都將失效，讓蘇聯等共產勢力得到同樣介入的藉口。而基於蘇班德里約的照會，僅請求美國阻止對叛軍的援助，未直接指控美國參與，鍾華德認為照會提供了美國一個「不必對號入座」(without in effect “putting on shoe which fits”)的回應機會。⁴⁹

對於鍾安達極力隱晦的指控，美國艾森豪總統稍後在記者發佈會回應稱所有叛軍底下總有些「為錢而戰的士兵」，隔日國務卿杜勒斯也表示或許有些美國「冒險者」支持印尼叛軍，但「在全世界都有美國人從事這樣的冒險事業」，法律上美國沒有義務去控制這種私人行為。⁵⁰美國總統和國務卿上述發言，雖未否認叛軍得到外界援助的可能，卻將此定調為「私人行為」，華府與之無涉、也無從過問。

對於華府高層這一說法，雅加達顯然認為自己的暗示並未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覆。5月3日，印尼外長再度召見鍾華德，請求美國設法與中華民國政府交涉，停止這些美國和台灣「冒險者」的轟炸行為。並表明雅加達內部部分海空軍將領已開始懷疑美國海空軍涉入其中，但蘇卡諾總統、鍾安達總理、納蘇遜將軍(General Nasution)或他個人都不願相信美國有所涉入。他提醒美國，轟炸正在印尼政府內製造緊張情緒，如今印尼政府內已出現是否要和美國斷交的討論，原本部隊甚至希望鍾安達能在聲明中加入對美國的直接指控，但被鍾安達拒絕了，因為總理和他擔心這將給共產黨可趁之機。⁵¹

之後，外長又用軟硬兼施的方法，再次申明雅加達願意合作，政府內已達成共識必須遏止共產黨的擴張。另一方面也強調，「指導式民主」是印尼的「本土民主」(indigenous democracy)，絕無共產成分。印尼需要美國提供武器加強軍力，以抵禦共產的威脅。現階段若無法停止叛軍的轟炸，他們只好把問題帶到聯合國。

蘇班德里約接著向鍾華德展示一連串外國介入的證據，表示位在美國舊金山馬克阿里司特街(McAllister Street)684號的美國銷售公司(American Sales Company)的賀茲克(R. S. Hirsch)發了一份電報給武吉丁宜的江貝克上校(Colonel Djambek)，

⁴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May 2,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7.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7> (2020年4月30日瀏覽)

⁵⁰ 新華社，〈朱安達總理根據充分證據譴責美蔣幫助叛軍空襲杜勒斯拒絕停止支持叛亂份子〉。《人民日報》(北京)，1958年5月3日，第六版。

⁵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May 3,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8> (2020年4月30日瀏覽)

裡頭提到將提供五萬支 7.35 釐米半自動式步槍，與一千五百萬發子彈。同時他還宣稱印尼發現牽涉到台灣國安局局長鄭介民的文件，裡頭顯示鄭介民將 C-47 運輸機轉交給叛軍，飛機駕駛為美國人、副駕是中國人。⁵²而鄭介民是根據新加坡美國海軍的指示行動的。同時他們也得到證據證明一名叫 Li Chung Sie 的將軍正在擔任叛軍的軍事顧問，該顧問又被稱為 Lie Chi-chun，印尼情報圈都稱他為 C. C. Li，是國民黨長期在印尼活動的情報頭子，蘇班德里約甚至說他們已掌握該員在情報系統的序列編號。⁵³

針對這些「證據」，鍾華德表示軍火公司是生意人，他們銷售軍火並不代表美國涉入。外長立刻打斷表示，自己沒有說美國政府涉入，他只想表明印尼有充分證據證明叛軍背後確實存在外援，而他們相信美國有能力協助解決這一問題，無論是透過美國和中華民國接觸、或其他方式，印尼只希望這令人喪氣的轟炸能夠停止。儘管蘇班德里約重申無意指控美國涉入，但事實上此刻雅加達高層早已確信美國政府參與了這些行動，不過為避免與美國決裂，刻意避開直接指控，而不斷透過迂迴方式暗示美國停止這類行為。似乎也感受到這種「盡在不言中」的壓力，鍾華德在電報中多次敦促國務院設法作出回應。同時間，英國駐印尼大使也私下建議鍾華德：(1)須設法讓轟炸停止，否則事態將不可收拾。(2)給予雅加達所要求的至少部分武器，否則損失將不可想象。鍾華德 5 月 3 日在電報中建議國務院，美國應設法在蘇班德里約 5 月 7 日的國會報告前採取行動釋放善意。⁵⁴

鍾華德的建議和擔憂，顯然被華盛頓納入了考量。5 月 4 日與英國駐美大使加西亞爵士(Sir Harold Caccia)對話時，國務卿杜勒斯表示，美國正與雅加達的友好份子對話，尋求政治解決的途徑。當大使問及美國是否可能公開介入印尼時，杜勒斯

⁵² 值得注意的細節是，衣復恩在回憶錄中曾提及，中情局在台外圍組織民航空運隊(CAT)名義上雖是一家「中國的」航空公司，但長期以來正駕駛卻都是由美國人擔任、中國人僅能擔任副駕駛，此處印尼情報可說是與衣復恩對民航空運隊的描述不謀而合。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 287-288。

⁵³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May 3,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8> (2020 年 4 月 30 日瀏覽)

⁵⁴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May 3,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8> (2020 年 4 月 30 日瀏覽)

相當篤定表示當今局勢若美國公然介入，只會對他們的遠東政策產生悲劇性的結果。

⁵⁵強調如果叛軍在戰場上有認真作戰，美國早已承認它的交戰權了。⁵⁶

正當華府和雅加達展開「對話」的同一時間，「自由世界」卻未就此放棄對叛軍的支持。蘇拉威西一帶轟炸的持續未絕，讓印尼社會之不安、及排外情緒與日俱增。5月5日，雅加達衛戍司令忽然下令逮捕轄區內所有「國民黨團體」的領袖，僑團、黨部、學校校長、報社主編在內，有五十餘人被捕。之中也包含該時具有中華民國立法委員身份、並擔任國民黨印尼支部總負責人的馬樹禮，以及日後返國從事華僑研究的著名學者丘正歐。⁵⁷這些人都被送到一座島上的集中營、直到1959年9月獲釋，被囚一年有餘。⁵⁸自此為始，印尼在接下來一年陸續採取了諸多措施，限縮華人的居住遷徙、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成為當地自獨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排華風潮。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對「革命軍」的援助，二百萬印尼華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僑社中不少人自始至終都相信自己的國家是無辜的[中華民國]，認為這些「援助叛亂」的指控純屬誣賴，孰知一切正是因自己所相信的國家而起，讓日後一些得知真相的人不禁感嘆國家所為實釀成了一場民族的浩劫。⁵⁹

僑領被捕同日下午四點半，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向葉公超轉述4月30日印尼外交部長蘇班德里約給予美國駐印尼大使鍾華德的照會，印尼表示他們相信叛軍的飛機是由中國國民黨人所駕駛的，葉公超旋即詢問莊萊德印尼是否指控中華民國政府援助叛亂？莊萊德表示印尼沒這麼說，但他們強調他們相信這些來自台灣的飛行員、彈藥、飛機不可能在未獲中華民國政府知情的情況下離開台灣。莊萊德又補充

⁵⁵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Copenhagen, May 4,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79.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79> (2020年4月30日瀏覽)

⁵⁶ 英國此刻的詢問，應是延伸自四月上旬國務卿杜勒斯與英國駐美大使加西亞的一場對話。談話中，杜勒斯針對印尼問題提出了三種腹案請英國評估可行性：「一、若叛軍能持久抵抗，美國將承認叛軍為交戰團體。二、若蘇門答臘獨立則給予承認並保證其獨立地位。三、若損害及美國人財產，美國將派軍進入印尼。」杜勒斯強調美國未排除拉攏蘇卡諾的可能，但若蘇卡諾缺乏改變意願，他們應有行動的決心。對此加西亞認為當前印尼情況以兩種解決途徑為主，一是支持叛軍、另一則是設法打開印尼政府的窗口，即所謂兩線並進的策略。但對於杜勒斯所提腹案，倫敦認為承認交戰團體的可行性令人「十分懷疑」，他們會再追蹤杜勒斯所提第二、第三種作法的可行性。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April 13,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57.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57> (2020年6月17日瀏覽)

⁵⁷ 丘正歐，《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5)，頁262-267。

⁵⁸ 丘尚堯，〈丘正歐博士事略〉，《僑協雜誌》，第73期(2001年6月)，頁28-29。

⁵⁹ 郭奇榮，〈衣復恩回憶錄中道出參與一九五八年支援印尼叛軍行動〉，《印尼僑聲》，第138期(2012年3月)，頁24-25。

表示，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不久前發佈了一項聲明稱：「美國政府沒有法律可以控制參與此類冒險行動的美國國民，也因此美國無法為這些個人行為的後果擔負責任。」(United States had no legal control over its nationals participating in such adventures and that it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personal activities.)他詢問葉公超對上述內容是否有任何回覆？心領神會的葉公超立刻表示希望國務院轉達以下私人信息給印尼外交部長：⁶⁰

中[華民]國政府未曾允許任何的空軍飛機前往印尼，更沒有讓任何彈藥出境。談到飛行員，沒有任何中國空軍飛行員可以在未經中國空軍總部允許情況下離開台灣，中國空軍總部也未曾允許任何人前往印尼。那些參與在印尼戰爭的海外華人，中國政府無法一一檢查或辨別。中國政府也無法避免任何居住海外的中國人在其他國家從事軍事或政治上的冒險。

然台北此一在美國暗示下作出的保證還未傳到印尼，同日深夜在雅加達，鍾華德再次受邀到總理家中與總理鍾安達和外長蘇班德里約二人單獨會面，總理和外長神情前所未有地凝重。總理率先開口道他擔心印尼與美國的關係已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結果將視這幾天發展而定。他向這位美國大使攤牌表示，印尼政府之前雖然沒有明講，但他們的確認為美國在支持叛軍，而這件事令他們沮喪與不解。他們本來期待攻克武吉丁宜後，就能夠和剩餘叛軍達成政治協議，但轟炸的出現逼使他們只能使用武力。他們原先打算封鎖蘇拉威西島附近海域，讓一切在時間中塵埃落定，而如今看來這是不可能了，現今發展似乎就是美國打算分裂印尼，以維持一部分非共產的印尼。他說，這只會帶來悲劇性的結果，並給共產黨可趁之機。他甚至收到印尼駐馬尼拉大使回報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正被用於援助叛軍，不管美國是為了什麼，他只希望美國能有所調整，印尼願釋前嫌、同美國合作。鍾華德對此深示震驚，說不曉得有這樣的事，詢問印尼對此是否有證據，他將盡快和國務院確認。鍾安達

⁶⁰ 以下為葉公超回答之原文：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given no clearance for any Chinese Air Force plane to leave for Indonesia, much less for any ammunition to leave the country. As to pilots, no Chinese Air Force pilots could have left Taiwan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Headquarters. The Chinese Air Force Headquarters had given no permission to anyone to leave for Indonesi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utrally has no way to check or identify any person of Chinese origin resident overseas taking part in the war in Indonesi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has no way to prevent any Chinese living abroad to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or political adventures in other countries. 參考〈印尼排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11-01-21-09-03-001，頁 152-156。

回答說他們的證據主要來自印尼駐馬尼拉大使的報告，並急切表示，他認為印尼和美國的關係將取決於華府對他此番呼籲的回應。⁶¹

對於鍾安達的懇求，6 日下午國務院指示鍾華德感謝印尼的坦誠，重申美國的印尼政策始終是希望一個經濟可靠、政治穩定團結、自由且獨立的印尼，而非一個分裂或被共產黨控制、影響的印尼。並再次強調他們並未控制這些轟炸和叛亂份子的外國僱員，所以對這些事他們無能為力。並請鍾華德轉達 5 月 5 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向他們提出的保證，台北未曾允許任何軍火被運往海外。美國也可以保證新加坡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美國海軍都沒有參與援助叛軍，如果印尼手上有任何文件，美國可以斷言那不是真的。⁶²

儘管華府和台北仗著印尼缺乏絕對證據而對這些指控否認到底，但另一方面，華府內部也開始出現反思的聲音，認為如果雅加達內部仍有願意反共的人物，華府就不該逼他們站到美國的對立面。時任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的史敦普上將(Admiral Felix Stump)就對海軍作戰部長柏克上將(Admiral Arleigh Albert Burke)表示：⁶³

如果華府的想法正如政府中某些人一樣，相信印尼陸軍、或雅加達內部不存在抵抗共產的決心，那我們對鍾安達的請求當然可不予理會。然而，只要最近[駐印尼大使]的報告中有任何跡象顯示雅加達仍存在抵抗共產勢力的意願，我們將為拒絕雅加達可能的反共行動而負上更大的風險。

同時美國也開始與印尼政府的陸軍人員接觸，希望藉由陸軍反共態度避免雅加達左轉，牽制親共的印尼空軍。⁶⁴台北顯然也嗅到了這一搖擺的空氣，5 月 18 日王叔銘在日記中寫道：「印尼革命軍已走上失敗之道路，美方對之舉棋不定，但共產黨已

⁶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May 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80.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80> (2020 年 4 月 30 日瀏覽)

⁶²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Washington, May 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8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81> (2020 年 4 月 30 日瀏覽)

⁶³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Stump) to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Burke), Honolulu, May 7,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8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83> (2020 年 6 月 5 日)

⁶⁴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Editorial Note, Washington, May 8,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85.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85> (2020 年 6 月 5 日)

滲透其中，正在大量援助。中東、南亞危險。」⁶⁵而決定美國內部此一搖擺結果的關鍵恰恰是同日的在印尼發生的波普事件。當日，一架由美國飛行員波普所駕駛的 B-26 轟炸機在前往安汶(Ambon)島執行任務時，遭印尼政府軍擊落，波普跳傘生還後被俘。該員所著制服、隨身攜帶的飛行證和任務指示，都顯示他是美國軍方的人員、並受僱於位在台灣的民航空運隊。⁶⁶這件事成為美國秘密支持叛軍的鐵證，讓華府倍感難堪同時，不得不承諾放棄暗中支持叛軍的兩面策略，以免和印尼外交關係的破裂，此一轉變也導致台北和華盛頓之間想法的更趨分歧。這正是帶有蔣中正濃厚個人意志之「南海計劃」的出台背景。



⁶⁵《王叔銘日記》(民國 47 年 5 月 1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18，頁 84。

⁶⁶直到數月後波普在印尼開庭受審時，其行動是否有受到中華民國政府支持仍是外交上備受爭論的議題。參考《外交部》，〈美籍波普 pope 協助印尼革命政府工作被捕與我國無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11-01-21-04-01-005。

第三章 蔣中正推動「南海計劃」與美方的反應

第一節 蔣中正推動「南海計劃」前與美方的交涉

1958年5月初，時值印尼內戰末期，以反共和政治改革為訴求的叛軍接連失守蘇門答臘據點後，在蘇拉威西島展現了異常堅強的作戰意志。在一場成功的兩棲作戰中，叛軍一度重新奪下蘇拉威西島旁的摩羅泰島(Morotai)和島上的機場，並在外部幫助下持續作戰。¹然而隨著政府軍反撲，叛軍逐漸不支。雖然他們不斷向之前給予其支持的美國情報單位求援、希望獲得更多援助，但考量到5月18日，一架由美國僱員所駕駛的叛軍B-26轟炸機遭政府軍擊落，駕駛波普連同其攜帶的身份證明文件和任務指令皆遭印尼政府捕獲，為挽救與印尼的外交關係、避免其負面影響擴大，美國終止了對叛軍的所有援助。

正當叛軍孤立無援，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卻向他們伸出了援手，那就是印尼叛軍的二號贊助者——蔣中正。早自1958年2月份內戰爆發之初，台北就在美國中情局仲介下成了蘇拉威西島叛軍主要的武器供應者。作為1949年國共內戰失敗後，曾一度遭美國拋棄的政治人物，蔣中正此刻對這些反共「革命者」的處境似乎有著非比尋常的同情。儘管國際上普遍認為蔣中正在台灣統領的不過是一個沒有美國支持就無以為繼的政權、其對叛軍的支持也之前被雅加達解讀為在美國影響下所為，但此刻面對命在旦夕的「印尼革命軍」、與中共即將參戰的風聲，蔣中正顯然並不打算追隨美國的放棄路線。

1958年5月下旬時，組成「革命軍」的兩大地方軍人勢力，僅剩蘇拉威西島北方由蘇穆爾上校所率領的「全面鬥爭憲章」尚存抵抗政府軍的力量。最早帶頭宣布成立「印尼革命政府」的中蘇門答臘部隊，在士兵嚴重缺乏作戰意志下，4月底時就已幾乎喪失所有據點。5月4日「印尼革命政府」首都武吉丁宜失守後，更是聲勢大潰。北蘇拉威西島的「全面鬥爭憲章」成了如今「印尼革命軍」的最後希望。²

¹ 美聯社，〈印尼革命軍 佔領摩羅泰〉，《中央日報》(台北)，1958年5月9日，第二版。

² 美聯社，〈印尼革命軍首都 武吉丁宜陷落 革命政府已遷至巴杜山加〉，《中央日報》(台北)，1958年5月6日，第二版。

正當美國終止秘密行動、叛軍處境日益艱難的時刻，或許是回應稍早「革命軍」表明「歡迎亞洲志願軍」的說法，5月20日某位印尼官員對媒體表示，中共已向他們表示願以數千名志願軍派赴印尼，官員強調印尼並未向中共提出此要求，但中共「在等待我們的信號」。而此一聲明顯然是針對台北而來，該官員表示若中華民國軍隊在東印尼登陸，屆時印尼政府將別無選擇。³22日香港又傳來消息，稱中共正秘密組建三個師的「志願軍」。⁴與此同時，21日印尼政府軍宣布佔領北蘇拉威西的哥倫打落，朝著萬鴉老的「革命軍」基地步步進逼。一連串發展，讓「印尼革命軍」處境風雨飄搖。

中共出兵印尼的傳聞雖被部分觀察家認為可能性不高，但顯然已足以引起蔣中正的重視、並成為蔣中正進一步介入印尼的藉口。⁵在蔣中正認知中，「印尼革命軍」的存續與對中共的防堵，兩者可說是互為因果的戰略佈局。5月22日下午五點半，蔣中正在士林官邸招待美國海軍上將費立德(Harry D. Felt)夫婦，在座者有國防部長俞大維、外交部長葉公超、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夫婦，美國大使莊萊德夫婦、協防台灣司令竇亦樂(Austin K. Doyle)中將夫婦。六點多茶會結束後，賓客散去，蔣中正獨留莊萊德與之談話，並由葉公超在場翻譯。⁶

蔣對莊萊德表示，印尼政府軍已佔領西里伯斯島東面的摩羅泰島，該島有良好機場，倘若「革命軍」不能復取該島，「革命軍」將難以支持。又說他已聽聞美方志願軍並無協助「革命軍」收復該島的計劃，自己在3月中與杜勒斯國務卿談話時，曾提議由「自由中國志願軍」給予「革命軍」適當援助，阻遏共產黨在印尼的擴張。當今局勢危急，不容稍緩，他請求莊萊德急電國務卿，重申前議，給予「革命軍」有力支援。言畢，蔣中正取出一地圖，表示「革命軍」已收復哥倫打落(Gorontalo)，故萬鴉老暫可防守，但如不早日收復摩羅泰，萬鴉老防守將無法持久。他主張，如美方因為與印尼有外交關係不便出面，他甚樂意派遣志願軍單獨支援「革命軍」，

³ 美聯社，〈匪圖派數千「志願軍」與印尼革命軍作戰 波捷共黨政權亦作同樣表示〉，《中央日報》(台北)，1958年5月21日，第一版。

⁴ 中央社，〈共匪密組「志願軍」三師 準備遣往印尼參戰 並派遣「文工團」作政治滲透〉，《中央日報》(台北)，1958年5月23日，第一版。

⁵ 中央社，〈匪揚言派軍赴印尼 港觀察家認為 實際上不可能 因匪無法運送軍隊〉，《中央日報》(台北)，1958年5月22日，第一版。

⁶ 「蔣中正以茶會招待美國海軍上將費立德夫婦並於茶會畢後與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就援助印尼革命軍事進行談話」(1958年5月22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4-008。

惟美方須借給其武器。並宣稱「革命軍」已向台北請求協助克復摩羅泰島，台北如今正計劃派遣空軍一大隊、及陸戰隊一團前往參戰，行動前他想獲悉美方態度。⁷

對於蔣中正的急切態度，莊萊德表示自己對印尼事務不熟悉，或許無權發表什麼意見，不過引用國務卿杜勒斯3月來台時所言，指出「印尼革命軍」不缺武器與彈藥，而是缺乏堅定的作戰意志。現今蘇門答臘的失守與演變，亦證實國務卿之顧慮並非沒有道理，希望蔣出兵前再三思。⁸且他擔憂蔣所提介入方式，恐使其他共產國家同樣得到公開介入的藉口。⁹蔣中正則辯稱，美方當知道「革命軍」缺乏訓練與組織，如果不給予其援助，則其士氣將更加消沈，而失自信，如此一來，印尼政府軍勢將其全數消滅。倘若事態至此，將為整個「自由亞洲最不幸之事」。說著蔣取出一地圖，指出蘇卡諾實際上已接受蘇俄與中共之援助，圖中顯示蘇俄已假藉捷克之名，將六架伊留申十四式飛機(IL-14)經北平、西安、昆明、仰光送至雅加達。另外尚有五架飛機，因天候因素，在伊爾庫茨克(Irkutsk)待命。說完蔣便將該地圖交予莊萊德參考。¹⁰

最後蔣中正表示，倘若中共軍隊進入南中國海，則菲律賓、澳洲、台灣安全都將遭受威脅，台北對此極為重視，尤不能坐視印尼全部陷入共黨之手。他已經做好準備，一旦中共介入就會有所行動。最後莊萊德仍表示，假使「印尼革命軍」本身無鬥志，則外國志願軍將失去協助目標。蔣中正則堅持「革命軍」亟待外援、尚未完全瓦解。談話後，外交部長葉公超私下向莊萊德表示，自己並不贊成蔣的想法，早上已花了一小時說服總統放棄對印尼進一步介入，不過蔣仍不願放棄。當日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報告中，莊萊德指出蔣中正談話時神情急切，但他認為蔣在美方回應

⁷ 「蔣中正以茶會招待美國海軍上將費立德夫婦並於茶會畢後與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就援助印尼革命軍事進行談話」(1958年5月22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4-008。

⁸ 「蔣中正以茶會招待美國海軍上將費立德夫婦並於茶會畢後與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就援助印尼革命軍事進行談話」(1958年5月22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4-008。

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y 22,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0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08> (2020年4月30日瀏覽)

¹⁰ 「蔣中正以茶會招待美國海軍上將費立德夫婦並於茶會畢後與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就援助印尼革命軍事進行談話」(1958年5月22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4-008。

前擅自將提議付諸施行的可能性不高。¹¹雖然莊萊德認為蔣不會輕舉妄動，不過蔣的日記則顯示他此刻介入印尼的決心並非空談：¹²

我國必須派海、空軍與陸戰隊一團協助革命軍，恢復秦爾太島(按：即摩羅泰)空軍基地，以堅定其革命陣勢，否則印尼赤化，無異喪失中國大陸之第二，美國不僅應負其歷史之責任而已。

無獨有偶，蔣中正並非第一位將印尼視為「中國大陸第二」的人，早在 1953 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康明即將至印尼赴任大使前，便曾在信中向其提到美國在戰後對中國因為過於堅持維持統一重要性，終至中國赤化的悲劇，提醒他當以此為鑑。¹³不過諷刺的是當面對外交上現實處境，美國政策不得不又改弦更張時，蔣中正彷彿從印尼內戰中看到了自己當年遭棄的場景。與國務卿杜勒斯所不同的是，蔣中正此刻對「革命軍」的關懷除包含對印尼赤化的擔憂外，多或少也是因為對「革命軍」的同病相憐之感。

蔣中正與莊萊德談話隔日中午，莊萊德帶著杜勒斯國務卿的回覆至總統府辦公室面呈於蔣，並由葉公超當場翻譯。杜勒斯在信中簡短表示，此刻美國正透過拉攏雅加達內部反共人士牽制蘇卡諾親共言行，對「革命軍」擴大援助並不符合美國當前對印尼之政策，盼蔣在雅加達形勢明朗前「暫勿採取任何計議中之行動」，承諾若美國當前政策無法取得成果，願再與蔣商議其計劃：¹⁴

鑑於革命軍在蘇門答臘島因缺乏鬥志而潰敗，又鑑於西里伯斯島面積過小，在軍事上不易施展，吾人正設法擴張雅加達政府中反共份子之勢力，盼能牽制蘇加諾及阻遏印尼親共之趨勢。在吾人尚未確知雅加達政府是

¹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y 22,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0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08> (2020 年 4 月 30 日瀏覽)

¹²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 47 年 5 月 22、23 日)，第十一冊，頁 55。

¹³ Gardner, Paul F.,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s: Fifty Years of U.S.-Indonesian Relations*, Paul F. Gardn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p.133.

¹⁴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電蔣中正美國正設法擴張雅加達政府反共分子之勢力盼能牽制蘇加諾及阻遏印尼親共之趨勢在未確知雅加達政府是否接受勸導前請暫勿行動」(1958 年 5 月 23 日)，〈外交—抵禦國際共產侵略以保衛亞洲安全〉，《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38-005。

否接受吾人勸導以前，務請閣下暫勿採取任何計議中之行動。倘吾人所期望於雅加達政府之行動不獲實現，余願於彼時再與閣下磋商此一問題。

葉公超報告完後，蔣答稱：「彼願等待杜勒斯國務卿之消息。」但轉身又告訴莊萊德：¹⁵

昨日香港報紙消息，匪共準備派遣三個師赴印尼參戰，現先派一個混合師。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匪共此一行動，對台灣之安全構成威脅，故將於今日發表聲明...倘匪軍或所謂志願軍者出現於南中國海之任何區域，中國政府即將其視為對台灣安全之威脅，因此，中國政府將對該項匪軍之行動，保留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

蔣強調這些措施是台北為自身國家安全之故，保證絕不影響美國[在印尼]之地位，甚至有機會逼使蘇卡諾拒絕蘇俄及中共之支援。莊萊德認為就其個人看來，該項聲明當不影響美國地位，並表示美國駐印尼大使此刻正設法堅固雅加達之反共份子，遏阻蘇卡諾傾向蘇俄。蔣中正則評論，蘇卡諾現今之地位有賴當地共產黨支持方可維持，他個人對此項工作之效果不抱樂觀。¹⁶

表面上蔣中正似接受美國勸阻，僅以中共軍隊若在南海活動將影響台灣與亞洲安全為由表示將就此發表聲明，保留採取反制的權力。不過此一乍看基於國安考量的聲明，若從蔣日記觀之則似乎並不單純。或許因為杜勒斯在信末留下的曖昧空間，在日記中蔣中正認為「似其意並不反對我援助革命之提議也」，對美國支持其行動仍存一絲希望。

杜勒斯的曖昧究竟只是外交辭令上的婉言客套，還是別有用心的刻意為之？這點我們當可參考杜勒斯同日拍給美國駐印尼大使鍾華德的另封電報，信中他表明即

¹⁵ 「蔣中正以茶會招待美國海軍上將費立德夫婦並於茶會畢後與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就援助印尼革命軍事進行談話」(1958年5月22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4-008。

¹⁶ 「蔣中正以茶會招待美國海軍上將費立德夫婦並於茶會畢後與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就援助印尼革命軍事進行談話」(1958年5月22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4-008。

便叛軍垂危，若美方善意未能阻止雅加達繼續向共產世界傾斜，美國將考慮恢復支持「革命」的既有政策：¹⁷

一旦印尼開始赤化，這些垂死的革命份子將自烈焰中奮起。而對美國來說，無論我們期望的是什麼，當那些獻身自由的政府和個人從中感受到威脅、而決定介入時，我們是不可能阻止他們的。

這裡所謂「獻身自由的政府和個人(government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dedicated to freedom)」，所指的極可能就是該時包含中華民國、菲律賓在內、秘密參與援助叛軍的各國軍民。換言之，美國雖樂於和印尼建立友誼，但友誼的前提在於明確的反共。這樣看來，杜勒斯給蔣中正的回覆就非單純的外交辭令，而是在為拉攏雅加達無效的狀況預留後路。而無論此刻杜勒斯思量為何，蔣中正顯然抓住了這一曖昧空間，並試圖朝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解釋，認定美國仍有說服空間，準備在印尼放手一搏。

收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回覆的隔天，也就是 24 日下午，蔣中正召來副總統陳誠、國民黨秘書長張厲生、行政院長俞鴻鈞、外交部長葉公超等人討論對外發表聲明，陳、張兩人均面露難色。蔣在日記中不滿地批評兩人「小心太過矣」。¹⁸該聲明討論過後交由國防部公開發表如下：¹⁹

據日前雅加達官方公佈之消息，北平匪共偽政權曾向印尼政府表示願派「志願軍」前往參戰。近數日來各方報導匪方已在準備派遣此項「志願軍」。中華民國政府茲聲明：倘匪軍或所謂「志願軍」者出現於南中國海之任何區域，即將其視為對臺灣安全之威脅。因此，中華民國將對該項匪軍或「志願軍」之行動，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攔截之自由。

¹⁷ Kahin, Audrey., and Kahin, George McTurna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uch in Indonesia*. p. 183.

¹⁸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 47 年 5 月 24 日)，第十一冊，頁 56。

¹⁹ 中央社，〈匪軍如出現南中國海域 臺灣安全即受威脅 我將採取必要措施 保留對該項匪軍攔擊之自由〉，《中央日報》(台北)1958 年 5 月 24 日，第一版。

同日軍事會議上，蔣中正指示國防部成立「南海研究小組」，稱：「對印尼革命軍情勢與共匪宣稱派遣志願軍事，國防部已有公報聲明，應預為準備。如共匪派遣志願軍前往，應照聲明實施，以援助印尼革命軍。」²⁰並在日記中寫道：²¹

因為共匪公開聲明，將派遣志願軍協助印尼政府平定革命軍之故，我政府不能不發表聲明：凡共匪武力只要其在南中國海範圍行動，無論其為藉辭援助印尼或直接攻臺，我政府必須有效行動，以制止其侵略與赤化太平洋之野心也。

又稱：

印尼革命形勢演惡已極，美國見其危急，反而丟手不顧，殊為最無信義之咎。余不能不提出警告，只[指?]明其歷史之責任難逃，希望其同意我出面援助革命，挽救印尼赤化之危局，未知其最後作如何答覆矣。余乃自動先行聲明，如共匪志願軍援助印尼之軍事行動，我必將予攔擊。此一聲明，不僅為聲援印尼革命軍，以鼓勵其士氣，而以鼓勵我大陸反共同胞更為重要也，故意不顧美國之意如何。

回顧「南海計劃」背景，據蔣中正前後說法，一方面是為了防堵共產勢力在亞洲的擴張，特別是遏阻中共在亞洲之行動。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反攻士氣的考量，特別是為了激勵在中國大陸的「反共同胞」。早在3月份與杜勒斯對話時，蔣就曾表明希望美國能支持他敵後反攻的構想，讓他對中國大陸「抗暴」份子給予更多支持。²²換言之，即便身披國際冷戰外衣，「南海計劃」仍與蔣內心對反攻大陸的渴望有極大關聯。對於美國勸阻，蔣中正表面稱允，實際上卻是私意已決，動作接連，不願放棄介入印尼想法。雖然杜勒斯回覆中確實預留了一個婉轉的餘地，並被蔣解釋為一種消極的默許，但對照蔣在日記中「故意不顧美國之意」的記載，顯然他也清楚美國並不支持自己的構想，並做好了無視其反對的打算。

²⁰ 《國防部》，〈軍事會談總統指示事項分辦通知單〉，1958年5月24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501.3_4022_1_1_00042132_032_3。

²¹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5月24日)，第十一冊，頁56。

²² 「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對中共策略談話紀錄中英文稿」(1958年3月14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3-001。

值得注意的是，蔣出兵印尼之構想除遭美方勸阻外，連台北黨政高層中也是和者寡而反對者眾。包含副總統陳誠、外交部長葉公超、國民黨秘書長張厲生，都曾先後在蔣面前對此構想展現出消極、甚至反對的態度。葉公超還私下向美國大使莊萊德直言自己不贊成蔣的想法，表示曾試圖勸其打消念頭。這樣看來，「南海計劃」的推動可說代表了蔣相當鮮明的個人意志，其箇中考量也就成為我們理解蔣此刻對印尼內戰、乃至於台海與國際局勢認知的重要媒介。



第二節 「南海計劃」背後蔣中正的考量

一心尋求反攻的蔣中正為何對援助「印尼革命軍」如此鏗而不捨？以下將就此計劃推出時間點與國際環境，分析印尼內戰在蔣中正心中可能存在之意義。

1. 柯克備忘錄與蔣中正的亞洲反共大戰略

根據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一書的觀點，1956 年以後隨著美蘇關係趨於緩和，美國和中共大使級談判開始，國際間瀰漫著一股中立主義的外交氛圍。呼應中共 1955 年在萬隆會議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原先鐵桿反共的國家態度也有所鬆動。就在蔣對此現象感到憂心時，1957 年 6 月間深受蔣中正信賴的美國前第七艦隊司令海軍上將柯克，向台北國防部提出一份備忘錄，闡述他對台灣在亞洲戰略價值的看法。

該備忘錄認為，中華民國掌握台澎金馬，阻止了共產黨向東南亞長驅直入，這點至關重要，東南亞國家能否留在西方世界陣營，台灣扮演了關鍵角色。而台灣能否阻止共產勢力進入東南亞，也攸關自身存亡。一旦整個東南亞受到共產國家影響，台澎金馬將遭受嚴重威脅，蔣中正收復大陸的可能性也將更加渺茫。²³

蔣中正對柯克此一備忘錄的觀點給予高度重視，並下令大量印行發交各司令部，要求各部門研究，以此訂定因應計劃。正是在此背景下，中華民國接下來向東南亞地區展開一連串「輸出革命」的行動，1958 年台北對「印尼革命軍」的積極態度也正是在此一背景下發展而來。²⁴

2. 印尼內戰爆發初期聯戰計劃委員楊學房提出的政策建議

2 月 25 日國防部一名聯戰計劃委員楊學房向蔣中正提出「對印尼政變我國應持政策之建議」。其分析認為，印尼自獨立以來採取中間偏左路線，對內「容共」、對外「中立媚俄」，外交上又「斷然承認共匪」，使中華民國「國際地位及僑務政策在東南亞地區處於極端不利之地位」。如今印尼政變，楊認為正是「予我以打破現狀、挽救劣勢局面之良機」。「昨見報載革命領袖潘道少校已自菲島來台」，建

²³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頁 271-273。

²⁴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頁 277-278。

議「此種際會，我似可予以斷然利用」，與其「密洽軍援印尼革命政府之辦法，準備做有力之推行」。²⁵同時建議爭取華僑，加以動員、擴大行動：²⁶

...增強革命政府之反共軍力，使能堅強迄立、不至為蘇卡諾親共政權之攻勢所粉碎，並使反共軍力日益加強，俾能逐次拖垮印尼政府。另組成一個反共的統一政權，與我重建邦交。使二百萬印尼僑胞重返自由祖國，並在東南亞達成一反共中心，以繼續影響越泰馬各地僑胞，使能一致向心革命，加強反共...

為此楊主張應「派員密赴蘇島，與革命軍政府接觸，調查一切實情」，供決策參考，同時在台做軍援計畫準備。楊的構想，相當程度反映了該時中華民國在東南亞地區外交和僑務上的困境。尤其是 1950 年印尼與中共建交後，對中華民國在當地僑界聲望造成了極大打擊，也使僑社陷入對立和鬥爭。儘管這份報告忽略了戰後東南亞民族主義和印尼內部政治矛盾的影響，把內戰衝突簡化為共產與反共的戰爭，但不能不說楊學房此刻對印尼局勢的構想是極為大膽直接的。

報告書中楊學房將「援助」區分為「積極」與「消極」兩案，依情況交叉運用，必要時兩案並行，但皆需極力保密。「積極」方案為派遣一個混成營兵力至蘇門答臘，構成核心戰力，之後再發動僑胞、擴大兵力。建議混成營應包含「高射砲八門、或戰車十餘輛、以千人左右為度」。初期經費由中華民國支持，抵達印尼後全由當地供給。「消極」案則為「動員全台軍須生產力，代印尼革命軍製造軍品」，銷售印尼「革命政府」。同時派員駐蘇門答臘，秘密觀察當地軍事形勢，「研究發展反共力量及組訓僑胞之方法」。國際反應方面，楊認為援助革命與歐美立場相合不悖，且如獲成功將可望大大提高中華民國在東南亞國家間的聲望，：²⁷

美英及澳洲對蘇卡諾均未表明態度，但基本觀念均不佳。只因牽制顧慮不便公開行動耳。我國行軍援政策、對美英等均無妨害，彼等亦絕不能坐視印尼反共力量，使其全部渙滅。我軍接收效後，則越泰等國對我必

²⁵ 〈對印尼政變我國應持政策之建議〉，1958 年 2 月 26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420_4040_1_1_00041382_006。

²⁶ 〈對印尼政變我國應持政策之建議〉，1958 年 2 月 26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420_4040_1_1_00041382。

²⁷ 〈對印尼政變我國應持政策之建議〉，1958 年 2 月 26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420_4040_1_1_00041382。

全面改觀，國際上將有新地位。共匪海上力量，對南洋尚不可及。無大顧慮。

楊學房在國民政府時期曾以陸軍少將軍階任參軍處軍務局高級參謀一職。所謂軍務局即由原先侍從室第一處第二組演變而來，是替蔣出謀劃策和處理庶務的幕僚。表面上這些人低調，卻因協助蔣日常作業，而對蔣的決策有相當之影響力。1947年10月，楊學房調任駐美副武官。²⁸1951年3月底又被調任為總統府第二局副局長，同屬蔣的幕僚性質。²⁹1953年到1956年，楊學房罕見地以少將此一極高軍階出任駐韓武官，期間因促成「反共義士」歸國有功而獲頒勳。³⁰1956年8月楊學房從駐韓武官一職奉調回台，擔任聯合作戰計劃委員。³¹1958年提出對印尼之政策建議時，楊學房強調這些想法乃根據自己數年來在「國外之工作經驗」所得。見國外僑民現狀，遂有此議。如獲施行，他願擔此重任前往印尼。2月26日參軍長黃杰在轉呈此案予蔣中正時，給予了極高評價：³²

...按此次印尼反共政權之能否建立對我外交及僑務之影響甚大，楊員所見雖尚值慎重研究，但頗有考慮價值，可否交由國家安全局研究審議，報核之處？恭請核示。

對此，蔣中正批「可」一字，而觀之與「南海計劃」諸多相通處(參見本論文附錄)，加之楊學房曾先後在軍務局和總統府第二局任職，與蔣熟悉，此文件應是對「南海計劃」構想的成形起到相當之作用。此提案在國防部被歸檔於「南海計劃」，也側面證實了此一推測。

另外需注意的是，楊學房提案時間點，是2月份潘道來台之際。潘道所以來台，為的就是與台北情報單位洽談取得軍火事宜，且早在1月份復興航空就已經在

²⁸ 「軍務局呈蔣中正該局少將高參楊學房奉調駐美陸軍副武官遺缺擬以秋宗鼎繼任等文電日報表等三則」(1947年10月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540-008。

²⁹ 《國防部》，〈派楊學房為本府第二局少將副局長特電查照中正〉，1951年3月27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0_0312.3_7421_3_61_00037312。

³⁰ 《國防部》，〈查對韓境反共義士歸國出力有功人員經奉總統核定分別頒發勳獎在案〉，1955年2月25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3_0351.14_5000-2_1_20_00040021。

³¹ 《國防部》，〈為請任免龔作人楊學房等二員〉，1956年8月30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1_0312.42_5000_1_92_00037573。

³² 〈對印尼政變我國應持政策之建議〉，1958年2月2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420_4040_1_1_00041382。

國防部指示下與尚未成立政府的反對勢力接觸。換言之楊學房提出此案時，台北早已開始援助「革命軍」。故楊提案的價值並不在於促使台北對「革命軍」展開援助，而在為他日「南海計劃」的構想提供了雛形。依此看來，「南海計劃」雖是 5 月下旬開始強力推動，但其構想應是在 2 月底便開始醞釀。

3. 中共犯台情報與韓戰經驗

1958 年 3 月 14 日，蔣中正在會談中除向國務卿杜勒斯提議由自己代替美國援助「印尼革命軍」外，還連帶提到一份情報，預測中共準備在該年大舉攻台。他稱自己一開始對此情報未予重視，直到去年 11 月中共自朝鮮大規模撤軍時，他才擔憂此撤退是中共即將在東亞展開「冒險」之準備：「尚不能確言共匪是否將對台灣從事此一進攻，但總以為中共匪偽或將於今夏之間，在某處做某種軍事上的冒險」。杜勒斯對此不以為然，認為中共當不致為了在台海行動而撤軍，因為這將給予韓國反攻機會。³³儘管如此，蔣中正言談間仍一再強調，中共正處心積慮在亞洲擴張其勢力，面對此一極具侵略性的威脅，美國須有所作為。唯有消滅中共，才可能真正根除亞洲的共產威脅。³⁴

此處蔣中正似乎在向美國暗示著，面對印尼動盪，不排除中共可能就會派出部隊大規模地介入。這種暗示，顯然是借鏡自韓戰的經驗。蔣中正將印尼內戰與中共對亞洲的威脅相連結，將亞洲反共戰爭視為一個整體，試圖透過韓戰經驗，喚醒美國的警覺。這固然是蔣中正用以說服美國支持其反共戰爭的重要論點，但考量到蔣中正早先所受柯克備忘錄的影響，則此論據似乎也反映了蔣對亞洲局勢的認知，得以解釋其對印尼之積極態度。

4.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約束下主動創造反攻大陸契機

如果說 1958 年 3 月中與杜勒斯談話時，蔣中正還以共產勢力在亞洲的急遽擴張為理由，希望杜勒斯重視中共在亞洲威脅，採取更積極的反共政策。那麼到 3 月底，蔣中正心中對於「中共威脅」又有了進一步想法。隨著蘇聯、捷克相繼聲援印

³³ 「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對中共策略談話紀錄中英文稿」(1958 年 3 月 14 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3-001。

³⁴ 「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對中共策略談話紀錄中英文稿」(1958 年 3 月 14 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3-001。

尼政府，唯獨中共遲遲未有公開動作，蔣在日記中猜測或者中共是在等待他派出志願軍參戰，以此為侵台口實，藉機博取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之同情，動搖他在聯合國地位。³⁵數日後蔣在日記中又稱「引誘共匪侵臺」反為「我反攻開始之契機」，似乎對開戰之期待遠大於憂懼³⁶儘管考量到此舉有動搖其聯合國地位的危險，蔣在3月底仍認為公開聲援仍非其時。但從這段描述，我們不難看出蔣認為印尼內戰如能誘使中共有所動作，則或可成為其反攻大陸之契機，蔣這一思維實與該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背景息息相關。

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局勢一度風雨飄搖。雖然法理上台北仍宣稱自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實際上隨其將大使館遷台的國家寥寥無幾。多數國家眼中，中共奪取台灣只是時間問題，美國杜魯門政府更是依照早先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持袖手旁觀態度。直到韓戰爆發後，隨中共出兵介入，美國才意識到與中共的對抗不可避免。總統艾森豪更在1953年2月2日下令第七艦隊中立化，暫時不再攔阻蔣中正對大陸軍事行動以作牽制。同時為使美軍對台協助置於法律基礎上，經台北提議雙方遂在1954年12月2日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大大穩固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性與國際地位。³⁷然而條約簽訂前，華府仍擔心蔣中正將利用條約將美國拖進其反攻戰爭的泥沼，遂在協商過程中堅持必須對蔣的軍事行動有所約束。

蔣雖百般不願，但在確保生存前提下，最終仍選擇了妥協。為免影響台北士氣與政府形象，此一對蔣反攻行動的限制遂在雙方條約簽訂後，於同年12月10日以換文形式約定之。換文中規定，除「行使固有自衛權利」外，任一締約國自台灣使用武力前需獲另方協議。³⁸此換文在美國與條約正文一同送參院審查，被美方視為條約一部分，與正文具備同等效力。爾後按美方理解，蔣中正在採取反攻行動前，應得到美方同意。防禦條約對蔣中正來說固然是防禦與國家地位的保障，卻也

³⁵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3月27日)，頁29-30。

³⁶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3月29日)，頁30。

³⁷ 「運用中美條約展開反攻行動之有關文件與綜合檢討等」(日期不明)，〈試談反攻案〉，《蔣經國總統文件》，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01-016。

³⁸ 換文說帖節錄如下：「中華民國……對其現在與將來控制之一切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鑑於……任一締約國自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將為共同協議之事項，但顯屬行使固有自衛權利之緊急行動，不在此限……」參考「國軍支援大陸大規模抗暴有關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換文說帖等規定及法律之考慮與蔣中正手令美方不應引據換文而阻止或限制我方支援抗暴行動等」(日期不明)，〈試談反攻案〉，《蔣經國總統文件》，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01-017。

成為限制其反攻行動的牢籠。如何在此限制下，取得反攻正當性與機會，便成了蔣在台海防禦穩固後的首要課題。³⁹這也是在解讀「南海計劃」時，不可忽視的重要背景。

正因條約束縛，蔣主動向對岸發動大規模作戰的限制增加，唯一能在條約下保有主動性的方法就是設法創造出得讓台北「行使固有自衛權利」的局面。台北內部一份推測為 1950 年代末期的絕對機密文件就指出，反攻受條約之限制小，事實之困難大。認為只要時機合適，美國是願意支持反攻的。這一判斷雖與美國實際想法有所出入，卻顯示台北認為關鍵不在爭取法理上的合理性，而在於設法創造出有利於反攻的既成事實，從而促使美國改變態度。而根據過去韓戰使美國政策轉向支持蔣的經驗，台北判斷一旦中共大舉動作，就可能使美國再度改動其政策。易言之，要避免條約限制，就消極層面是把握中共對外動武的時刻，化被動為主動，以「自衛」之名對之展開積極軍事行動。就積極層面，則是在使用武力後，設法創造有利戰果，增加華府在國內外的政治資本，促其解除對反攻的限制。該文件甚至建議可在美國大選前，透過秘密方式向美方傳達此一信息，以反攻之利說服美國支持。⁴⁰從此一文件和蔣中正此處日記中的記載相比對，則蔣此刻對於介入印尼內戰的構想、甚至是對中共出兵的預測，極可能是台北在 1950 年代末期所構思之反攻戰略的先聲。

另外根據張淑雅⁴¹研究，195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體系成形，美國對台海約束力加強，華府雖不樂見台北對中國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擴大區域衝突，但為避免摧毀台北士氣與刺激蔣中正，仍不斷以「待機反攻」論述說服蔣中正勿輕啟戰端。如同杜勒斯在 1958 年 3 月份時向蔣中正所強調的，美國一向「支持」蔣中正反攻，但美國關心的是反攻之先，「機會」是否真的存在。換言之美國口頭上宣稱支持反攻，但實際上是以「待機」之名行反對之實。然而對蔣中正來說，他卻仍心存希望，並主張「機會」除了等待以外，是可以被主動「創

³⁹ 「運用中美條約展開反攻行動之有關文件與綜合檢討等」(年份不明)，〈試談反攻案〉，《蔣經國總統文件》，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01-016。

⁴⁰ 「運用中美條約展開反攻行動之有關文件與綜合檢討等」(年份不明)，〈試談反攻案〉，《蔣經國總統文件》，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01-016。

⁴¹ 張淑雅目前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著作《韓戰救台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為台灣冷戰地位研究之名作。

造」的。⁴²無論傘兵訓練計劃、敵後反攻計劃，這時期的蔣中正仍不斷在尋找各種創造機會的可能。從這點來說，蔣中正對印尼內戰的積極態度，著實反映了蔣中正在此條約束縛下，試圖主動創造反攻機會的渴望。

5.以積極反共強化國際地位爭取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正當性

另一促成蔣中正積極行動的可能原因，則或許是蔣中正渴望藉此來鞏固其自身在「自由世界」之聲望，使其政府與反攻政策能在國際上獲得更高的正當性。繼北約(NATO)之後，1954年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亦告成立。蔣中正雖渴望加入，卻在英國強烈反對下始終不得其門而入。1958年3月初，蔣中正與杜勒斯會談前，其預先所列談話要點除援助「印尼革命軍」和討論中共動向外，亦包含加入「東南亞聯盟(公約組織)」的問題。⁴³談話結束後隔天3月15日日記又稱：「東南亞聯盟部長會議並無任何進步，可知西方國家仍不重視亞洲，更以怕共畏戰，對我國地位之無視為憾。」⁴⁴月底時再記：「此次東南亞聯盟會並無異議提出，而其對中、韓兩國加入聯盟事，亦不能實現，可知西方大國仍不重視亞洲共禍與具體反共之決心，而美對印尼之革命軍仍不敢公開接濟，更使亞洲反共各國對其失卻信心也。」⁴⁵

按該時背景，蔣面對美國一方面屢屢強調自己無意使反攻擴大為世界大戰拖累美國。另一方面卻又每每將中共威脅置於東亞反共脈絡來向美國遊說，避免美國以為其反攻是出於一己之私，而能體認到其反攻政策是世界反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自己不過作為「自由世界」一員貢獻一己之力。在此脈絡尚，蔣的「南海計劃」便可能包含向外界形塑自身積極反共形象之企圖，為他日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爭取正當性，使反攻得置於世界冷戰之防共大義下，不致被冠上破壞和平或製造戰端的罪名。

⁴²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頁260。

⁴³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3月4日)，頁22。

⁴⁴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3月15日)，頁33。

⁴⁵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3月31日)，頁32。

6. 「印尼革命軍」的頹勢與美國的淡漠

在 1958 年春天，儘管蔣中正已經認定印尼反共戰爭將關係到亞洲反共戰爭、台海防禦，甚至可以為他創造反攻大陸的機會，但他最終卻選擇了按兵不動。而這一決定背後主要因素，除擔心動搖自身國際地位外，主要還是由於他認定美國已事實提供「革命軍」援助。⁴⁶在這一前提下，他選擇以相對較不具風險的方式，從旁提供協助給「革命軍」。而根據國防部相關文件和蔣的日記內容分析，蔣此時很有可能是在等待「革命軍」更具規模、或於國際上取得合法地位後，再給予公開援助。

然事與願違的，四月下旬「革命軍」重要根據地接連失守，4 月 30 日政府軍更一舉攻佔其在摩羅泰島的空軍基地。該基地距離蘇拉威西島不遠，此處失守意味著「革命軍」將失去該地制空權，蘇拉威西的陷落只是時間問題。蔣為此焦急的同時，也逐漸失去對美國的信心：⁴⁷

如美不想設法挽救革命局勢，則太平洋與印度洋之心臟又為俄掌握，不僅亞洲反共形勢與心理將蒙其不可估計之損失，而美自身在太平洋之生命線亦必斬絕，此印尼之赤化對世界前途影響實不亞於我大陸也，美國政治之無是可痛盡極。⁴⁸

隨著「革命軍」形勢愈來愈不利，美國卻未有積極作為，蔣中正終於按捺不住。5 月 22 日他找來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表明他對當前「革命軍」危機之關切，並計劃派遣「空軍一大隊及陸戰隊一團」前往參戰，在這之前希望明白美方對此事態度。對此莊萊德引用杜勒斯的話，認為叛軍若缺乏戰鬥意志，再多外援都無濟於

⁴⁶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民國 47 年 3 月 15 日)，頁 25。

⁴⁷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民國 47 年 4 月 30 日)，頁 45。

⁴⁸ 筆者注：此段為蔣中正年譜長編中所載的蔣日記原文，按上下文意思推斷應是蔣中正痛罵美國政治無道實在可痛。

事，⁴⁹但仍承諾會盡快把蔣的想法轉達給國務卿。⁵⁰當天蔣日記又再次表達對美國不滿：「印尼赤化，無異喪失中國大陸之第二，美國不僅應負其歷史責任而已」。⁵¹

第二日蔣中正收到杜勒斯回覆，電報中表明援助叛軍不符合當前的美國政策，希望蔣在美國當前計劃收效前暫緩行動。⁵²對此蔣採取了陽奉陰違的策略，告訴莊萊德他願等待杜勒斯日後的消息，再採行動，但須先就「共匪將派志願軍協助印尼政府」此一「侵略行動」加以制止，「不許其在南中國海域有軍事運兵行動以威脅我臺灣基地」。蔣以此舉符合美國維護台海安全的政策為由，向莊萊德表示他仍將採取他認為「必要」的行動。⁵³換言之，蔣中正強推「南海計劃」的背景，正是在於意識到美國不願出手挽救局面，而決心在美國改變態度前先行動作，盼盡可能避免「印尼革命軍」的崩潰。

7. 國共內戰經驗下對「印尼革命軍」處境的同情

蔣中正對「印尼革命軍」的同情態度，除基於自身亞洲反共戰略，與反攻大陸的渴望。另一方面則很可能之在國共內戰時被美國拋棄的經驗有關。在蔣日記中，他曾不只一次提到印尼內戰與國共內戰的對比。在與莊萊德對談隔日，蔣在日記中稱「印尼赤化，無異喪失中國大陸之第二，美國不僅應負其歷史之責任而已」。⁵⁴並稱「印尼革命形勢演惡已極，美國見其危急，反而丟手不顧，殊為最無信義之咎。」三日後，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來向其報告「印尼革命軍」情形後他更在日記中痛罵：⁵⁵

⁴⁹ 筆者註：莊萊德認為叛軍欠缺作戰意志並非沒有原因。就在數日前，面對政府軍猛烈攻勢，據守蘇拉威西的叛軍再度表達和談意願，但均為雅加達所拒。「革命政府」成立之初本是打算「以戰逼和」，希望透過宣布脫離雅加達逼使蘇卡諾接受其談判條件，欠缺決一死戰的意志。同時破壞印尼統一的罪名也大大削弱其道德正當性，大不利於士氣維持。合眾社(東京)，〈革命軍建議和談 印尼政府已拒絕將發動最後之進攻〉，《中央日報》(台北)1958年5月23日，第二版。

⁵⁰ 「蔣中正以茶會招待美國海軍上將費立德夫婦並於茶會畢後與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就援助印尼革命軍事進行談話」(1958年5月22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4-008。

⁵¹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5月22、23日)，第十一冊，頁55。

⁵² 「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對中共策略談話紀錄中英文稿」(1958年3月14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3-001。

⁵³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5月24日)，第十一冊，頁56。

⁵⁴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5月22、23日)，第十一冊，頁55。

⁵⁵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5月26日)，第十一冊，頁58。

經兒報告其與印尼革命軍代理總理談話情形，對美虎頭蛇尾，先鼓動，後遺棄並未交代一語，即置之不顧之形容，乃其九年前對我中國情形也，更覺美國外交之失信與不可靠，能不戒懼。

從上述日記內容來看，則蔣中正對於「印尼革命軍」的同情，似乎也包含了對這種被拋棄經驗的同病相憐之感，以及自身對美國政策反覆的憤恨不平。

8.對中共可能介入的回應

如果說 1958 春季蔣中正和美國互動中，所不斷強調的共產威脅、與中共可能輸出革命的擔憂還只是蔣中正的「個人猜想」，那麼當五月印尼政府軍節節勝利之際，中共的「聲明」可說成了促成蔣中正行動的最後一根稻草。按照《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協議，台北在緊急時行使固有自衛權利可不受美方限制。因此 5 月 23 日蔣中正從莊萊德收到杜勒斯覆電後，即表明雖願配合美國政策，但如中共行動，他仍將有所回應。此說法雖多少有藉口行動的味道，卻也是蔣所認為，面對中共在亞洲、台海威脅所必須做出的回應。24 日下午蔣中正召集副總統陳誠、國民黨秘書長張厲生、行政院長俞鴻鈞、外交部長葉公超等人討論聲明文字後，即交國防部發表。⁵⁶該日軍事會議上蔣中正指示國防部成立南海研究小組，稱：「對印尼革命軍情勢與共匪宣稱派遣志願軍事，國防部已有公報聲明，應預為準備。如共匪派遣志願軍前往，應照聲明實施，以援助印尼革命軍。」⁵⁷同時蔣中正在日記中認為由於中共聲明將派軍印尼，自己不能不有所回應。⁵⁸由此來看「南海計劃」同時包含了對印尼內戰的關注與台海局勢兩個面向的考量。台北的聲明，也標誌了一項重要轉變，即中華民國對印尼內戰態度的公開化。儘管過去數月台灣報紙毫不隱諱對「印尼革命軍」的同情，但至少在公開場合台北官方仍矢口否認國家有任何介入印尼內戰的行為，但此刻國防部卻史無前例地對外公開表態，他們將有所行動。

筆者認為儘管這項聲明內容主要是在針對中共，但另一方面或許也是因為無論台北當局早先如何否認，印尼政府仍認定中華民國政府對叛軍的援助為事實，並向

⁵⁶ 中央社，〈匪軍如出現南中國海域 臺灣安全即受威脅 我將採取必要措施 保留對該項匪軍攔擊之自由〉，《中央日報》(台北)1958 年 5 月 24 日，第一版。

⁵⁷ 《國防部》，〈軍事會談總統指示事項分辦通知單〉，1958 年 5 月 24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501.3_4022_1_1_00042132_032_3。

⁵⁸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 47 年 5 月 24 日)，第十一冊，頁 56。

當地「親國民黨華人」採取了激烈的報復行動，此情況下公開表態也可說是一種以攻為守的策略。只不過需注意的是，根據日後國防部第三廳的研究，就該時台北所能動員的有限軍事力量而言，支援印尼內戰與台海防禦間存在有明顯的衝突關係。蔣日記的記載雖看似豪邁，實際執行層面卻存在有明顯的矛盾。台北部分黨政高層對蔣此刻行動的消極態度，或許也是因為認知到此一計劃背後的危險性所致。

第三節「南海計劃」出爐前蔣中正對華盛頓態度的再次試探

5月22日時，蔣中正曾透過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大使探詢華府對台北援助「印尼革命軍」的態度，遭國務卿杜勒斯婉拒，不過表示若情況改變，將再與之商討一節，被蔣中正解讀為美國仍有被說服空間的契機。同時蔣中正利用台海防衛為藉口，向莊萊德表示若中共有所行動，他將採取必要之措施。對此莊萊德當下顯然未意識到蔣中正此刻心中的圖謀。見莊萊德未出言反對，24日蔣即指示國防部對外發表聲明。同時在軍事會議指示成立「南海研究小組」，開始積研擬出兵印尼的相關計劃。

5月25日下午，台北方面透過國防部長俞大維向方自夏威夷返台的協防臺灣司令竇亦樂中將(Austin K. Doyle)表示，他們已準備派軍前赴印尼。事先對此一無所悉的竇亦樂立刻出言反對，希望台北將此行動延後兩天。當晚蔣中正邀請一批美國駐台人員共進晚餐，招待空軍部長道格拉斯(James H. Douglas)。聚餐時，蔣神情輕鬆，未提及派兵印尼的事，僅發表觀點認為應避免印尼落入共產黨之手，請道格拉斯將此轉告給艾森豪總統。晚餐後蔣中正請竇亦樂留下與之獨自談話，直言他認為此刻需儘速派遣部隊前往援助印尼叛軍，竇亦樂則敦促蔣千萬不可出兵，說此刻美國已得到機會，可望與雅加達內的友好份子達成協議。蔣則回答此並非解決問題的可行方式，竇亦樂再次重申稍早對俞大維的請求，希望蔣給予他兩天寬限來尋求解決問題，蔣答應了此一請求。⁵⁹竇亦樂旋即急電太平洋艦隊司令史敦普上將與海

⁵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y 2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1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13> (2020年5月26日瀏覽)

軍作戰部長柏克上將，請求華府儘速向蔣表示美國「絕不會坐視印尼落入共產黨之手」(Indonesia will not be permitted to fall in hands of Communists)。⁶⁰

是日深夜，竇亦樂將此事轉告大使莊萊德。莊萊德對此大感訝異，此前他並未從俞大維、葉公超或參謀總長王淑銘那得到任何消息，稍早與蔣共進晚餐時自己也在場，卻未看出任何跡象。他雖知道台北對印尼發展極為焦慮，但蔣的急躁仍出其意料。當竇亦樂準備離台去找太平洋艦隊司令史敦普商討此事前，莊萊德將自己數日前與蔣中正的對話，以及國務卿杜勒斯的回覆轉告給他。並告訴竇亦樂，蔣中正曾向他承諾在美國給予進一步回覆前不會採取行動，現在只能寄望蔣中正會履行承諾了。⁶¹

竇亦樂離開後，莊萊德立刻聯絡外交部長葉公超，詢問他此一震撼的消息。葉公超表示他對蔣中正要即刻採取行動的動向一無所知，但相信蔣會遵守他對美國的保證。另一方面，根據共同防禦條約，他認為蔣中正在未與美國協議的情況下採取行動是不可能的。他雖對今日發生的事情未曾聽聞，但承認 24 日晚上曾和國防部長俞大維以及副參謀總長余伯泉談話，得知總統當日早晨曾要求俞大維擬定出兵印尼的計劃，俞大維決定將此事交由副參謀總長余伯泉辦理，兩人曾詢問葉公超可供計畫依循的資訊。他當時告訴兩人自己恐無法提供太多有用資訊，就其看來計劃的準備將會是曠日費時的辛苦工作，執行恐將超出台北的能力範圍，對此余伯泉深有同感。⁶²

深夜對話結束前，莊萊德和葉部長同意明早一起再討論此事。莊萊德則敦促葉公超應儘快去見總統，提醒蔣中正他曾答應的承諾，以及共同防禦條約中的相關規範。如果葉公超認為有必要，自己會再去見一次總統。26 日凌晨，莊萊德向國務院拍了一份電報，報告此一緊急事態，敦促華府如果有任何對印尼發展的樂觀資

⁶⁰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y 2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1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13> (2020 年 5 月 26 日瀏覽)

⁶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y 2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1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13> (2020 年 5 月 26 日瀏覽)

⁶²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y 2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1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13> (2020 年 5 月 26 日瀏覽)

訊，應儘速傳遞給蔣中正。雖然他很難相信蔣真的會如其所威脅的擅自出兵印尼，但憂心如果美國無法採取有效行動阻止共產黨控制印尼，蔣恐在絕望中出擊，而竇亦樂與他都同意，蔣身邊部屬雖不樂見此一行動，但無人敢站出來反對蔣。⁶³

應莊萊德要求，26 日白天國務卿杜勒斯即再度致電台北，信中杜勒斯承認印尼總統蘇卡諾雖然才能出眾，予人深刻印象，但在國際上觀感不佳。蘇卡諾近來一連串增加中央政府權力的舉措，被許多人擔心是遭共產黨利用，企圖使印尼政治變為共產形式之「無產階級專政」，將使印尼成為共產集團的一員。針對此一不安，杜勒斯在信中如此說道：⁶⁴

如謂印尼能平靜無事地進入共產陣營，乃屬無稽之談。印尼如明顯地走向共產之路，則革命的烽火勢將再起。在此種情勢下，任何個人及政府因防衛自由及感受印尼所走路線之威脅，而在情緒上發生激動，即使美國意欲加以遏阻，亦不可能...美國正盡力在政策方面作和平及有秩序的轉變，以防止共產國際陰謀攫取印尼的威脅。

回覆中，杜勒斯向蔣強調美國並非對印尼潛在的共產威脅毫無警覺，並暗示如果印尼走向共產，美國不會攔阻任何政府的介入。但信末仍重申，現階段美國所採取的是試圖使印尼作「和平及有秩序的轉變」(a peaceful and orderly transition)。

杜勒斯之回覆，於 29 日由葉公超上呈蔣中正。呈件中葉公超亦附上另外一文件，整理自己從莊萊德所聽聞之七項資訊：(1)印尼警察過去三年受美方訓練，使其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此次美國政府援助印尼輕武器，可加強印尼警察之實力。(2)美方認為印尼陸軍參謀長納蘇遜為絕對反共份子。其身邊青年軍官亦均反共，可與警察配合，遏止共產勢力之發展。印尼共產黨曾組織大規模遊行反對外國志願軍，即為納蘇勳所制止。同時若干親共華文報紙亦遭令停止，並不准復版。稍早曾被禁止之反共華文報紙則獲准復版。(3)美國現要求蘇卡諾對「革命軍」不採取武力行動，以和平政治方式與「革命軍」首領談判，但未為蘇卡諾接受。(4)5 月

⁶³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y 2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1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13> (2020 年 5 月 26 日瀏覽)

⁶⁴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電譯文及葉公超與美國大使莊萊德關於印尼共產黨等談話內容」(1958 年 5 月 26 日)，〈外交—抵禦國際共產侵略以保衛亞洲安全〉，《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館藏號：005-010205-00038-006。

16日印尼內閣會議曾授權總理於必要時與美國斷交。17日早晨印尼外長與美國駐印尼大使鍾華德談兩小時，結果美國答應以剩餘農產品及輕武器售予印尼政府，但言明此武器專為警察維持治安使用，印尼外長亦答應對國內共產勢力嚴加壓制，放棄與美國斷交之議。(5)印尼政府此前已曾數度向美國洽購軍火，數字龐大，美國均未答應。因為美國擔心蘇卡諾將之用於攻擊西伊里安[西新幾內亞]。同時蘇卡諾缺乏親信之軍隊，一直希望組織一治安軍，由其個人率領。故此次美國軍售，將由美方軍事顧問點交予印尼警察。(6)美國曾與英國、澳洲、菲律賓非正式交換意見，各國均認為應予印尼內部反共份子充分支持，以遏止蘇卡諾親共之目的。不過各國也都認為「革命軍」之力量目前已達到不能支持之地步。(7)在未來數週，印尼內部之反共勢力可能對蘇卡諾提出若干要求。最後葉公超在呈件中稱其在談話後對莊萊德答覆如下：⁶⁵

- (1)倘美國方面開始未支援革命軍，此時企圖分化印尼內部親共份子，尚不為失策。今美方志願人員已予印尼革命軍一個時期之援助，又忽然間撤去對該革命軍之支持，不獨對革命軍係一重大打擊，且使在鐵幕後之億萬反共人民之期望更為沮喪。其對全面反共之心理，益[亦?]大受影響。
- (2)所云蘇加諾係印尼唯一有相當能力之領袖人物一點，職雖有同樣看法。惟此人係一投機份子，其對美國已採取敲詐手段，殆無疑義。職個人認為美國必須設法歸翻蘇加諾，方可保持印尼不被赤化。
- (3)當將莊萊德大使所告各節轉呈總統。

對於此一呈件之反應，蔣中正在 31 日於日記中僅留下一簡短評論：「美國對印尼革命軍終止援助，反以武器經濟公開援助印尼政府，可恥之至。」⁶⁶應注意的是，在此一給蔣中正的呈件中，葉公超給予莊萊德的個人回覆似乎充滿了對革命軍的同情、對美國的不滿、以及對於推翻蘇卡諾政府的期望，這似乎和早先莊萊德給國務院電報中，對葉公超態度的描述有些許出入。這一矛盾單從中文資料中似乎難以

⁶⁵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電譯文及葉公超與美國大使莊萊德關於印尼共產黨等談話內容」(1958年5月26日)，〈外交—抵禦國際共產侵略以保衛亞洲安全〉，《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館藏號：005-010205-00038-006。

⁶⁶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47年5月31日)，第十一冊，頁60。

得到合理解釋，不過若是對照英文檔案中的其他記載，則這一切就似乎都是葉公超為緩和蔣的心情所做的刻意安排，其間經過可由以下細節予以說明。

莊萊德在 5 月 25 日深夜與葉公超談話過後，26 日凌晨即向國務院報告台北之意向，並懇求國務院對此事儘速予以回覆，並於當日收到國務卿杜勒斯回電。然此一回覆卻直到 29 日才由葉公超正式轉呈給蔣，而非像 5 月 23 日莊萊德在收到杜勒斯來信後即於當日面交於蔣。依照 26 日蔣所展現的急切態度，按理來說此刻訊息的傳遞當是刻不容緩，然而自 26 日莊萊德收到國務院來信到 29 日葉公超呈件予蔣，這中間卻有三日延宕，顯得極不尋常。

根據莊萊德給國務院的回報，5 月 27 日葉公超曾與之碰面、表示自己和俞大維都認為對印尼的武力介入是最為危險的一項舉措，他們「正設法『慢慢地』讓蔣明白此事」(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is known “gently” to Chiang)。⁶⁷而這顯然並不是件容易的工作，據蔣日記 28 日記載，葉公超在上呈杜勒斯回函前曾以電話告知蔣美方態度，蔣聞之甚為不悅：「審察美國政情，擁共毀蔣形勢又已抬頭，而且其勢甚汹...據公超電話，對印尼案之答覆繼續延宕，以其在印尼中央反共工作更為有希望，勸我暫緩行動也，可恥。」⁶⁸

如此觀之，則葉公超 5 月 29 日的呈件乃再度藉美方之口行勸退之實，借力使力、詳列美方在印尼反共工作之成果，而後再以大義凜然之寥寥數語安撫蔣，如此葉公超既明確表達美方立場、予蔣有效勸說，又可兼顧自身為人屬下之立場。回覆所以並未由莊萊德當面遞交給蔣，或許也是為了避免蔣再向美方提出令之尷尬的要求、讓為人屬下的自己左右為難。儘管現有中文資料我們較難看出葉公超對此事的反對態度、也未在蔣日記中見到類似記載。但在英文檔案視野補充下，葉公超身為外交部長，私下富於靈巧的操作則顯然在此一勸說蔣的周旋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十足展現其「為官的藝術」。

葉公超所以對阻止蔣中正「衝動行徑」有如此積極的態度，除其認為此舉缺乏國際法之基礎、超出台北能力範圍外，一項很重要背景則或許還是考量到與美國的

⁶⁷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May 2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1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13> (2020 年 5 月 26 日瀏覽)

⁶⁸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蔣中正日記〉(民國 47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一冊，頁 58。

共同防禦條約。作為共同防禦條約簽訂時台北方的外交部長與簽字代表，葉公超不但對談判過程中美方的顧慮知之甚詳，同時也相當清楚此一條約對台北難以取代的意義。在風雨飄搖之際，成功爭取美方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可說是他身為外交官的畢身心血與最大成就。若是理解此一背景，似乎就不難理解葉公超對於蔣中正意圖強行介入印尼內戰的擔憂、與想方設法阻止的決心了。

另一方面，蔣中正的急切態度雖出乎美方預期，但華府對類似事態也非毫無設想。國務卿杜勒斯 5 月 26 日給台北回覆中聲稱如果印尼走向共產，華府將不會攔阻任何政府的介入，而這並非杜勒斯的搪塞之語。早在華府決定改變政策，放棄叛軍轉而拉攏雅加達中的親美人士時，杜勒斯就曾在給鍾華德的電報中坦言，如果最終共產黨控制了爪哇，周邊擔心共產擴張的國家勢將介入，事態至此，美國是不可能阻止這些「獻身自由的政府和個人」的。⁶⁹同時在夏威夷當地時間 5 月 26 日，太平洋艦隊司令史敦普也勸這些願意與美國合作的印尼人士，應設法採取特定措施，以在亞洲反共鄰國中塑造印尼的良好形象。⁷⁰

另一透露美國此刻意向的，則是 5 月 27 日荷蘭駐美大使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對話。對話中荷蘭抗議在印尼政策轉變上他們並未得到華府充分說明，國務卿杜勒斯解釋道，美國過去的確寄望於叛軍，但叛軍已然失去活動力，且有名美國人被印尼政府所抓獲(指的就是波普)，故美國認為是時候改換方針，設法增加對印尼中央軍方和公民領袖的影響。在與澳洲、英國商量過後，二國也都贊同美國此一路線。不過國務卿杜勒斯本人悲觀地表示，即便三國在雅加達的大使都認為此作法可行，但他個人認為成功機會並不高。當下美國正向雅加達方面給予暗示，希望印尼採取特定的明確舉措，如內閣改組，讓美國判斷雅加達是否願意改變印尼親共的局面。但美國仍會盡可能保有其他可行的選項，如果在雅加達的計劃失敗，屆時可能的做法是美國會考慮採取更公開的行動，由菲律賓和臺灣給予（印尼叛軍）援助。考量到這種行動所將帶來的極端嚴重性，美國在採取這一措施前，仍將先嘗試影響雅加達。談話結束前，杜勒斯以極為鄭重的語氣對荷蘭大使強調，他所講的是美國

⁶⁹ Kahin, Audrey., and Kahin, George McTurna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uch in Indonesia*. p. 183.

⁷⁰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Stump) to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Burke), Honolulu, May 2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14.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14> (2020 年 5 月 26 日瀏覽)

當前的最高機密，絕對不得外洩，否則將為美國乃至於整個亞洲的「自由世界」帶來毀滅性的後果。⁷¹

由上述對話，我們可知道蔣中正此刻亟欲出兵的態度，雖然有部分來自於他自身強烈的個人意志，卻也多少正中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算盤。杜勒斯代表的是華府的強硬派，不同於美國第一線的外交人員、或軍方高層，某種層面而言，他與蔣中正想法確實存在若干交集，對於和雅加達合作抱持著相當悲觀的態度。雖然在嘗試與雅加達合作的階段，他仍盡可能避免台北的進一步介入，但就他個人的算盤而言，並不排除在雅加達失敗後，轉向支持蔣中正的行動。且他的這一說法並不單出現在與荷蘭大使的對話中，連在他給美國駐印尼大使鍾華德的電報中皆有所透露，足見此語並非安撫荷蘭的外交辭令，而是其內心真實的想法。不過對杜勒斯而言，或許所沒有意料到的，是蔣中正的態度遠比原先所估計的還要更加急切。當 23 日蔣中正承諾莊萊德他不會擅自行動時，莊萊德便以此承諾安心認為蔣已經接受規勸。故當 5 月 25 日台北忽然告知台灣協防司令竇亦樂他們正準備出兵印尼時，那顯然就是一個令之感到驚愕的緊急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當 25 日台北告知美方準備出兵印尼時，完全跳過了外交單位，是直接由軍方和軍方接觸，莊萊德至深夜才從竇亦樂口中輾轉得知此事，並為之感到極度震驚。筆者認為這件事情或有三種可能解釋，一是蔣中正試圖展現自己勢在必行的決心，透過軍方傳遞訊息，表明台北的軍隊已準備行動。如果考量到蔣中正認為「機會」是可以被主動創造的戰略思維，則這一先行準備再行商議的作法，不排除就是蔣希望透過實際執行力來打動美方的作法。第二種解釋則是如果蔣中正要立即行動，無論就著實際執行層面或條約義務，他就不可能不事先與負有協防台灣任務的美國軍方商量。最後一種可能，則是因為此前透過外交途徑，蔣中正已碰了個軟釘子，短期內舊議重提似乎難再有所突破，故改從軍方切入，或者也是希望另闢蹊徑、得到不同結果。

只不過蔣中正所面對的攔阻並不只來自外部，莊萊德和竇亦樂都觀察到蔣身邊一眾官員多半不樂見這一計劃的實施，只是無人敢直接反對。葉公超對「南海計

⁷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utch Protest Lack of Consultation Concerning Indonesian Developments), Washington, May 27,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1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16> (2020 年 5 月 26 日瀏覽)

劃」的悲觀想法某種層面上反映的也是當時台北許多高層共通的感受，這點從美方檔案中的記載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顯示局勢變化下，多數台北高層都能認清環境的限制，並對強行介入可能引發的外交及軍事問題深感憂慮，這也反過來襯托出蔣對此事執著的非比尋常。5月28日參謀總長王叔銘也在日記中記道：⁷²

印尼革命軍之成敗關係於我大陸民眾抗暴運動之前途甚巨，吾人必須盡力協助。但惜革命軍方面能力淺弱，無大作為，已近危險之期。余將令賴明湯組成專案小組，研究如何協助革命軍，但只能在武器方面盡量協助，如國際情勢無變化，美國態度不改變，吾人不能以單隊直接助戰，尤不能在西里伯斯(按：即蘇拉威西)登陸。吾人之援助原則，應當僅使革命軍不失敗……及不妨害本國之利益、不損中美邦交而行之。

此處可見王叔銘雖一向認為援助「革命軍」至關重要，卻也承認在美國改變態度以前出兵實為不宜。相較於台北眾多黨政高層的顧慮，蔣中正是否真的認為自己能夠獨斷行動確實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蔣中正不可能完全沒意識到其中困難，只不過如同莊萊德擔心蔣會在絕望中展開行動，對苦等機會的蔣中正而言，一直以來他所面對的都是超出他所能獨力面對的環境，無論爭取國際對中華民國地位的承認、或台海安全的維護、甚至反攻的大業，都遠非台北所能獨自掌握。在這一背景下，蔣中正在「南海計劃」中所展現的與其說是過分自信，不如說是一種1950年代動盪下所養成的逆勢而為的思維，這種思維或許不若毛澤東「人與天鬥」的鬥爭哲學那般激烈，但確實是其自身政權所賴以維繫的根本，並或多或少可從過去抗日戰爭中、在敵強我弱局面下慘勝的經驗得到支持。蔣中正推動的「南海計劃」就客觀環境來說如果沒有美國支持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對蔣而言，某種程度上他所期望的卻是透過自己的行動來改變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就結果來說，這則未曾直接讓美國過目的計劃則更像是一種預設美國改變政策情境下所擬寫的腹案，是蔣中正此刻有別於美國當前政策，對印尼內戰、乃至於亞洲局勢的另一種構想。是他不顧內外反對，憑個人意志所強行推動的。

⁷² 《王叔銘日記》，(民國47年5月28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17，頁87。

對美國而言，公開馳援「印尼革命軍」一事意味著與雅加達關係的決裂。華盛頓強硬派如國務卿杜勒斯等，雖未徹底否定此一可能。但自內戰爆發之初，杜勒斯支持「印尼革命軍」主要目的仍是希望向蘇卡諾施壓、改變其有親共嫌疑的行徑。至於讓「印尼革命政府」獨立、或取雅加達而代之，終究是前者失敗後的下下之策，這一思維明顯與蔣中正將印尼內戰認定為「反共戰爭」、並將雅加達和「印尼革命軍」的對抗視為敵我矛盾大不相同。蔣的這一態度或多或少可能也與自身過去國共合作、乃至於最終失去大陸的慘痛經驗有關。再者相較於與雅加達擁有正常外交關係的美國，對於和雅加達無親無故的蔣，支持「革命」顯然是一個更為有意義的選擇。無論是透過此舉向中共「引戰」，製造反攻機會，抑或是透過建立印尼「反共」政府，增加其在亞洲的盟友，這些考量顯然都與杜勒斯大不相同。這也是同樣名為反共，卻讓台北與華盛頓貌合神離的根本原因。



第四章 「南海計劃」內容與其影響

第一節 有限度的計劃

1958年5月22日，蔣中正與莊萊德對談時，提及摩羅泰島空軍基地的陷落與自身支援蘇拉威西島「印尼革命軍」奪回該島的渴望。此事遭美方勸阻後，蔣中正表面上應承，5月24日軍事會議上仍以中共若出兵印尼，其在南海活動將影響台海安全為由，指示成立「南海研究小組」研究下列相關計劃：「1.海空軍攔擊共匪[中共]派遣之志願軍部隊。2.以海軍陸戰隊之一部登陸西里伯斯[蘇拉威西島]。3.最後目標為爪哇雅加達。」¹按此指示，國防部第三廳以維持「印尼革命軍」作戰能力為始，最終推翻雅加達的蘇卡諾政府、建立反共的印尼政權為目標，於6月6日提出「南海計劃」完整方案，內容包含支援政策、軍用物資援助、軍事行動援助三節，並在最終給予可行性評估，於7日由國防部上呈蔣中正。

1. 「南海計劃」中的支援政策與其意涵

計劃開頭國防部對援助「革命軍」即提出以下三點原則：(1)在未獲美方協議前可以非美援武器裝備援助為原則。(2)所有武器裝備之支援，以不影響我方戰力為原則。(3)所有各項支援以不影響中、美雙方現行條約義務為原則。從敘述來看，美國態度與共同防禦條約的規範被列為計劃執行之大前提，相較蔣中正勢在必行的態度，實際計劃似乎保守不少。此落差很大原因還是由於實務面的極度困難所致。隨著「革命軍」一再敗北、美國態度趨於保守，彼時台北除外交部長葉公超和國防部長俞大維等人對出兵之事持勸阻態度外，參謀總長王叔銘雖認為「革命軍」成敗至關重要，但在指示第三廳成立專案小組時卻也認為，美國態度改變前絕不能出兵登陸印尼。²事實上6月初印尼局勢之惡化，已讓台北內部出現互相推責的現象。6月7日王叔

¹ 《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年6月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501.3_4022_1_2_00042132_031。

² 值得一提是副參謀長余伯泉之態度，依稍早葉公超對莊萊德說法，余伯泉對葉公超和俞大維之悲觀看法似頗為贊同。此處雖無其他直接證據，但參謀總長王叔銘在5月29日記稱：「石覺面告對運用余伯泉應加檢討，不可再重蹈孫立人之覆轍。」30日又道：「主持參謀業務會議，余伯泉又說了許多沒有作用的話，更覺此人非幹才也。」計劃完擬前夕，6月5日王叔銘日記又道：「賴明湯告稱余伯泉不忠實，發牢騷，且投機取巧，余亦有此看法。」當年孫立人因為海歸出身與行事作風差異，每與黃埔出身者發生衝突。戰後於東北參與剿共時，孫與上級杜聿明將帥不合，遭調閑職。余伯泉同樣是海外

銘在日記中記道：「[國家]安全局現因印尼革命軍失敗，要推卸責任於國防部，余告知凡有關外交事宜應先告知外交部。」³

種種困難下，不少黨政要員都對此行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感到憂心。面對蔣中正的脾氣，台北高層雖難直言己見，但由事後觀之，則這些顧慮某種程度上都被納入在 6 月 7 日國防部所上呈的「南海計劃」中。是故「南海計劃」雖是蔣中正個人意志主導的產物，結果卻隱然透露了其餘台北高層的顧慮，明顯包含更多對於共同防禦條約限制、台海防禦、和實際執行層面的考量。相較於蔣希望不顧美國之意、對「革命軍」傾力相助，國防部在考量到實際層面種種限制後，提交的卻是一份以符合與美國條約義務和不影響台海防禦為前提，給予有限度援助和待機而動的計劃。

2. 軍用物資援助計劃

台北對「印尼革命軍」的援助行動中，軍用物資援助可說是起步時間最早的。遠在「南海計劃」推動前、「印尼革命軍」成立之初，台北便與北蘇拉威西由蘇穆爾上校所率領的「革命軍」勢力牽上線，在國防部情報局指示下，由復興航空代為採買了大批軍火，銷售予「革命軍」。從 2 月 23 日至 4 月 21 日情報局一共給予了「革命軍」至少多達七營的裝備(詳見本文第二章)。在既有運作基礎上，軍用物資援助成了「南海計劃」中可行度最高、限制較少的一環。當國防部撰寫計劃同時，額外三營的裝備正由興中輪運輸，於 6 月 3 日出港(見下表)。與此前先收款後交貨不同的是，新一批裝備訂定以援助為原則，價值與償付則待事後另行專案處理。

留學出身，「南海計劃」研擬作業之際，另名副參謀長石覺和第三廳長賴名湯接連告狀，顯示余伯泉對此事態度恐怕甚為消極。

《王叔銘日記》，(民國 47 年 5 月 3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17，頁 88。《王叔銘日記》，(民國 47 年 5 月 29 日、6 月 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18，頁 90、94。

³ 《王叔銘日記》，(民國 47 年 6 月 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18，頁 95。

表 2: 計劃運交印尼革命軍「三個營」裝備數量統計表

| 計劃運交印尼革命軍「三個營」裝備數量統計表 ⁴ | | |
|------------------------------------|---------|----------------------------|
| 武器 | 數量 | 彈藥 |
| 60 迫砲 | 27 門 | 8,100 發 |
| 81 迫砲 | 12 門 | 3,600 發 |
| 51 戰防砲 | 4 門 | 6,394[6,349]發 ⁵ |
| 2 公分機關砲 | 10 門 | 5,000 發 |
| 國造 40 式 75 無後座力砲 | 9 門 | 720 發 |
| 25 機關砲 | 1 門 | 5,000 發 |
| 79 步槍 | 1,272 支 | 254,400 發 |
| 45 手槍 | 24 支 | 2,400 發 |
| 79 重機槍 | 12 挺 | 36,000 發 |
| 30 輕機槍 | 12 挺 | 222,000 發 |
| 90 衝鋒槍 | 513 支 | 153,900 發 |
| 手榴彈 | | 4,000 枚 |
| 大圓鋏 | 5,000 把 | |

除提供步兵使用的裝備，國防部亦計劃提供少數海空軍裝備給「革命軍」。這些武器多是二戰時期遺留的舊式武器。包含砲艇兩艘、飛機數架、以及雷達一具。

⁴ 《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 年 6 月 7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420_4040_1_2_00041382_008。

⁵ 此處國防部 6/6 日的部內簽呈、和 6/7 日給蔣中正的簽呈數字有所出入。推測純係謄抄之誤。

需注意的是計劃上備註 B-26 轟炸機由台北提供駕駛，意味著轟炸機名義上為「印尼革命軍」所有，實際上則是由台北之人員駕機執行任務。

表 3：擬援助印尼革命軍裝備數量統計表

| 區分 | 裝備 | 數量 | 辦理情形(1958/6/6) |
|----|----------|----|---|
| 海軍 | 砲艇 | 二艘 | 1.日式江秀艇 280 噸、海澄艇 350 噸。2.已由海軍總部令飭集中左營待命。3.由「印尼革命軍」派員接收(四十員)。 |
| 空軍 | B-26 轟炸機 | 一架 | 正改裝中，駕駛人員由台北協助。 |
| 空軍 | PBY 水上飛機 | ? | ? |
| 空軍 | P4Y 巡邏機 | 二架 | 由「印尼革命軍」向我購買。 |
| 空軍 | T-6 教練機 | | 撥助少數。 |
| 空軍 | 日式雷達 | 一具 | 1.正待運中。2.使用人員待遇由情報局協調空軍總部辦理中。 |

3.軍事行動援助-攔擊作戰

軍事行動援助一節包含對中共「攔擊作戰」和對印尼「登陸作戰」兩部分。針對攔擊作戰有兩點立案假定：(1)台澎及各外島如目前態勢。(2)能獲致美方協議及必要後勤支援。研究小組推測中共軍隊若前進印尼有東西兩可能路線。東航線由海南島沿越南近海至爪哇，西航線則假道緬甸經印度洋至蘇門答臘。西航線過於遙遠，不可能攔擊。較近的東航線，若在中南半島東側近海予以攔擊，攔擊區也距高雄達

⁶ 《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年6月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501.3_4022_1_2_00042132_012。

900哩，為台北 F-86 和 F-84 戰鬥機飛行半徑的三倍。從馬尼拉起飛也難以抵達，僅借取南越在西貢之機場方可能予以部分攔擊。

除空軍飛行半徑之限制，海軍受限台海防禦任務，能抽調船隻至多僅三至四艘，且因航程遙遠，在油料限制下巡邏時間難以持久。執行任務期間，缺乏空軍掩護區域船隻可能遭中共海南島之戰機的攻擊而蒙受損失。故研究小組認為攔擊作戰倘若實施將面臨以下三點可能：(1)如中共空軍實施反攔截作戰，其作戰範圍為華南與印尼周邊雷達涵蓋區域。其海軍亦只能在空軍掩護範圍內作戰。(2)中共潛艇可能襲擊執行攔截之海軍船隻。(3)中共如對金馬用兵，空軍將無法繼續攔截任務。

整體而言，第三廳認為攔擊作戰執行範圍有限、且分散台海防禦，使巡邏船艦暴露在無空軍掩護的風險下。如不能取得中間基地、或得到美方支援，空軍受航程限制、海軍身負台海防禦責任難以抽調，實施至為困難。

4.軍事行動援助-登陸作戰

軍事行動援助的第二部分「登陸作戰」分為兩案，第一案為登陸蘇拉威西島。由於該島崎嶇多岩岸，可供登陸岸灘甚少，難使用大部隊。故計劃於該島北端之萬鴉老、哥淪打落等海岸岩石較少區域，以四個加強營之海軍陸戰隊實施小規模登陸。由於該島駐紮之印尼政府部隊較少、[計劃擬定時]其他印尼政府軍又距離遙遠，短時間內難以馳援，故研究小組認為登陸蘇拉威西島是較為可行的方案，但實施前需滿足下列條件：(1)台澎及外島地區如目前態勢。(2)不影響外島運輸補給。(3)中共已派遣志願軍參戰。(4)本作戰須俟印尼革命軍提出要求，且本身尚具有潛力。(5)獲得美方公開或暗中支援，必要時予以我海空軍及後勤支援。(6)協調菲律賓及越南，以海空軍基地供我海空軍使用。(7)登陸北蘇拉威西島時，「革命軍」需能固守現有地區，以俟我軍抵達。⁷

此份代號「南海作戰」的蘇拉威西島登陸計劃，國防部情報分析估計在登陸時將面對印尼政府軍之陸軍五營、海軍艦艇一萬噸、陸戰隊一營、空軍每日出動架次戰鬥機 23 架次、轟炸機 10 架次、可使一次使用之傘兵部隊 200 人、其餘政府軍部

⁷ 《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年6月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501.3_4022_1_2_00042132_012。

隊則位於 670 哩以外地區。中共軍隊初期可支援印尼政府之最大兵力為陸軍一個師、海軍艦艇六艘、500 噸以下作戰艦隻 14 艘、飛機 280 架與傘兵二營。⁸

為完成此作戰，國防部估計所需動員之部隊除四個加強營的海軍陸戰隊外，尚須動用包含巡邏、運補、登陸艇等在內共 49 艘海軍艦艇，與 12 架偵察用的 AT-6 飛機。以上之部隊，若欲實施作戰，僅需 4 日即可動員至左營軍港集結完畢，並於第 16 日在蘇拉威西島開始登陸作戰。相關作戰均將保持高度機密，於海上運動期間向部隊宣佈任務，並在接近蘇拉威西附近海域時利用夜暗航行接近目標。⁹

表 4：蘇拉威西島登陸作戰所需艦艇之估計

| 蘇拉威西島登陸作戰所需艦艇之估計 | |
|------------------|---|
| 旗艦 | 1 |
| 驅逐艦 | 2 |
| 護航艦驅逐艦 | 2 |
| 砲艦 | 4 |
| 掃雷艦 | 4 |
| 巡邏艦 | 8 |
| 火力支援艦 | 2 |
| 運油艦 | 2 |
| 救助艦 | 2 |
| 運輸艦 | 2 |

⁸ 此處雖無詳細說明，但筆者按常理推測此處所說 280 架飛機所指可能包含中共從華南地區和海南島可起飛之飛機數量。《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 年 6 月 6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501.3_4022_1_2_00042132_012。

⁹ 《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 年 6 月 6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501.3_4022_1_2_00042132_012。

| | |
|-------|----|
| 海岸掃雷艦 | 2 |
| 傷患收容艦 | 1 |
| 戰車登陸艦 | 9 |
| 中型登陸艇 | 8 |
| 總計 | 49 |

然國防部也估計，此作戰若實施將可能遭遇以下反制：(1)印尼政府軍可能以海空軍及各島現有兵力阻止登陸。(2)印尼政府軍可能用全部海陸運輸能力，調集部隊予我全力打擊。(3)中共可能以陸海空軍支援印尼政府軍作戰。(4)中共可能對金馬採取行動。(5)中共可能對台澎採取行動。其中上述前四點尤被研究小組認為是最可能之反制。¹⁰

結論而言，雖被認為是較可行的方案，研究小組仍認為作戰若無美海空軍掩護，台北空軍受航程限制，登陸部隊在印尼政府軍獨佔空優下將不易實施大規模兩棲登陸作戰。且作戰實施後，國軍雖可獨力運補，但後勤物資仍需美方額外支援。立案假定中所列必須得到美國協議與支援一節，清楚顯示國防部認為若無美國支持，此一作戰實施仍舊困難。行動前須由「革命軍」主動提出和中共已派軍參戰兩點，也透露出國防部對於此行動正當性的顧慮。

登陸蘇拉威西島尚且如此，則第二案登陸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其顧慮將更加明顯：(1)需使用大部隊(需一個師至一個軍)，對台澎及外島防務不無影響。(2)需獲得美方海空軍支援，無美方支援，台北自身海空軍無力提供掩護。(3)「革命軍」如今在蘇門答臘和爪哇已無大部隊，此刻登陸將因缺乏內應而難有進展。(4)由台灣至爪哇距離達兩千一百三十餘哩，後勤支援將極度困難。綜上所述，研究小組認為第二案需等待蘇門答臘局勢轉向對作戰有利、且美國願意給予海空軍支持時方得實施，基本否定了此一作戰的可能性。¹¹

¹⁰ 《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年6月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501.3_4022_1_2_00042132_012。

¹¹ 《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年6月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501.3_4022_1_2_00042132_012。

4. 選派軍事技術人員個別參加作戰

依照「革命軍」向台北之請求選派相關技術人員予以支援，研究小組認為相關人員當以志願軍與退役軍人的個人身份參戰為妥，待遇則由「革命軍」方面負責，交由情報局洽商中。

對於「南海計劃」，研究小組整體結論如下：(1)軍用物資援助宜照既定方案加強辦理。(2)攔擊作戰在獲菲、越海空軍基地前難以實施。(3)登陸作戰部分，以登陸蘇拉威西島一案較為可行，但海軍陸戰隊之出動需得到美方協議。登陸爪哇或蘇門答臘一案，則須待國際局勢發展，再協調美方辦理。

綜合上述各點來看，雖然「南海研究小組」在附件中不乏攔擊作戰、登陸作戰等大規模計劃。然而就實務上，這份依蔣中正指示所擬定的計劃，國防部評估結果則明顯抱持了極為審慎的態度，從執行能力到台海安全、美國態度和中共可能的反應都被納入了考量。之中最大顧慮除台北自身缺乏能力執行，似乎也包含了計劃正當性不足的問題。雖然蔣中正以中共軍隊在南海活動將威脅台灣安全為由，要求擬定計劃。不過當 22 日莊萊德詢問中共參戰的情報來源時，蔣中正僅回答得自報紙。依賴此一顯欠根據、真實性有待商榷的情報推動計劃，或為蔣自身對中共威脅的戰略判斷，又或者僅為蔣藉故行事的藉口。然倘若中共並未出兵，蔣又未得美國支持，則台北出兵將顯得師出無名，使其本來就已趨被動的外交處境更加艱辛。遑論此一行動若挑起了台海衝突，台北是否準備好要面對兩線作戰、恐怕也將使華府對台北的支持受到嚴厲抨擊。緣此而究，國防部在「南海計劃」中將中共出兵列為行動前提的說法也就不難理解了。

計劃雖未直接否定蔣中正介入印尼的構想，卻在評估過程中顯示欲實現這些構想的嚴苛條件和可能後果。事實上 6 月 7 日「南海計劃」上呈蔣中正後，便未再下文，此後蔣日記也罕再對印尼局勢表示什麼意見，直到叛軍最後據點萬鴉老陷落後，6 月 27 日方批「悉」一字。¹²過程中計劃某些部分雖在蔣經國指揮下得到有限度實施，但最為冒進的部分，如印尼登陸作戰和攔擊作戰等大都被束之高閣。可見得在第三廳的詳細分析下，蔣雖不情願，也大致接受了時局下要不顧美國之意在印

¹² 《國防部》，〈四十七年六月七日涵測 21 號簽呈為呈報研究印尼革命軍作戰有關事項及附件六份請鑒核一案悉〉，1958 年 6 月 27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501.3_4022_1_3_00042132。

尼獨自從事大規模行動是不切實際的，讓原先山雨欲來的態勢終成了「雷聲大雨點小」。

第二節 台北 B-26 轟炸機在印尼之行動與其影響

雖然 1958 年 6 月 7 日蔣中正收到「南海計劃」呈件後便未再積極參與相關事務，但台北對「革命軍」的援助仍在蔣經國指揮下由情報單位持續運作了一段時間，並在美國面臨政策轉向的十字路口，直接衝擊了美國和印尼之間的關係，甚至一度釀成雅加達和華府間的信任危機、嚴重干擾華府的戰略佈局。而讓這一矛盾浮上檯面的關鍵正是台北所派出的 B-26 轟炸機。

B-26 轟炸機是「南海計劃」下台北提供「印尼革命軍」的軍事物資援助，由台北提供飛機的同時協助提供駕駛人員。據陳文寬回憶，原先復興航空肩負載運軍用物資給「革命軍」的任務，三月底時為了擴充載運量，在和「革命軍」商量過後，他前往美國洽商購買二手 C-54 運輸機事宜，並透過美國支持「革命軍」的團體找上了一家位於紐澤西州梅角(Cape May, New Jersey)的包機公司美國海外航空(US Overseas Airlines)。¹³正當 C-54 購買事宜好不容易在外交部和國務院打點下妥當之際，卻傳來消息，表示計劃變更，希望改買 B-26 轟炸機。幾經波折後，最後是由一名私人收藏家手中購得一架 B-26。五月中陳雇了幾人與他一同將二架飛機飛回台灣，飛機離開美國時間點正好是波普事件發生後數日，足見此刻局勢雖已逐漸改變，但私底下美國對於是否徹底放棄叛軍仍有所猶豫。¹⁴

兩架飛機回台後，B-26 交由空軍進行改裝作業，將武器重新安裝。時為空軍少將的衣復恩此時奉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之命，負責配合支援蘇拉威西島的「革命軍」勢力。初時衣復恩表示希望由復興航空派人執行轟炸任務，卻被陳文寬拒絕。陳堅持認為復興航空可以接受載運物資，但轟炸是完全不同的任務，應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來執行。最終衣復恩只得同意，改由空軍飛行員執行任務。¹⁵於是在衣復恩

¹³ 此公司是二戰結束時成立的，專受美國國防部委託，將歐洲戰場的美軍運回美國。日後韓戰爆發，亦透過經營美日航線賺了不少錢。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頁 164。

¹⁴ 該時無論 C-54 或 B-26 的購買，從美國出境都需要國務院給予的出口許可、入境台灣則需要外交部的進口許可，且相關手續往往曠日費時。然而據陳文寬回憶，在國務院和外交部特別關照下，不但相關申請順利通過，且等待時間被大幅縮短。可見無論 C-54 或 B-26 的購買，都有美國的暗中支持。參見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頁 161-176。

¹⁵ 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頁 176。

帶隊下，由空軍三十四中隊的飛行員張聞驛上尉、空軍二等兵黃安黎、復航創辦人戴安國、陳文寬等人以這兩架飛機載著大批油料、彈藥飛往大威島(Tawi Tawi)。機上尚有十數名「印尼革命軍」人員同行，之中亦包含「印尼革命軍」空軍司令 Petit Muharto。大威島位在菲律賓南端。島上除了他們和「印尼革命軍」外，還有菲律賓的軍人與疑似是美方的人員。他們在該島駐紮近一個月，以該島為基地至蘇拉威西一帶尋找目標予以攻擊，直到 C-54 攜來之彈藥用罄，且適逢印尼局勢變化才駕機返台。¹⁶

按國防部報告，從 6 月 15 日到 7 月 13 日為止，B-26 一共出動了至少五次(見下方表格)。衣復恩回憶中認為因對敵情缺乏瞭解，作戰效果有限。但若查閱美國檔案記載，則此乍看缺乏規劃的行動，其政治影響力恐怕是超乎衣復恩的想像。

表 5：6 月 15 日至 7 月 13 日 B-26 先後協助作戰次數

| 6 月 15 日至 7 月 13 日，B-26 先後協助作戰共計五次 ¹⁷ | |
|--|---|
| 6 月 15 日 | 於比東海面，先後發現木船(五百噸)、登陸艇(三千噸)各一艘，均予以攻擊。發射子彈九百發，命中率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 |
| 6 月 25 日 | 於基馬、比東海面，發現零星燈光三處，判為船隻。經攻擊後燈光熄滅。 |
| 6 月 27 日 | 於比東攻擊灘頭目標三次，復於萬鴉老北海面發現登陸艇一艘，發射子彈五百一十發，大部命中。該艇即冒出濃煙，並以高射砲還擊，我機曾有猛烈震動，當即脫離返航。 |
| 7 月 9 日 | 攻擊基馬、萬鴉老、力古朋等地海灘，並於該等地區，先後發現船隻(一千五百噸)及軍艦(三千噸)個一艘，均曾予以攻擊，戰果不悉。 |
| 7 月 13 日 | 攻擊基馬、比東、萬鴉老等地海灘，萬鴉老海灘上兩棟木屋冒煙起火，判係儲油燃燒。 |

¹⁶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 324-328。

¹⁷ 《國防部》，〈為呈報援助印尼革命軍工作辦理情形請見核由〉，1958 年 7 月 26 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 47_0420_4040_1_3_00041382。

轟炸機發動第一次攻擊後不久，1958年6月17日早晨，印尼外交部長蘇班德里約告知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鍾華德15日早上九點哥淪打落發生B-26轟炸機攻擊事件。鑑於萬鴉老附近所有可用機場、包含摩羅泰島都已處在印尼政府控制下，印尼政府認為轟炸機唯一可能起飛地點是位在菲律賓南端的Sanga Sanga(即Tawi Tawi列島中的一個機場的名稱)，印尼政府這項推測顯然是極為精準的。¹⁸蘇班德里約說印尼空軍本來希望追擊該飛機，將之擊落，但被他和總理給阻止了，因為他們不希望剷滅叛軍行動的最後階段捲進其他國際事件裡。在他們看來很顯然的，轟炸機之所以未進行轟炸而以掃射方式攻擊，是因為裝載炸彈飛機將無力來回Sanga Sanga到哥淪打落的距離，他請美國政府設法勸阻菲律賓政府類似行為。他說印尼政府知道叛軍軍官瓦羅(Colonel Warouw)曾在5月中造訪台灣和韓國，試圖取得B-26和B-17轟炸機，當時印尼政府認為該項活動未獲成功，但從此次攻擊來看，印尼政府認為他們須設法加速解決衝突，確保它是在印尼內部衝突的框架下被解決。並表示他們已指示印尼駐馬尼拉大使與菲律賓政府交涉，避免Sanga Sanga再被叛軍用於類似行動。¹⁹

幾乎同時間，印尼陸軍領袖納蘇遜將軍也派人傳話給美國大使館武官，表示「他們明白該架飛機很可能並無美國的知情或控制」，但「鑑於他所承受來自爪哇高階軍官的壓力」，仍希望美國就其所能，保證此事非美國所為。²⁰納蘇遜將軍身為雅加達戰時掌權人，為蘇門答臘出身，既是印尼強力反共的代表人物，也是一名民族主義的愛國志士。他雖同情叛軍訴求，卻擁有軍隊國家化的理想，對叛亂行為無法容忍，而在一開始決意鎮壓叛亂。在叛軍敗勢顯露後，納蘇遜逐漸成為華府新政策中亟欲拉攏的對象。這一新策略尤其受到美國駐印尼大使鍾華德和美國軍方的支持，不過新策略究竟能否奏效，在6月份仍是華府內部討論不休的議題。印尼陸軍反共態度或許無大疑議，但雅加達內閣的動向卻是充滿許多未知，使華府內部出現分歧。6月20日中情局長艾倫·杜勒斯在給其兄長國務卿杜勒斯的信件中指出蘇卡諾仍是

¹⁸ 衣復恩，《我的回憶》，頁324-328。

¹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June 17,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2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22> (2020年9月19日瀏覽)

²⁰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June 17,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2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22> (2020年9月19日瀏覽)

印尼無法堅決反共的根本關鍵，蘇卡諾基於「民主」精神，不願取締特定政黨，自身又因為創建印尼獨立的歷史功業，在黨政軍各界領袖中備受敬重，如果沒有他的支持或允許，印尼恐怕難有堅決的反共作為。至今印尼共產黨皆以合法手段在當地發展，考量到其支持度仍可望擴大，印共大概會繼續以此方式在當地發展。²¹

6月24日，印尼應美國壓力的內閣改組名單出爐，不過一名被認為是極左派的閣員哈拿非(Hanafi)在被拔掉部長職後仍被保留在內閣名單中，讓美國大使鍾華德向印尼外長表示，擔心這份名單恐怕無法說服華府讓原先答應的援助如期發放。而蘇班德里約則回應，近來有些「不幸事件」(unfortunate events)讓蘇卡諾採取了保留態度，不願在此刻做太多改動(對此鍾華德理解認為很可能是指飛行員波普的事情)。但強調現有改動是合於當前印尼政治現實的，希望鍾華德不必為此挫折。調整雖然緩慢，但長時間來看結果仍是一樣的。在給國務院電報中，鍾華德指出他認為向蘇班德里約展現負面反應、以施壓印尼持續反共是明智的作法。鑑於一些負面因素陸續的發生(如波普事件、亨斯利的報導²²、印尼政府軍陸續在蘇門答臘發現叛軍庫藏美製新式武器等)，此時印尼採取的任何反共行動，都應對華盛頓有所鼓舞，實際上他不若對話中所呈現的那般沮喪。²³

隨著印尼政府軍即將攻陷萬鴉老，6月26日台北一架PBY飛機將兩名聯絡員彭廷昭、吳振東接回。同時「印尼革命政府」代表皮息、財經部長蘇明度(Sumitro)、及三軍總司令卡威拉郎等人也隨機來台。²⁴與此同時，美國猶豫空間也越來越小。華盛頓時間26日國安會議上，中情局長艾倫·杜勒斯指出雅加達最近的內閣改組，看不出有什麼明確轉變，日惹蘇丹雖曾收到入閣邀請，卻拒絕了邀請。隔日在國務院舉辦的參聯會議上，國務院遠東助卿勞勃森報告表示，印尼最近內閣改組結果令人

²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Cummi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Washington, June 20,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2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23> (2020年9月19日瀏覽)

²² Hensley article: 這裡所指的是一名合眾社記者 Stewart Hensley 曾撰文稱據外交部門表示，美國和印尼關係正在持續改善，預期未來數週將會有更和諧的發展。這篇文章在6月11日被印尼媒體安塔拉通訊社(Antara)所節錄。考量到印尼建國以來所堅持的「中立路線」與「不結盟」立場，這樣的描述方式很可能引起蘇卡諾對於和美國關係的疑慮。

²³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June 24,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24.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24> (2020年9月19日瀏覽)

²⁴ 《國防部》，〈為呈報援助印尼革命軍工作辦理情形請見核由〉，1958年7月2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420_4040_1_3_00041382。

失望，極左派人物哈拿非被保留在內閣中，在蘇卡諾仍佔印尼政治主導地位當下，強力支持納蘇遜恐有一定風險。海軍作戰部長柏克則認為，納蘇遜此刻已是美國在印尼的「唯一希望」(only hope)，其地位正被某些爪哇軍官削弱，美國應設法予以加強。陸軍參謀長泰勒(General Taylor)也贊成應設法爭取增加援助印尼陸軍的經費。此處不難看出美國軍方高層多抱支持納蘇遜反共的立場，相較之下國務院高層則對於納蘇遜能否與蘇卡諾個人影響力抗衡缺乏把握。²⁵

6月27日國務卿杜勒斯致電鍾華德，表示如今印尼政府攻克萬鴉老，陸軍的戰鬥已然結束，印尼應採取比內閣改組更為明確的反共措施。並指示設法透過納蘇遜、鍾安達提醒蘇卡諾亞洲鄰國對於共產黨在當地增長的憂懼。美國無意要求印尼加入東約(SEATO)，但美國也希望印尼能保持自身「自由」，不被共產黨所控制。²⁶

7月5日，國務卿杜勒斯在巴黎與法國外長莫里斯(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談話指出，印尼政府雖應他們要求改組內閣，但改動實在過小，以致他不得不訓令駐印尼大使告訴蘇卡諾「除非他採取積極行動遠離共產主義，否則將無法阻止鄰近國家對叛軍的援助」(Unless he took positive steps away from Communism,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prevent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rendering assistance to the rebels.)。並稱據華府所知，菲律賓、台灣、韓國對印尼局勢都有相當深的顧慮，渴望給予叛軍援助。因此，這種情況可能很快就會到來：即「要麼蘇卡諾改變立場，要麼反叛活動增加」(either Sukarno would come around or increased rebel activity would be permitted.)。²⁷或者此刻杜勒斯仍希望持續透過鄰國對叛軍的援助向蘇卡諾施壓，或者他認為在印尼消除共產影響以前，他難以說服周遭鄰國停止對叛軍的援助。只不過日後看來，則美國駐印尼大使鍾華德與美國軍方看法顯然與杜勒斯的消極態度有所不同。

²⁵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of the Substance of Discussion at a Department of State-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Washington, June 2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27.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27> (2020年9月19日瀏覽)

²⁶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Washington, June 27,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2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28> (2020年9月19日瀏覽)

²⁷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aris, July 5,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3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31> (2020年9月19日瀏覽)

7月7日鍾華德再度收到印尼方面消息，6日一架型號不明的四引擎飛機在北蘇拉威西地區投擲汽油桶、砸中民宅造成傷亡。此舉雖令人費解，但雅加達懷疑該飛機是來自台灣的B-29，目的是援助山林中殘餘的叛軍人員，外長蘇班德里約希望美國設法施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菲律賓避免類似事情。鍾華德則回應就他所知太平洋該區域並不存在B-29飛機，推測該飛機較有可能是DC-4(其軍用型就是C-54運輸機)。在給國務院電報中他指出，據台北大使館傳來消息，飛機無疑是來自台灣，但在美國設法與印尼推進關係的當口，持續發生這種事實在「毫無道理」(make no sense)，恐使雙方進展胎死腹中(nipped in bud)。²⁸更直言要印尼人相信美國在太平洋無力阻止這樣的事發生是不可能的，他認為此刻支持叛軍於促進印尼反共已無作用，反而應使派至蘇拉威西清剿叛軍的陸軍儘速返回爪哇，嚇阻在爪哇之共產勢力。²⁹為此他建議國務卿應設法敦促莊萊德與台北溝通，停止對叛軍的援助。³⁰

7月9日，美國太平洋艦隊參謀長萊利(Herbert Riley)與納蘇遜將軍談話，納蘇遜告訴他自己正奉總理鍾安達指示擬定一項以陸軍執行反共的計劃，雖然還未將計劃遞交給鍾安達，但該計劃將任命反共軍官任職於全國各地的監督系統，遍及鄉村、工會、商業、船運、退伍軍人等各組織團體。此計劃預計由代理國防部長職務的鍾安達指揮，內閣中非相關人員不會被告知此事。萊利雖對計劃反共效果深具信心，

²⁸ 備註：此日期在台北國防部檔案無特別記載，暫時缺乏直接證據證明飛機是來自台北。但據台北國防部檔案，萬鴉老機場無法使用後，從6月20日到7月14日台北曾派機到卡拉威蘭機場空投四次輕型武器彈藥約十二萬發，故該機確實有可能為台北之C-54。

《國防部》，〈為呈報援助印尼革命軍工作辦理情形請見核由〉，1958年7月2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420_4040_1_3_00041382。

²⁹ “On contrary such action only exacerbates situation and ties down GOI army preventing its return to Java where it has and we believe will continue exert pressures against Communists.”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July 7,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3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32> (2020年9月19日瀏覽)

美國放棄叛軍後，其主要印尼政策為設法支持由納蘇遜將軍領導的印尼陸軍從事反共工作。然而彼時的印尼陸軍為了平服叛亂多被抽調至外圍島嶼，納蘇遜和鍾安達稱此時推動積極的反共政策，面對爪哇勢力龐大的印共，陸軍將無力控制形勢。此一顧慮亦得到美國大使鍾華德和多數華府高層的認同。故當6月底印尼政府軍宣布攻佔萬鴉老時，不單意味著內戰即將結束，也被華府認為是印尼可展開積極反共的時刻。

³⁰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July 7,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3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32> (2020年9月19日瀏覽)

但納蘇遜也告訴他現今計劃最大阻礙在於外部勢力的介入，使軍隊難以轉向對付共產黨。³¹

7月13日來自台北的B-26轟炸機再度於基馬(Kema)、比東(Bitung)、萬鴉老等地海灘發動攻擊，此次攻擊為國防部檔案中所載B-26在當地的最後一次行動，卻也是在政治上影響最劇的一次。³²鍾華德收到消息時，印尼外長蘇班德里約表示他已被要求在印尼內閣會議報告此事，特別是關於美國對此事的態度。印尼政府現在正考慮將事情提告聯合國，抗議此一侵略行為。他說在印尼和美國改善關係的當下，自己為此舉可能帶來的影響表示遺憾，但蘇卡諾、鍾安達和多數內閣成員的態度強烈，他擔心除非攻擊停止，否則此事幾乎是勢在必行。他說自己無意指控美國涉入，但波普事件和他的日誌確實在此刻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另外一些他們所掌握的貨箱，上頭標籤也顯示物品來自台灣，並經克拉克機場被運到印尼。外長再次請求美國國務卿應對此事發表聲明[否認美國的參與]，鍾華德則表示自己的保證得自國務卿授權，與國務卿聲明有同等效力。但外長堅持，國務卿公開聲明可以說服印尼大眾和蘇卡諾。在給國務院電報中，鍾華德指出如果印尼將此事提告聯合國，考量到此刻伊拉克爆發政變和中東動盪，將為最不幸之事。³³

7月16日，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史敦普在得知鍾華德這一傳回華盛頓的電報不久，即寫了一封信給海軍作戰部長柏克。信中他明顯帶有不滿地表示：³⁴

若非中國國民黨和菲律賓提供基地，叛軍根本不可能持續轟炸。假如我是個印尼人，或以我此刻身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的身份，我都無法相信美國竟有無力到不能阻止這些攻擊。這些攻擊讓叛軍不斷得到鼓舞，

³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July 9,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3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33> (2020年9月19日瀏覽)

³² 《國防部》，〈為呈報援助印尼革命軍工作辦理情形請見核由〉，1958年7月2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420_4040_1_3_00041382。

³³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July 15,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34.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34> (2020年9月19日瀏覽)

³⁴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Stump) to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Burke), Honolulu, July 16,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35.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35> (2020年9月19日瀏覽)

讓政府軍被牽制在爪哇之外無法抵禦共產黨。印尼中央那些備受我們寄望、擔憂共產威脅的人，為此而懼於照我們所期望的去做。

從史敦普這封信和7月6日國務卿杜勒斯在巴黎和法國外長的對談比對後可以發現，台北轟炸機在此期間對印尼的攻擊，反映的除了是蔣中正和美國現行戰略的衝突外，同時也反映美國內部杜勒斯兄弟為首的強硬派和大使館以及美國軍方之間觀點的分歧。國務卿杜勒斯對法國外長的言論，表明他顯然並非不曉得台北和其他東亞國家渴望援助叛軍的意圖，但他卻聲稱在雅加達有更明確反共措施前，自己「無法」阻止相關活動。而實際上究竟是他「不想」、抑或「不能」阻止？這其實是個很值得玩味的問題。

就在美國駐印尼大使和太平洋艦隊司令的信傳回華府後不久，7月20日，美國駐菲大使告知台北駐菲大使陳之邁，早前一架台北軍機在菲律賓上空幾乎與美方軍機相撞，希望多加注意。經台北外交部電飭陳大使進一步確認後，陳之邁向台北外交部回報美駐菲大使答覆：³⁵

(一)約一個月前我 B-26 型軍機一架飛往克拉克上空，前往菲南部加油轉接印尼，美空軍於雷達上測見，固事先未得報告，乃命噴氣機偵查，我機忽然在雲中出現，幾乎互撞。(二)中東事變後，美軍加強警戒，對不明機深憂發生誤擊。(三)印尼革命軍現已無成功希望，似無繼續支援意義，盼我考慮。

此一回覆31日經台北外交部長黃少谷轉總統府和國防部。從上述內容觀之，顯見美方早在6月中就已知道台北 B-26 的存在，只不過當時並未積極介入。而據衣復恩回憶錄描述，他們的行動最終是因為彈藥用罄而停止，無論此說法是否屬實，按照7月中的局勢來看，倘若 B-26 繼續發動攻擊，一旦雅加達將事情提上聯合國，都將成為華府和台北極大的麻煩。³⁶7月26日台北國防部向蔣中正上呈自「南海研究小組」

³⁵ 《國防部》，〈軍機相撞一事〉，1958年7月23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420_4040_1_4_00041382。

³⁶ 相較於衣復恩回憶錄此處的語焉不詳，陳文寬則回憶說當時自己觀察到局勢越來越危險，遂在某次運送任務結束返抵大威島後，主動找衣復恩討論，表示數月來「印尼革命軍」氣勢已大不如前，同時波普事件也顯示他們的安全並沒有保證，如果一架飛機在當地被擊落，中華民國政府將陷入一個相當麻煩的外交處境，所以空運之事該適可而止了。對此，衣復恩相當不以為然，認為軍人不能因為有人被俘就要退縮。堅持為防止印尼赤化，應繼續援助「革命軍」。陳文寬站起來表示，自己不是不願冒險，但不該魯莽。並反問如果今天復航的飛機被印尼政府軍擊落，中華民國政府會如何處理？依他

成立以來對「印尼革命軍」各項援助政策之辦理情形，「南海計劃」的執行也就此落幕。那架「革命軍購買」的 C-54 飛機，據衣復恩回憶後來被轉贈給了剛成立的華航，成為公司的首架該型飛機。

在台北行將終止行動之際，美國駐印尼大使鍾華德則忙著為 B-26 造成的衝擊安撫印尼。7 月 21 日印尼總統蘇卡諾在茂物(Bogor)接見美國大使鍾華德，鍾華德形容蘇卡諾心情「前所未有的嚴肅」(in most serious mood)，見面時邊握著他的手邊念著「麻煩、麻煩、麻煩」。聊完黎巴嫩和中東形勢後，蘇卡諾接著表示印尼和美國關係再次開始崩壞。過去數週曾改善的關係，如今正隨著 B-26 轟炸機的持續攻擊一掃而空。鍾華德則依國務院稍早電報表示，不同於蘇聯和其衛星國家的關係，美國「無法命令」遠東獨立國家，也因此眼前局勢並非由美國所掌控。如果轟炸持續未絕，只說明了周遭國家對於印尼共產黨在印尼影響力不斷增長的深切憂慮，而這樣的憂慮是很自然的。他深信如果馬來亞落入共產黨控制，蘇卡諾也會有相同感受，並直指印共本質為一個受境外勢力控制的政黨。如今印尼政府已戰勝了叛軍、重組了內閣，美國和其他所有鄰國都想知道總統的下一步是什麼。蘇卡諾回答自己「絕不會允許共產政變在他的國家發生」。鍾華德同意這點大家在茉莉芬事件都看到了，但鄰國擔心的並非共產政變，而是印共不斷膨脹的影響力將使它在正常民主程序下掌權。³⁷

對於此次談話，鍾華德 7 月 24 日在給國務院報告中認為效果良好，這是蘇卡諾首次承認自己注意到印共的危險。但也指出蘇卡諾對於 B-26 攻擊事件仍有相當深的顧慮，雖然他傾向接受美國說法，但對於美國無力阻止仍感存疑。這些攻擊事件和早先波普的例子、以及其他外國支持叛軍的證據當然會被印尼中央認為是有利於美國和反共，並成為印共煽動反美的材料。³⁸對話中，鍾華德聲稱美國「無法命令」東亞獨立國家之說法或為部分事實，但美國對於阻止轟炸的消極態度也反映國務卿

所見，最大可能就是政府會與復航劃清界線，所有責任都會落在他頭上。說罷，陳文寬表示這是復航最後一次參與任務。隔天他率先飛著 PBY 飛機返回台灣，並將 C-54 交由衣復恩駕駛回國。依陳文寬說法，則促成行動終止的最後一根稻草似乎還是由於復興航空的退出。參考 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陳文寬的冒險歲月》，頁 178-180。

³⁷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July 21,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3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36> (2020 年 9 月 19 日瀏覽)

³⁸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one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jakarta, July 24, 195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8-1960, Indonesia, Vol. XVII, Document 137.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d137> (2020 年 9 月 19 日瀏覽)

杜勒斯在印尼必須遠離共產的強硬態度下，對此事的曖昧態度、以及華府在放棄叛軍後，仍對新政策缺乏把握。

8月1日，一場跨部會會議在華府召開，與會者包含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首長，並由國務卿杜勒斯主持。會議上國防部副部長艾爾文(John N. Irwin II)表示五角大廈認為美國應該以增強納蘇遜的力量，作為使爪哇反共的手段。納蘇遜曾表示他無法苟同叛軍手段，但認同他們的目標。納蘇遜也是有望使印尼國內各派和解的人物。經討論後，國務卿杜勒斯總結如今看來多數人都同意採用遠東助卿勞勃森所擬備忘錄中的第一種方法，換言之即確立支持納蘇遜領導陸軍反共的政策。

總結台北在1958年6到7月於「南海計劃」下對「革命軍」的援助行動，不但反映蔣中正強烈的個人意志和戰略認知，也在華府對印尼政策轉向、試圖督促雅加達採取反共措施的過程中，作為政治槓桿發揮著一定作用。雖然5月下旬時，國務卿杜勒斯曾兩度勸阻蔣對印尼的介入，然從1958年6到7月中為止，國務卿杜勒斯對雅加達反共誠意的懷疑、乃至於對蘇卡諾絕對影響力的擔憂，都使他對「援助行為」顯得態度曖昧，與極力主張阻止外國介入的五角大廈、乃至於一線外交官鍾華德形成鮮明對比。從這點來看，蔣中正的「南海計劃」除反映台北與華府間想法的衝突，也凸顯了華府內部想法的分歧。隨著「革命軍」最後據點陷落，以及轟炸對印尼和美國關係造成的壓力，這項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的行動也就此謝幕。

「南海計劃」在環境限制下實際實施的部分並不多，軍事物資援助國防部原定提供的三營裝備於6月3日由興中輪裝運出航，但在6月8日靠近蘇拉威西島附近海域時，適逢印尼政府軍登陸萬鴉老，遂中途折返，未完成交付。原先整備中之砲艦也因局勢轉變，最終未予交撥。除此之外，諸如攔擊作戰、登陸作戰等大規模內容，也因為明顯超出台北能力範圍、加上美國不願支持而作罷。直到萬鴉老被政府軍攻陷後，6月27日第三廳遂以「印尼局勢業已轉變」為由申請解除對計劃的相關管制，顯見此時台北的積極態度在國際形勢下逐漸轉向觀望。

此後台北的B-26攻擊仍從六月中持續到了七月中，並產生極強烈的政治後座力。不但危及美國和印尼的關係，更在最後一次攻擊時直接促使印尼政府告知美方準備提告聯合國要求，彼時適逢伊拉克政變和黎巴嫩動盪，讓美方擔心此事將影響其在中東之政策。時局變遷下，華府內部對印尼的看法漸趨一致。適逢衣復恩等人

所攜彈藥用盡，時局下顯見再炸無益，便連同「印尼革命軍」相關人員撤回台灣，至此中華民國政府對於「革命軍」的援助也就基本劃下了句點。³⁹台北雖仍和從事游擊的「印尼革命軍」保持聯繫，卻未再給予實質的援助，並和華府達成協議，日後相關問題方針將先行諮詢華府意見。⁴⁰



³⁹ 《國防部》，〈為呈報援助印尼革命軍工作辦理情形請見核由〉，1958年7月2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420_4040_1_3_00041382。

⁴⁰ 「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與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對話紀錄」(1961年4月26日)，〈蔣經國與克萊恩會談紀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301-00001-016。

第五章 結論

1958年蔣中正對印尼內戰的介入，反映的固然是地方反對勢力與雅加達固有的矛盾，卻也包含了許多冷戰背景下的「外部因素」。台北與華府雖都在此次內戰中著力甚多，但「南海計劃」則凸顯了蔣與華府在此一過程中想法的差異。

1958年時的東亞誠如美國國務院遠東助卿勞勃森對蔣中正所言，美國先後與「日、韓、中國[中華民國]以及菲律賓分別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又與其他七國締結東南亞公約。這些條約只有一共同之目的，就是遏制此一區域的共產侵略...一言以蔽之，此即反共政策是也」。¹透過防禦條約和區域同盟，1950年代的美國在東亞對共產主義展開全面圍堵的策略，也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敗退台灣的蔣中正得以在冷戰對抗的夾縫中爭取到自身的一席之地。依賴1954年台北和華府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蔣不但確保了美國對他的支持，讓自身已然瀕危的中國代表權身份得到有力的擔保，也讓他面對中共軍事威脅時有了堅實的後盾，在圖存之餘得以思考反攻的可能。

然而換取《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提供的安全保證不是沒有代價的，為避免蔣中正利用條約為倚仗挑起與中共的軍事衝突，華府堅持必須要在條約中對其行動有所限制。為讓華府同意簽訂條約，台北最終只得同意除行使「固有自衛權利」以外，它在採取軍事行動前將與美方取得協議。此部分雖未載於條約正文，卻在事後以換文方式，與條約正文一同送交美國，被美國視為條約一部分、與正文有同等效力。如何在這種限制下推動反攻便成了此時蔣中正最念茲在茲的問題，從《蔣中正日記》中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此時蔣已出現了「反守為攻」的戰略思維，即利用中共對自身的威脅為由發動戰爭，並努力擴大戰果、至終說服美國支持其反攻。

另一影響此刻蔣中正對印尼戰略思維的，則或許是1957年6月下旬時美國已退休第七艦隊司令柯克向台北提出的一份備忘錄，在備忘錄中指出：「一旦共產黨控制東南亞，即將嚴重損害美國在西太平洋以及他在這世界性鬥爭中的利益，同時

¹ 「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對中共策略談話紀錄中英文稿」(1958年3月14日)，〈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83-001。

亦將粉碎人們在可以看到的將來恢復中國大陸的希望，而最終將危害台灣本身的安全。」²

1958年3月14日，在一次與杜勒斯對話中，蔣向他建議面對共產主義的威脅應當有更積極的作為，而支持其反攻正是亞洲反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事實上，他透過韓戰、和近期印尼的發展暗示，中共就是亞洲一切共產威脅的根源。整體而言，蔣中正試圖將自己的反攻與美國在亞洲乃至於世界的反共綁在一起。這麼做除可能是為了避免那些將反攻視為蔣私人野心的批評，也十足反映了柯克備忘錄對蔣的影響。該月下旬時蔣更在日記中稱對印尼的介入若「引誘共匪侵臺」反為「我反攻開始之契機」。³在上述背景下，「南海計劃」實則為一攻守兼備的計劃。蔣中正除回應所謂中共可能在南海造成的國安威脅，實際上也是希望透過促進東南亞的反共，以維繫自身反攻的希望。或更進一步的，透過反共戰爭，主動在條約限制下創造自身反攻的機會與正當性。

為了反攻，蔣中正亟欲尋找和中共開戰的機會，然而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和美國制約下，要想在金、馬等外島前線主動開戰，顯然是極為困難。正因如此，在印尼或亞洲其他地區的反共戰爭便顯得更加重要。這些看似與反攻無關的戰爭，若能吸引中共介入，無疑將有望成為蔣與中共開戰的合理跳板。審度該時亞洲形勢，這看似兜圈的引戰策略，並非毫無道理。早自1950年起，毛澤東便被史達林任命為亞洲革命的負責人、並在朝鮮半島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大打出手。此種背景下蔣要想與中共「境外開戰」進而遂行「反攻大陸」的方針，在理論上確實有其潛力。如果蔣之目的只是要避免共產勢力掌握印尼，則出兵印尼實非上策。如同莊萊德所擔憂的，這種行為恐將使其他共產國家得到合力介入的藉口，而中共的介入無疑將徹底打亂美國既有戰略。然而，如果蔣的目的是尋求與中共開戰，則此方法雖然有後防空虛、執行力不足等諸多疑慮，卻非毫無道理。

相較於蔣中正心心念念於反攻，美國的印尼政策則顯然有更多的顧慮。儘管早在1958年初華府便確立了透過擴大扶持印尼地方勢力對雅加達施壓的方針。然而這一明面與雅加達維持外交關係、暗地裡支持叛軍的兩面手法卻也存在明顯的風險。

² 「退休美國海軍上將柯克致蔣中正有關自由中國外交政策備忘錄」(1957年6月22日)，〈外交—抵禦國際共產侵略以保衛亞洲安全〉，《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5-00038-001。

³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蔣中正日記〉(47年3月29日)，頁30。

從內戰爆發之初，雅加達對於美國的懷疑就不曾消除，當 1958 年 5 月 18 日美國飛行員波普被印尼政府抓獲後，華府更是被迫在與雅加達公開為敵和改變政策間作出抉擇。幾經考慮後，華府終止了對叛軍的一切援助，轉向給予雅加達蘇卡諾政府軍火和經濟物資的援助，拉攏鍾安達和納蘇遜等有「反共意願」的印尼中央官員，換取雅加達努力改變其親共傾向的保證，同時避免此一失誤演變為外交的醜聞，影響美國在「第三世界」和中東國家中的地位。

基於不同的戰略思維，蔣中正和華府間想法出現明顯的分歧，感受到美國對於「印尼革命軍」失敗不願有積極作為，蔣中正於 5 月下旬以聽聞中共已然派兵參戰為由，數度向美國請纓表示願出兵印尼，皆遭美方以此刻正在拉攏雅加達內部反共勢力為由予以勸阻。對此蔣中正表面上應和，卻在 5 月 24 日軍事會議上指示成立「南海研究小組」，要求研擬攔截中共和登陸印尼的相關方案。雖然蔣中正的雄心壯大，然受限於美國反對和台北自身能力的不足，可行性微乎其微，蔣身邊包含葉公超、俞大維、陳誠、張厲生等眾多黨政要員幾乎都對此抱持反對態度。其中葉公超和俞大維更暗中扮演了勸阻蔣中正的積極角色，他們憂心此舉不但影響台灣防禦、更將破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下台北與華府的默契。國防部軍令體系內部如參謀總長王叔銘雖對此計劃之立案目標深表贊同，卻也不得不承認局勢並不容樂觀，並認為在美國態度改變前絕不能獨自派兵登陸印尼。此觀點明顯影響了國防部 6 月 7 日所提出的「南海計劃」。至此蔣中正也基本認清環境限制，「南海計劃」大部分內容逐漸轉向待機實施，僅部分內容在蔣經國指揮下得到繼續執行。

1958 年 6 月到 7 月，正當華府和雅加達間緊張的氣氛逐步緩和時，蘇拉威西島一帶「不明來源」的接連轟炸卻成了華府新的外交夢魘，這些「不明來源」的轟炸正是台灣的 B-26 轟炸機所造成。當美國一線外交官急於滅火同時，華府受到國務卿杜勒斯強硬態度影響，卻對此事呈現了搖擺的態度。某種層面上，「南海計劃」所帶來的 B-26 攻擊行動，除了反映蔣中正與華府之間的歧異，也凸顯了華府內部面對印尼共產主義時分歧的矛盾態度。早在 6 月中菲律賓的克拉克美軍基地就曾透過雷達捕獲台北 B-26 的行動，國務院卻遲遲未向台北嚴加制止。公開上國務院除以美國無權命令其他主權國家搪塞印尼外，私底下國務卿杜勒斯還數度在給予駐印尼大使鍾華德的電報、或和他國的談話中表明，除非雅加達採取更明確的反共措施，否則類似事情將無可避免。與此態度相左的則是美國一線外交官和五角大廈，認為叛軍

的騷擾只會使反共的印尼陸軍被牽制，無法專心對付爪哇的共產威脅。直到 7 月 13 日雅加達向美方表態此事再無解決，他們將提告聯合國，加上中東伊拉克和黎巴嫩接連出現動盪，美國憂心此事將影響其中東政策，華府內部態度才終於趨於一致。台北也就此收兵，終止了相關行動。此一包含蔣中正雄心的計劃，遂在暗中徹底落幕。然而在印尼紛亂逐漸歸於平息後一個多月，眼見美國目光向中東轉移、甚至每每示意蔣放棄金、馬，遠東似有逐漸冷卻趨勢，盛傳該年夏季將在「某處做某種軍事上的冒險」的中共終於出手了。8 月 23 日，隆隆砲聲劃破金門上空，中東動盪使印尼內戰加速落幕。同時，卻也在台海開啟了新的危機。



參考文獻

(一)中文專書

1. 杜勒斯 (Dulles, John Fosten)，王鶴儀 譯，《戰爭或和平》，台北市：華國出版社，1950。
2. 陳以令，《印尼現狀與華僑》，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
3. 馬樹禮，《印尼的變與亂》，台北：海外出版社，1965。
4. 丘正歐，《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5。
5. Robbert Cribb and Colin Brown，蔡百銓 譯，《印尼當代史》，台北：編譯館，1997。
6.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台北：鼎文，2004。
7.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台北，聯經：2015。

(二)外文專書

1. Kahin, Audrey, and Kahin, George McTurna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 New York: New Press, 1995.
2. Gardner, Paul F.,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s: Fifty Years of U.S.-Indonesian Relations*, Paul F. Gardn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3. Roadnight, Andrew.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Indonesia in the Truman and Eisenhower Years*, Hampshir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4. Poulgrain, Greg, and F. X. Baskara Tulus Wardaya. *The Incubus of Intervention: Conflicting Indonesia Strategies of John F. Kennedy and Allen Dulles*,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5.
5. Conboy, Kenneth and James Morrison. *Feet to the Fire: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Indonesia, 1957-1958*.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6. Baskara T Wardaya, SJ, *Indonesia Melawan Amerika: Konflik Perang Dingin, 1953-1963*, Yogyakarta: Galangpress Publisher, 2008.

(三)檔案史料

1. 《國防部檔案》，(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
2. 《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
3. 《蔣經國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
4. 《外交部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四)口述回憶錄史料

1. 陳三井 訪問、張國裕 紀錄，〈訪丘夫人——丘黃瑞環女士〉，《僑協雜誌》，第73期(2001年6月)頁52-58。
2. 陳三井 訪問、張國裕 紀錄，〈訪馬樹禮資政——談丘正歐博士〉，《僑協雜誌》，第73期(2001年6月)頁49-51。
3. 衣復恩，《我的回憶》，台北：立青文教基金會，2000。
4. 王立楨，《復興航空創辦人 陳文寬的冒險歲月》，台北：三友，2014。

(五)日記史料

1. 《王叔銘日記》(1958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17。
2. 《王叔銘日記》(1958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18。

(六)已刊史料

1.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RUS*, Indonesia 1958-1960, Volume XVII.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7> (2020年4月40日瀏覽)。
2.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台北：國史館：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七)外文期刊

1. Scott, Peter Da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Sukarno,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58, no. 2 (1985): 239-64. Accessed January 13, 2021. doi:10.2307/2758262.

(八)期刊論文

1.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頁231-290。
2. 陳鴻瑜，〈一九五八年臺灣軍援印尼革命軍始末(上)〉，《傳記文學》，第702期(2020年11月)，頁4-27。
3. 陳鴻瑜，〈一九五八年臺灣軍援印尼革命軍始末(下)〉，《傳記文學》，第703期(2020年12月)，頁43-57。

(七)雜誌文章

1. 郭奇榮，〈衣復恩回憶錄中道出參與一九五八年支援印尼叛軍行動〉，《印尼僑聲》，第138期(2012年3月)，頁24-25。
2. 丘尚堯，〈丘正歐博士事略〉，《僑協雜誌》，第73期(2001年6月)，頁28-29。

(八)報紙

1. 《中央日報》(台北)。
2. 《人民日報》(北京)。

附錄一

《國防部》，〈對印尼政變我國應持政策之建議〉，1958年2月26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420_4040_1_1_00041382。

對目前印尼政變，我國應持政策之建議：

一、印尼蘇島地方反共革命政府，與其容共中央政府之衝突，近日已顯趨劇烈。聞其革命領袖潘道少校，已自菲島來台北，此種際會似可予以利用。

二、印尼獨立九年來，因蘇卡諾採取中間偏左路線，對內容共，坐視共產黨勢力壯大；對外則中立媚俄，並承認共匪，使我在東南亞之國際地位及僑務政策蒙受不利。此次政變，正予以打破現狀，挽救烈勢局面之良機，我在外交及僑務政策方面，亟宜推陳出新，採取積極性之行動，即與潘道少校密洽軍援印尼革命政府之辦法。

三、軍援印尼革命政府之要領：

(一)基本目的：增強革命政府之反共武力，使能堅強屹立，不使為親共政權所推毀。並使反共軍力日益加強，逐次拖垮印尼中央政府，另組成反共統一政權，與我重建邦交。使二百萬印尼僑胞，重返自由祖國，並在東南亞建成一反共中心，繼續影響越、泰、馬各地僑胞，使之一致向心反共。

(二)軍援方案：(秘密進行)

1.積極方案：派遣一個加強營兵力，改裝密運蘇島，先構成戰鬥核心力量，爾後再逐次發動僑胞，擴大軍力。此加強營應附以青年軍官及政工幹部約二百人，並附高射砲八門、或戰車十餘輛，以千人左右為度，初期經費可自供一部，到達後由當地全部供給。

2.消極方案：動員台灣軍需生產品，代印尼革命軍製運軍品，均收價款，並洽請派員駐蘇島，俾使密察軍事形勢，研究發展反共力量及組訓僑胞之方法。

(三)目前應先派員密赴蘇島與革命政府接觸，調查實情，以備決策之參考，同時在台亦應作軍援之計劃及準備。

(四)目前國際情況，美、英、澳洲對蘇卡諾之基本觀念均不佳，我國如行軍援政策，對美英軍無妨害。彼等決不致坐視印尼反共力量全部消滅。我軍接收效後，則越泰等國對我必全面改觀，國際上將有新地位，共匪海上力量對南洋尚不可及，無大顧慮。

擬辦

上項建議係楊員向職報告並請轉陳鈞座，如有差遺，該員極願效命。謹按此次印尼反共政權之能否建立，對我外交及僑務之影響甚大，楊員所見雖尚值慎重研究，可否交國家安全局研究審議報核之處？

恭請核示

參軍長 黃杰 謹呈



附件 楊學房原件

對目前印尼政變我國應持政策之建議

一、印尼蘇島之地方反共力量與其容共的中央政府，政策衝突最近已顯呈劇烈變化。綜合其要況如次：

1. 印尼革命政府於本月十五日在中蘇門答臘宣告成立。以普維潤總理：辛鮑倫上校任外交部長(聞辛上校對我國素表友善，純德球隊訪蘇島時極表歡迎)。哈拉哈普任國防及司法部長，島斯曼任社會部長，蘇米卓任貿易航運交通部長。薩魯帕特任農業勞工部長，夏飛任教育衛生部長，此外北西里伯斯之軍隊亦聲明響應，參加革命。

2. 印尼中央政府十一日下令將辛鮑倫上校及桑貝克上校等軍官撤職。蘇卡諾十六日自日本返國，十八日會晤哈泰後無協議。於廿一日起，即派機空襲蘇島及西里伯斯，迄已連續轟炸三日。戰火將逐漸燎原。

3. 昨見報載印尼革命領袖潘道少校已自菲島來台，此種際會，我似可予以斷然利用。

二、印尼獨立九年以來。因蘇卡諾採取中間偏左路線，對內容共，坐視共黨勢力日益壯大。對外則中立媚俄，於外交上又斷然承認共匪。致使我國國際地位及僑務政策在東南亞地區處於極端不利之地位。此番印尼政變，正予以打破現狀，挽救劣勢局面之良機。我在外交及僑務政策方面，亟宜翻陳出新，採取積極性之行動，即予潘道少校密洽軍援印尼革命政府之辦法，準備作有力之推行。

三、軍援印尼革命政府之要領如左：

1. 基本目的—在增強革命政府之反共軍力，使能堅強屹立，不致為蘇卡諾親共政權之攻勢所粉碎。並使反共軍力日益加強，俾能逐次拖垮印尼中央政府。另組成一個反共的統一政權，予我重建邦交。使二百萬印尼僑胞重返自由祖國，並在東南亞建成一反共中心，以繼續影響越泰馬各地僑胞，使能一致向心革命，加強反共力量為目標。

2.軍援方案：依客觀情況研究之，似應分為「積極」予「消極」兩種方案。有利時亦可同時並用之。惟均取秘密方式，盡力保密。

〈甲〉積極方案：派遣一個混成營之兵力，改裝密運蘇島。先構成戰鬥核心力量，爾後再逐次發動僑胞，擴大軍力。形成東南亞之堡壘。此項混成營：應附以青年軍官及政工幹部約二百人，並附高射砲八門，或戰車十餘輛，以千人左右為度。初期經費可自供一部，到達後即由當地全部供給。

〈乙〉消極方案：即動員全台軍需生產力，代印尼革命軍製運軍品。均收價款。同時並洽請派員駐蘇島以便密察軍事形勢，並研究發展反共力量及組訓僑胞之方法。

3.目前國際情況：美英及澳洲對蘇卡諾均未表明態度，但基本觀念均不佳。只因牽制顧慮，不便公開行動耳。我國行軍援政策，對美英等均無妨害。彼等亦決不能坐視印尼反共力量，使其全部渙滅。我軍接收效後，則越泰等國對我必全面改觀，國際上將有新地位。共匪海上力量，對南洋尚不可及。無大顧慮。

五、右陳各項雖屬職一愚之見，但均係根據數年來在國外之工作經驗，與目視國外僑民現況，熟思深慮，針對現實情況而具申者。如蒙

垂察，自願重竭駑鈍，謹請

鈞核 右呈

總統 鈞鑒

職 楊學房 呈 二月廿五日

附錄二

*筆者按：國防部檔案使用之部分地名翻譯與本論文有異，請參照附錄三之中外名詞對照表。另外此處所附「南海作戰計劃」僅抄錄文字，地圖請參考附錄四筆者所整理之形勢圖。

《國防部》，〈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事項請鑒核由〉，1958年6月7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藏，編號47_0420_4040_1_2_00041382。

事由：呈報研究支援印尼革命軍作戰有關事項請鑒核由

職 王叔銘 謹呈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七日

一、五月二十四日第十三次軍事會談，對共匪派遣志願軍赴印尼參戰事，奉 指示援助印尼革命軍計劃原則：

- (一)海空軍攔擊共匪派遣之志願軍部隊。
- (二)以海軍陸戰隊之一部，登陸西里伯斯島。
- (三)最後目標為爪哇雅加達。

二、遵即指派各有關人員組成研究小組，代名為「南海研究小組」，研究如何以軍用物資及軍事行動支援印尼革命軍，使能保持力量，繼續作戰，以及爾後之發展。

三、茲謹將研究支援有關事項呈述如左：

(一)支援政策：

- 1.在未獲美方協議前，以非美援裝備武器裝備援助為原則。
- 2.所有武器裝備之支援，以不影響我方戰力為原則。
- 3.所有各項支援，以不影響中美雙方現行條約義務為原則。

(二)軍用物資援助方面：

1.自支援印尼革命軍以來，截至六月五日已運交七個營裝備。(詳數見附件一)。正運輸者有三個營裝備。(詳數如附件二)。令正研擬援助少數海空軍裝備。(詳數如附件三)。

2.所有援助之武器裝備，以撥助為原則，其價值之計算與償付，爾後另行專案研究。

(三)軍事行動援助方面：

1.情報判斷(見附件四)

2.攔擊作戰：

就共匪運送志願軍之路線分析，可分為東航路(由海南島沿越南近海至爪哇)及西航路(假道緬甸經印度洋至蘇門答臘或爪哇)。我海空軍如不能在菲越獲得中間基地或美方支援，空軍因受航程及海軍因負台灣海峽任務之限制，對攔擊任務不易實施。(詳細研究見附件五)。

3.登陸作戰：

(1)登陸西里伯斯島：

甲、使用兵力為四個陸戰隊加強營。(用志願軍名義)。作戰研究見附件六。

乙、陸戰隊係美援部隊，如不獲美方協議，似難執行。如獲美方諒解，則進而研究後勤支援，以及美海空軍協助問題。

(2)登陸爪哇或蘇門答臘：

此一登陸作戰，經分析有如下列之顧慮：

甲、使用兵力龐大。(需一個師至一個軍)。對台澎及外島防務不無影響。

乙、須獲美方海空軍之支援，如無美方支援，我海空軍均無此能力掩護。

丙、印尼革命軍目前在爪哇及蘇門答臘，已無較大之部隊存在，我如派遣部隊登陸，將因缺乏內應而難獲進展。

丁、由台灣至爪哇距離達二千一百三十餘哩，後勤支援將感極度困難。

依據前四項所述，此一作戰目前尚難實施。如爪哇及蘇門答臘內部情勢變化，有利我之登陸作戰，且同時獲致美方協議，派遣海空軍及予我必要之後勤支援時，則可計劃實施。目前當密切注意印尼局勢之發展及蒐集研究，該二島兵要地誌與革命軍之潛力，以備局勢有利時之需用。

(四)選送軍事技術人員個別參加作戰：

印尼革命軍對軍事指揮人員及幹部，迄未提出要求，僅請派軍事技術(如雷達通信)人員協助我方循其需求，選派人員，宜用志願軍人員名義及退役軍人身份個別參加為妥，待遇應由印尼革命軍負責，本案正由情報局洽商辦理。

四、綜上各項，獲致結論如下：

(一)軍用物資援助案，宜照既定方案繼續加強辦理。

(二)海空攔擊作戰案，在未借獲菲越海空軍基地前，難以實施。

(三)登陸作戰：

1.登陸西里伯斯島案，較為可行。

2.登陸爪哇或蘇門答臘案，難以實施，將視印尼及國際間局勢之發展，再行協調美方研辦。目前當積極從事各項資料之蒐集及有關工作之準備。

(四)選送軍事技術人員個別參加作戰案，視印尼革命軍之請求，酌情辦理。

五、以上結論是否有當，

恭請 鑒核。

謹呈 總統

附件一

已運交印尼革命軍七個營裝備數量統計表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七日

(47)涵測字第二五一號

| 已運交印尼革命軍七個營裝備數量統計表 | | |
|--------------------|--------|-----------|
| 武器 | 數量 | 彈藥 |
| 75 無後座力砲 | 14 門 | 890 發 |
| 87 迫砲 | 28 門 | 1,680 發 |
| 60 迫砲 | 63 門 | 3,780 發 |
| 79 重機槍 | 20 挺 | 140,000 發 |
| 88 式 75 高砲 | 2 門 | 4,000 發 |
| 25 機砲 | 12 門 | 40,000 發 |
| 30 重機槍 | 56 挺 | 152,050 發 |
| 30 輕機槍 | 260 挺 | 304,800 發 |
| 45 衝鋒槍 | 1204 支 | 240,500 發 |
| 卡柄槍 | 2480 支 | 423,960 發 |
| 英造 303 步槍 | 500 支 | 60,000 發 |
| 手槍 | 61 支 | 8,600 發 |
| 79 步槍彈 | | 200,000 發 |
| 手榴彈 | | 10,100 枚 |

| | | |
|-----|--|---------------|
| 炸彈 | | 100 枚(100 磅重) |
| 照明彈 | | 10 枚 |



附件二

正運交印尼革命軍三個營裝備數量統計表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七日

(47)涵測字第二五一號

| 正運交印尼革命軍三個營裝備數量統計表 | | |
|--------------------|---------|------------------------------|
| 武器 | 數量 | 彈藥 |
| 60 迫砲 | 27 門 | 8,100 發 |
| 81 迫砲 | 12 門 | 3,600 發 |
| 57 戰防砲 | 4 門 | 6,394[6,349]發 ¹⁹⁶ |
| 二公分機關砲 | 10 門 | 5,000 發 |
| 國造 40 式 75 無後座力砲 | 9 門 | 720 發 |
| 25 機關砲 | 1 門 | 5,000 發 |
| 79 步槍 | 1,272 支 | 254,400 發 |
| 45 手槍 | 24 支 | 2,400 發 |
| 79 重機槍 | 12 挺 | 36,000 發 |
| 30 輕機槍 | 12 挺 | 222,000 發 |
| 90 衝鋒槍 | 513 支 | 153,900 發 |
| 手榴彈 | | 4,000 枚 |
| 大圓鋏 | 5,000 把 | |

¹⁹⁶ 此處國防部 6/6 日的部內簽呈、和 6/7 日給蔣中正的簽呈數字有所出入。推測純係謄抄之誤。

附件三

現正研擬援助印尼革命軍裝備數量統計表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七日

(47)涵測字第二五一號

| 現正研擬援助印尼革命軍裝備數量統計表 | | | |
|---|----------|----|---|
| 區分 | 裝備 | 數量 | 辦理情形 |
| 海軍 | 砲艇 | 二艘 | 1.日式江秀艇 280 噸、海澄艇 350 噸。2.已由海軍總部令飭集中左營待命。3.由印尼革命軍派員接收(四十員)。 |
| 空軍 | B-26 轟炸機 | 一架 | 正改裝中，駕駛人員由我方協助。 |
| 空軍 | PBY 水上飛機 | ? | ? |
| 空軍 | P4Y 巡邏機 | 二架 | 由印尼革命軍向我購買。 |
| 空軍 | T-6 教練機 | | 撥助少數。 |
| 空軍 | 日式雷達 | 一具 | 1.正待運中。2.使用人員待遇由情報局協調空軍總部辦理中。 |
| 附記：以上裝備之運送交接等事項，在目前美方政策未明確以前，仍繼續由情報局執行。 | | | |

附件四

情報判斷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七日

(47)涵測字第二五一號

南海作戰參二情況判斷

一、使命：從略

二、狀況：

(一)一般狀況：

自去歲蘇卡諾採取親俄容共政策實行獨裁並與反共而親西方之回教領袖哈達副總統決裂後，各外島之駐軍領袖與地方縉紳，因不滿蘇卡諾總統之親俄容共政策，及剝削外島經濟利益之獨裁作風，乃擁兵割據，紛紛宣布不接受中央之指揮，至本年二月中，中蘇門答臘駐軍宣布成立革命政府並立刻獲得北西里伯斯駐軍響應。惟由於各外島駐軍缺乏準備與聯繫，一經政府軍攻擊，即告潰退，至本年五月，蘇中地區之正規戰即告結束。革命軍雖在北西里伯斯重建革命政權，但中央軍旋即攻佔摩羅泰島，與峨崙打落，以及桑吉島與達勞島等外圍據點，對革命軍完成海空包圍之態勢。

(二)作戰地區之特性：

- 1.就氣象而言，西里伯斯島七至九月溫度較低，雨量亦少，適宜登陸作戰。十二月至翌年二月，天氣陰沈多雨，能見度較差，對登陸作戰影響較大。
- 2.本島地形狀似「K」型，中部面積較大，且地形較高，為本島之心臟地帶，欲控制全島，必需佔領中部之心臟地帶。
- 3.本島中部之北端，地形狹窄而險要，什多雷山峙立中央，標二〇九九公尺，為控制本島陸上南北通道之要點。

4.本島沿海地帶有少數小平原，大部均為崇山峻嶺，且多險谷，交通不便，部隊及車輛運動極為不便。

5.本島海岸曲折，沿岸水深，且多岩灘，適宜於大部隊登陸作戰之灘頭甚少，惟美那多灣、羅諾、巴桑卡約、薩勒達社間、達姆蒲、及峨崙打落等處附近岩礁較少，陸上地形較為平坦，判斷小部隊之登陸似無大困難。(灘頭位置參閱附圖一)。

6.本島東北之摩羅泰島，第二次大戰中，曾為美軍攻略菲律賓之基地，島上設備完善，現為印尼政府軍重要空軍基地之一，對革命軍之威脅甚大。

7.二次大戰初期日軍攻略荷印戰史圖解。(參閱附圖二、及附錄)。

8.海空軍基地：

印尼海空軍基地分佈(如附圖三)

印尼鄰國海空軍基地與印尼之關係及距離(如附表一)

(三)敵情：

1.印尼政府軍：

(1)陸軍兵力及部署(附圖四)

(2)海軍：官兵九千人有舊式巡洋艦一、驅逐艦二、砲艦四、及其他艦艇共四十六艘。(共兩萬噸)。另有海軍陸戰隊一營，計一千人。

(3)空軍：官兵二千六百人。有米格十七噴射機十五架，依留申二十八噴射轟炸機五架，連其他機種共九十五架，其每日出動率為戰鬥機二十三架次，轟炸機十一架次。(以每機每日出勤一次計算。)

2.匪對印尼支援兵力之判斷：

(1)陸軍：匪在華南地區之現有兵力為八個軍，可能抽掉四個軍以支援印尼。但手海上運輸能力之限制，一次只能運輸一個師，至於空運一次可能運送一千五百人，須假道仰光。

(2)海軍：匪可能抽調其在華南地區之海岸巡邏艦六艘，及潛艇六艘支援印尼。

(3)空軍：匪空軍支援印尼之兵力，因受印尼現有機場容量之限制，可抽調噴射機二百架及一部螺旋槳飛機，惟亦須假道經緬。

三、匪對我攔截部隊阻撓能力之判斷(如附圖五)

四、敵可能行動之分析：

(一)敵可能行動之列舉：

1.我如實施攔截作戰時匪可能：

- (1)使用海空軍在其有效範圍內對我作戰。
- (2)使用潛艇襲擊我攔截艦隻。
- (3)對我金馬採取行動，以牽制我海空軍，使我無法執行攔截任務。

2.我如派遣志願軍支援印尼革命軍時：

- (1)印尼政府軍可能以其在北西里伯斯附近之現有兵力阻止我登陸。
- (2)印尼政府軍可能抽調其他地區之陸軍部隊，增援西里伯斯方面作戰。
- (3)印尼政府軍之海空軍可能在海上襲擊我登陸船團。
- (4)匪可能一次派遣一個師之志願軍，在其海空軍掩護下，參加印尼政府軍作戰。
- (5)匪可能以海空軍(含潛艇)在海上襲擊我登陸船團。
- (6)匪可能對金馬採取行動。
- (7)匪可能以武器裝備、及物資支援印尼政府軍作戰。

(二)研究及分析：

1.我如實施攔截作戰時：

(1)匪空軍如對我做返攔截作戰時，其有效範圍只限於其華南基地、與可供使用之印尼基地之雷達網涵蓋之地區，其海軍亦只能在其空軍掩護之範圍內作戰。

(2)匪可以潛艇襲擊我攔截艦隻，可能使我遭受危害。

(3)匪如對金馬採取行動，可能使我之海空軍不能用於執行攔截任務。

2.如我派遣志願軍支援印尼革命軍作戰時：

(1)印尼政府軍在北西里伯斯地區之現有兵力暫不足以阻止我軍登陸。

(2)其他地區之印尼政府軍，因距北西里伯斯甚遠，且海軍能力有限，將不能做即時而有效之增援。

(3)印尼政府軍之海空兵力雖然有限，但我船團如無充分之空軍掩護，將遭受危害。

(4)匪派大量志願軍赴印尼參戰，將使印尼局勢更趨複雜化。

(5)我如無強大海空軍掩護，則可能遭受重大損害。

(6)無此將使我無法繼續執行任務。

(7)將使印尼政府軍之戰力增強，對我任務之執行增加阻礙。

五、結論：

(一)如匪不參加印尼作戰，則印尼軍對我任務之執行無嚴重妨礙。

(二)如匪軍參戰，印尼局勢將有急烈變化。

(三)如匪對金馬採取行動，將使我無法繼續執行現任務。

附件五

海空軍攔擊匪運志願軍之研究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七日

(47)涵測字第二五一號

海空軍攔擊匪運志願軍之研究

一、使命：

以海空軍攔擊共匪派遣支援印尼政府之「志願軍海運與空運部隊」，以支持印尼革命軍繼續作戰。

二、立案假定：

(一)我台澎及各外島如目前態勢。

(二)能獲致美方協議及必要之後勤支援。

三、討論：

(一)匪可能採取之行動如下：

1. 匪空軍及潛艇掩護其運輸船團南下。

2. 匪空軍及潛艇巡航護送其運輸艦船零星竄渡。

3. 匪租用中立國商船偷運。

4. 匪假道緬甸港口起運，繞道東印度洋。

5. 匪由北越緬甸及海南島實施空運。

(三)根據前條分析，共匪運輸志願軍可能採取之海空航路，大別分為東南東西兩航路。(見附圖一)。

1. 東航路—由廣州經海南島沿越南東海向至爪哇。

2. 西航路—假道緬甸至蘇門答臘或抓哇。

(三) 台灣至匪東航路之有效攔擊區域距離(見附圖二)。

(四) 我空軍以屏東及馬尼刺為起點，有效控制範圍均不能達到匪可能採取之東航路。(見附圖三)。如能借用越南基地，同時在不影響防務原則下，可使用兩個戰鬥機轟炸中隊，但亦只能攔擊東航路之一部分。(見附圖四)。

(五) 我海軍雖可達到有效攔擊區域，但受控制台灣海峽任務之限制，派遣擔任遠海巡邏之兵力調配不易，在不影響防務原則下，每一次派遣兵力只能三至四艘，且因航程較長，巡邏時間難以持久。(各型艦隻航行及巡邏時間見附表一)。如能借用菲越基地整補，對任務之遂行將有裨益。

(六) 在我空軍不能達到之有效攔擊區域，如僅使用海軍艦艇巡邏，可能遭受匪由海南島個機場飛機之攻擊。(見附圖五)。

四、結論

(一) 海空軍以台灣為起點，對攔擊任務之遂行，至為困難。

(二) 如能借用越南空軍基地及菲越海軍基地，可攔擊匪之東航路。

附件六

支援印尼革命軍兩棲登陸之作戰研究

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七日

(47)涵測字第二五一號

支援印尼革命軍兩棲登陸之作戰研究

一、使命：

(一)我以志願軍名義，編組兩棲特遣部隊，(以陸戰隊四個加強營為基部)對印尼北西里伯斯及摩洛泰島實施行政及突擊登陸，以支援印尼革命軍防衛現有地區，繼續作戰，並促進其發展。

(二)本作戰代字——南海作戰。

二、立案假定：

(一)我台澎及外島地區如目前態勢。

(二)不影響外島運輸補給。

(三)朱毛匪軍已派遣志願軍參與印尼作戰。

(四)本作戰須俟印尼革命軍提出要求，且其本身尚具有潛力。

(五)獲得美方公開或案中支援，必要時予以海空軍及後勤之支援。

(六)協調菲列賓及越南，以海空軍基地供我海空軍使用。

(七)登陸北西里伯斯島時，革命軍必須能固守現地區，以俟我軍之到達。

三、情報：

(一)敵軍兵力與部署：

1. 印尼軍：

西里伯斯方面：在北西里伯斯及摩洛泰島方面於我登陸初期，可能使用於該區之兵力，計陸軍五營、海軍艦艇一萬噸、陸戰隊一營、空軍每天出動戰鬥機二十三架次、轟炸機十架次，並可一次使用之傘兵二百人，迪可利用之有力增援部隊，均在六七〇浬以外地區。

2. 匪軍：

初期匪可支援印尼政府軍作戰之最大兵力，計陸軍一個師、海軍潛艇六艘、五百噸以下之作戰艦隻十四艘、飛機二百八十架及傘兵二營。

(二) 敵之能力

1. 敵可能之行動：

- (1) 印尼政府軍可能以海空軍及各島現有兵力阻止我登陸。
- (2) 印尼政府軍可能用全部海陸運輸能力，調集部隊，全力予我打擊。
- (3) 匪可能以陸海空軍支援印尼政府軍作戰。
- (4) 匪可能對金馬採取行動。
- (5) 匪可能對台澎採取行動。

2. 敵行動之比較：以上前四項，均屬敵最可能採取之行動。

四、作戰構想：

(一) 兵力運用方案(附圖一、二、三、四)

(二) 任務完成

1. 甲案：作戰開始，應一舉攻佔摩洛泰島及行政登陸北西里伯斯島，從速準備，支持印尼革命軍防衛，以備印尼政府軍之可能反擊。且能立即重建摩洛泰島為海空軍之前進基地，以穩定該地區，並促進其爾後發展。

2.乙案：為免印尼政府軍攻陷美那多地區，依時機緊迫之需要，應以全力行政登陸美那多附近地區，或於莪崙打落敵後地區突擊登陸，殲滅政府軍，以穩定該地區，並促進其爾後發展。

(三)遂行作戰之各階段：

1.初期作戰：

我海空軍設法偵查，掩護並封鎖接近目標區之航路，及實施反潛作戰。

2.登陸作戰：

- (1)先遣部隊歸兩棲特遣部隊指揮官統一指揮。
- (2)先遣部隊先期於左營集結，於D-2日開始作戰。
- (3)攻擊部隊於左營集結，裝載登陸部隊駛往目標區，並於海上實施必要整備。於D日行政登陸北西里伯斯之美那多，及突擊摩洛泰島。
- (4)我兩棲特遣部隊負責接近航路及目標地區之警戒掩護，對防空防潛特予加強警戒。
- (5)灘頭作戰，參閱陸上兵力運用要圖一、二、三、四。

3.登陸任務完成後：

- (1)我軍行政登陸北西里伯斯及攻佔摩洛泰後，兩棲特遣部隊除以部份艦艇編組支隊，歸南海作戰特遣部隊指揮官指揮，負責目標地區警戒掩護及運補等任務外，餘解除任務，編組返航。
- (2)兩棲地面部隊於兩棲特遣部隊解除之同時起，改為南海派遣部隊，其指揮官負責該地區各部隊之指揮及管制，並協調印尼革命軍支援其陸上之作戰。
- (3)本作戰本部另組派參謀團參與支援印尼革命軍有關作戰之協議事宜，並負責陸上作戰對南海派遣部隊之指揮。
- (4)有關本作戰之參謀團，志願軍編組，另案研究。

(四)目標地區之發展：

- 1.南海派遣部隊指揮官應協調印尼革命軍，由其將桑吉(予以攻佔)摩洛泰美那多等地發展為三軍基地，以供爾後使用。
- 2.可能時，我應以部份海空軍進駐摩洛泰及桑吉地區，令派遣必要勤務部隊加強各地區之作業。

(五)協調與指揮：

- 1.我軍各部隊兩棲作戰時，依兩棲作戰聯合準則規定，陸上作戰則受參謀團之指揮。
- 2.我軍與印尼革命軍作戰指揮關係，由參謀團協議辦理。

五、所需之部隊：

- 1.海軍部隊：旗艦一艘、驅逐艦二艘、護航驅逐艦二艘、砲艦四艘、掃雷艦四艘、巡邏艦八艘、火力支援艦二艘、運油艦二艘、救助艦二艘、運數艦二艘、海岸掃雷艦二艘、傷患收容艦一艘、戰車登陸艦九艘、中型登陸艦八艘、各型艦艇共四九艘。
- 2.陸戰隊：陸戰隊一個加強團。(四個營)
- 3.空軍：我空軍可派少數偵察機實施偵查，另可派 AT-6×12 架。(裝船運往，可擔任爾後路上偵察及部隊空中密接支援任務)。

(二)上列各部隊均可由本部立即派遣，於計劃完成後，可在 D-16 日前，歸兩棲特遣部隊指揮官指揮，於指定地區集結整備，待命裝運，於 D-12 日前，於左營集結完畢。

(三)各部隊之人員補充，於 D-16 日開始，並須於 D-14 日前到達指定地區，向兩棲特遣部隊各部隊指揮官報到，待命派遣。

(四)上列部隊於 D 日登陸，戰鬥勤務支援部隊候令於 D 日或爾後登陸。

六、後勤：除第一類及部隊裝備外，爾後裝備消耗補充，宜請美方予以額外支援，由本部設法運送。(細部事項另案研究)。

七、其他：

(一)本作戰必需保持高度機密，嚴束參與計劃人員，至於部隊須於海上運動期間，適當時間宣佈之。

(二)無本部特別指示，兩棲特遣部隊或兩棲地面部隊應繼續執行現有之作戰。

(三)參謀團為本部派駐印尼革命軍方面之最高軍事單位，負責我軍指揮及協調事宜。

(四)我軍作戰地區通信與印尼革命軍協調實施之。

(五)時間以作戰地區時間使用之。

八、結論

(一)本作戰如無美海空軍掩護，而我空軍復受航行半徑及基地之限制，難以支援情況下，我兩棲特遣部隊在印尼政府軍獨佔空優中，不易實施較大規模之兩棲登陸作戰。

(二)如必須實施本作戰，我兩棲特遣部隊須加強防空防潛火力，且秘匿企圖，利用暗夜航行西里伯[斯]海接近目標區，或勉可達成使命。

(三)必要時，以營連以下部隊為單位，分批運送，以可達成行政登陸使命。

附錄三 中外名詞對照表(按字母排序)

| | |
|-----------------------------------|---------|
| Abdoel Haris Nasution | 納蘇遜 |
| Ahmad Hussein | 胡辛 |
| Allen Lawrence Pope | 艾倫·波普 |
| Allen Welsh Dulles | 艾倫·杜勒斯 |
| Ambon | 安汶 |
| Arleigh Albert Burke | 柏克 |
| Bandung Conference | 萬隆會議 |
| Bogor | 茂物 |
| Bukittinggi | 武吉丁宜 |
| Cape May | 梅角 |
| Charles M. Cooke Jr. | 柯克 |
|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 中央情報局 |
| CAT (Civil Air Transport) | 民航空運隊 |
| Clark Field | 克拉克機場 |
| Dean Gooderham Acheson | 艾奇遜 |
|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 無產階級專制 |
| Djuanda Kartawidjaja | 鍾安達/朱安達 |
| Dumai | 杜邁 |
|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 艾森豪 |
| Everett F. Drumright | 莊萊德 |
| Felix Stump | 史敦普 |
| Gorontalo | 哥倫打落 |
| Guided Democracy | 指導式民主 |
| Harry D. Felt | 費立德 |
| Harry S. Truman | 杜魯門 |
| Herbert Riley | 萊利 |
| Hoover Institution | 胡佛研究所 |
| Howard Palfrey Jones | 鍾華德 |
| Hugh Cumming | 康明 |

| | |
|--|-----------|
| Irkutsk | 伊爾庫茨克 |
| James H. Doyle | 竇亦樂 |
| Jan Maximillian John Pantouw | 潘道 |
| Java | 爪哇 |
| John Foster Dulles | 約翰·杜勒斯 |
| John N. Irwin II | 艾爾溫 |
| Kema | 基馬 |
| Likupang | 力古朋 |
| Masyumi | 馬斯友美黨 |
| Manado/Menado | 萬鴉老[美那多] |
| Mohammad Hatta | 哈達/哈泰 |
| Morotai | 摩羅泰島/摩洛泰 |
| New Jersey | 紐澤西 |
| Non-Aligned Movement | 不結盟運動 |
|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 歷史文獻辦公室 |
| Peristiwa Madiun | 茉莉芬事件 |
| Permesta(Piagam Perjuangan Semesta) | 全面鬥爭憲章 |
| PKI(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 印尼共產黨 |
| PRRI(Pemerintah Revolusioner Republik Indonesia) | 印尼革命政府 |
| Sir Harold Caccia | 加西亞 |
| Subandrio | 蘇班德里約 |
| Sukarno | 蘇卡諾 |
| Sulawesi/Celebes | 蘇拉威西/西里伯斯 |
| Sumatra | 蘇門答臘 |
| Tawi Tawi | 大威島 |
| US Overseas Airlines | 美國海外航空 |
| Ventje Sumual | 蘇穆爾 |
| Walter Spencer Robertson | 勞勃森 |

附錄四 1958 年遠東地圖(筆者整理)



全文完